



目 录

斯拉夫·欧亚

- 3 朱建刚 唐薇 /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 22 雷蒙德·塔拉斯 / 波兰的长期恐俄症？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
- 43 余南平 周生升 /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盟国家的政党政治结构变迁

形象·符号

- 74 石芳 / 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 92 张建华 / 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
- 139 陈余 / 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战略·政策

- 157 波波·罗 /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 182 黄登学 /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4 年 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4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Чжу Цзяньган, Тан Вэй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Перспектива консерваторов.....(3)

Раймонд Тарас

Хроническая русофобия в Польше?Сравн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элит и масс (22)

Юй Наньпин, Чжоу Шэньшэн

Изменения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стр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ЕС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43)

Ши Фан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Европы» в эпоху Просвещения---Анализ трудов Вольтер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74)

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их влияние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92)

Чэнь Юй

«Образ Герма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перед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й войной---Газета «Правд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ъекта основ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39)

Бобо Ло

Россия, Китая и США---О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к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треугольнику.....(157)

Хуан Дэньсюе

Обзор новой верс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Напра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182)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Zhu Jiangang, Tang Wei

“The Polish Issue” within Rus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erspectives from the Conservatives..... (3)

Raymond Taras

Chronic Russophobia in Poland? Elite and Public Attitudes Compared (22)

Yu Nanping, Zhou Shengsheng

Party Politics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43)

Shi Fang

Russia’s Images in the Enlightenment Age and Construction of “Europe”:
Analysis of Voltaire’s Works on Russian History..... (74)

Zhang Jianhua

Construction of “Soviet Image”: Soviet Military Expert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and their Influences (92)

Chen Yu

German Image by Former Soviet Union Political Propaganda before the
Soviet-German War: A Main Case Study of Pravda (139)

Bobo Lo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From Strategic Triangularism to the
Postmodern Triangle (157)

Huang Dengxue

Review on Russia’s New Foreign Policy Concept---Russian Diplomacy
Prospects under Putin’s New Term..... (182)

斯拉夫·欧亚**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朱建刚 唐薇**

【内容提要】“波兰问题”是19世纪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却一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在1863年波兰爆发独立事件后，俄国政论家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阿克萨科夫等人分别从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分析“波兰问题”及国家利益、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民主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激烈争论。

【关键词】波兰问题 卡特科夫 斯特拉霍夫 阿克萨科夫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003-(19)

1795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存在了800多年的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了。但与此同时，随着波兰人民的不断反抗，“波兰问题”在19世纪俄国思想领域却愈发突出，最终成为彼时俄国文学界、思想界借以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契机。在19世纪俄波关系史上，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赫尔岑和巴枯宁等革命派的态度，他们与波兰革命者合作，始终强调俄波的共同敌人是沙皇专制^①。“土地与自由社”曾在1862年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的疏漏由作者负责。

** 朱建刚，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博士生。

① 波兰学者诺瓦克把这种传统认知角度下的波俄关系史研究模式概括为：“波兰人（波兰‘高尚的’革命者，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与俄罗斯人（俄罗斯民主派、革命派）反对沙皇专制；沙皇专制反对他们。”Анжей Новак. Борьба за окраины, борьба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XIX в. и поляки, поляки и империя(обзор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ь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См: Западные окраи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7. С.430.事实上，这一研究模式完全忽视了俄罗斯与波兰革命者之间的矛盾，更忽略了俄罗斯保守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但因受意识形态影响，这种模式直到苏东剧变后才得以改变。

与波兰革命者联系，秘密协商起义事宜。但事实上，或因距离，或因书刊检查以及民族情绪的缘故，革命派对波兰的看法在当时虽有一定市场，但在俄国影响有限^①。现实中，真正影响巨大并推动官方出台对波兰政策的，应该是以卡特科夫（М.Н.Катков，1818-1887）为代表的俄国保守派^②，以及以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Н.Н.Страхов，1828-1896）、阿克萨科夫（И.С.Аксаков，1823-1886）为首的新老斯拉夫派发表的一系列政论。从思想层面而言，正是他们与西欧舆论、及俄国侨民革命派的争论，激起了本国思想界对俄国民族身份的思考。但因资料及立场缘故，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保守派的言论往往语焉不详，使19世纪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仅有单方面呈现。这显然有失客观。笔者以1863年波兰起义为背景，重点分析俄国保守派、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由此揭示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看法，以资对照。

一、争论之始

1863年1月22日，波兰爆发了旨在反抗俄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沙皇政府大为震惊，调集重兵镇压。最终，波兰军队在十倍于己的兵力围困下陷于失败。对于这次事件，除了卡特科夫及其《俄国导报》（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当时就发表时事评论外，俄国思想界一开始对此并无明确观点。斯特拉霍夫回忆说：“彼得堡文学界自起义之日起几乎一致保持沉默。这或许是因为不知说什么好，或许甚至是因为从自己抽象的观点出发，准备直接同情起义者的要求。这种沉默激怒了莫斯科的爱国者和政府中有爱国情绪的人。他们感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与此刻国家利益相敌对

① 列宁曾说：“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派的名誉。”这话也从反面证实了赫尔岑等人在当时的孤立状况。参见列宁：《纪念赫尔岑》，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

② 严格来说，卡特科夫当时尚属于温和的自由派，但正如他之前在《我们属于哪个党派》（1862）一文中所说的：他本人属于“自由的保守主义”。联系到波兰事件后卡特科夫观点的进一步保守化，笔者在此将其列为保守派。

的情绪，因而对这种情绪怀着正当的愤怒。”^①“准备同情起义者的”，自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他们久受欧风西雨之影响，整天谈论自由民主等问题，对同处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波兰抱有同情。不过限于局势，一贯激进的《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被迫保持沉默。只有远在欧洲的赫尔岑在《警钟》(Колокол)上发文，反对沙皇政府对波兰的武力镇压。1863年4月1日《警钟》上刊登的赫尔岑的文章说：“我们站在波兰一边，因为我们是为了俄国；我们所以为波兰人讲话，因为我们是俄国人；我们所以希望波兰独立，因为我们希望俄罗斯自由；我们和波兰人站在一起，因为同一条锁链把我们两国锁在了一起。”^②这显然是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出发，将自己与波兰人同列为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受迫受害者。不过，由于海关检查等原因，这一类声音离俄国读者还是远了些，而且由于立场问题，在国内应者寥寥^③。

真正引发“波兰问题”讨论的，是斯特拉霍夫。

斯特拉霍夫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批评家、政论家。他在19世纪50年代末认识了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鼓励下开始积极参与文学评论工作。他们与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Аполл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ригорьев, 1822-1864)三人在思想方面有许多相投之处，因此成为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的核心。斯特拉霍夫在1863年4月份的《时报》(Время)上发表了署名为“俄罗斯人”的文章：《致命的问题》(Роковой вопрос)。虽然这不是思想界第一篇关于波兰事件的文章，但作者所持的立场引起了众多争议。文章从当时实际出发，指出思想界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在于文化。“波兰人起来反对我们，就是有文化的民族反对文化低、甚至没文化的民族。……波兰一开始与欧洲其他地区是平等的。它和西方民族一样接受了天主教，与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自

① Страхов Н.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Пб., 1883. С.246.

② 弗·普罗科菲耶夫：《赫尔岑传》，张根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93页。

③ 值得一提的是，波兰事件以后，《警钟》在俄国的发行量急剧减少：“1863年底，《警钟》的发行量从2500份、2000份，跌到了500份，从此再也没有超过1000份。”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下)，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

己的文化生活。在科学、艺术、文学及所有文明的领域，波兰常常关注欧洲其他国家并与之竞争，却从未把那些落后的、异端的国家视为自己人。”^①在这里，所谓“落后的、异端的国家”指的就是俄国，这也成了后来有人攻击作者不但亲波兰，而且攻击俄罗斯之依据。

斯特拉霍夫认为“波兰问题”可从两方面来看：波兰人看俄国与俄国人看波兰。波兰人之所以非要从斯拉夫大家庭里分离出来不可，其主要原因便在于它认为自己从文化上隶属于欧洲，它不屑与俄国这种“野蛮落后”的国家为伍。作者认为波兰人的这一看法并非没有根据：首先，波兰接受的是天主教，有别于俄国的东正教，就在欧洲影响而言，前者显然要高于后者。其次，“在科学、在艺术、在文学及在文明展现的一切中，它与欧洲大家庭中其他国家既友好又竞争，从未落后于其他国家或显得生疏。”^②再次，由于波兰发达的文化及其天主教背景，使之成为西欧文化东扩的先锋，在历史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于乌克兰等地区的影响。因此，在批评家看来，“波兰问题”究其根本，在于两种文化的矛盾，在于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在于西方与东方的冲突。“波兰人满怀真诚地自认为是文明的代表，他们与我们数世纪的斗争直接被视为欧洲文化与亚洲野蛮的斗争。”^③值得一提的是，1869年的《朝霞》(Заря)杂志刊载了丹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 1822-1885)的《俄罗斯与欧洲》(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一文，斯特拉霍夫正是该文的编辑。6年前斯特拉霍夫在《致命的问题》中所阐述的“文明冲突论”，在丹尼列夫斯基的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更为完整的论述。

第二个问题是俄国人看波兰。批评家认为，此时此刻，在与波兰人的斗争中，俄罗斯人把什么作为依靠呢？“我们只有一样：我们建立了、捍卫了我们的国家，巩固了它的统一，我们组织了巨大而牢固的国家。”^④俄国的力量在于其军事力量。自从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俄国历来被视为欧洲的强国，甚至成为镇压1848年革命的“欧洲宪兵”。可是在文化冲突

① Страхов Н.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М.: 2010. С.38.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С.44.

④ Там же. С.40.

中，仅仅依靠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斯特拉霍夫看来，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只是为独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还远非生活本身。”^①就文化层面来说，俄国文化始终摆脱不了模仿的痕迹，从法国的古典主义、启蒙思想到德国的黑格尔哲学，俄国在思想上更多的是在模仿西方，独创性甚至比不上波兰，所以才出现了波兰的反抗。在今天看来，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文化上的盲目崇外，是19世纪俄罗斯的一个主要悖论。俄罗斯之所以长期被视为“欧洲的野蛮人”，其缘由也多半在此。批评家继而认为，俄国要最终解决波兰问题，首先要在文化上强调自己的特质，要告诉波兰人：“你们误会了自己的伟大意义，你们被自己的波兰文明蒙蔽了双眼；在这种蒙蔽中，你们不愿或不能看到，与你们斗争竞争的不是亚洲的野蛮，而是另一种文明，更坚定顽强的俄罗斯文明。”^②波兰并不像有些革命民主派所说的那样值得同情，因为它明明是个斯拉夫国家，却偏偏要去寻求西欧文化作为自己的精神根基，因此它亡国了。但它的命运却可以成为俄国的前车之鉴：一个大国的兴起，至少在文化上必须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过，斯特拉霍夫在这里进一步指出，尽管从19世纪40年代的斯拉夫派以来，思想界对于俄国文明及其前景一向态度乐观，但这种光明前景的依据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却很少有人去考虑。斯特拉霍夫说：“我们的一切都处在萌芽时期，一切处于初始的模糊的状态，一切都孕育着未来，但现在却模糊不定。”^③当然，在批评家看来，这种“模糊不定”正是今日俄国文化界思想界努力之根据。

斯特拉霍夫的本意，是以波兰事件为契机，反思俄国的文化身份问题。但这一意图却因为他写作风格的问题未能实现。斯特拉霍夫历来不是那种观点明确、文字清晰的批评家。批评家自己后来也承认：“杂志查封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引者注）对我的文章在叙述的枯燥和抽象性方面略有微词，对于这种批评我当时有点委屈，不过我现在乐意承认他的意见是正确的。”^④或许是爱之深，责之切，斯特拉

① Страхов Н.Н. Борьба с Западом. С.40.

② Там же. С.45.

③ Там же.

④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48页。

霍夫在文章中过于强调波兰文化的先进，对俄国文化批评较多。在那种敏感的舆论氛围中，这种言词很容易被人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6月17日致屠格涅夫的信里为这篇文章作了辩解：“文章（作者是斯特拉霍夫）的中心思想是：波兰人居然像对待野蛮人那样蔑视我们，以自己的欧洲文明在我们面前自命不凡，因此他们和我们在道义上的（即最牢固的）长期妥协几乎是难以预计的。……很有意思的是：许多激烈反对我们的正派人都承认没有读过（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我们的文章。”^①但文人的抱怨抵挡不住政府的压力。在官方的干预下，刊登此文的《时报》杂志被勒令停刊，斯特拉霍夫也遭到处罚：15年内不得在任何杂志担任编委^②，这极大地影响了批评家的正常生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抽象性、超越性使得斯特拉霍夫成为19世纪俄国思想家中较早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波兰问题的人，也使他成为较早提出建设俄国特色的文化之路的思想家。

二、卡特科夫的回音

在《时报》被查禁之后，斯特拉霍夫曾致信《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希望能在杂志上发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作为对斯特拉霍夫来信的公开回复，同时也出于推动官方早日确定对波兰政策的需要，卡特科夫从1863年1月起义爆发开始到次年3月，接连发表了17篇文章^③。考虑到当时官方对波兰问题尚未有明确对策，卡特科夫如此旗帜鲜明地表态，不仅使杂志人气骤升，而且对促进官方政策的出台、统一俄国社会舆论，大有裨益。难怪后世研究者认为，卡特科夫的这几篇政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政府行为的特点”。因为“在大国观念的一切共性方面，不但斯拉夫派的《时报》，或者自由派的《圣彼得堡消息》，甚至官方的《俄国残疾人》，在起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冯增义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② Страхов Н.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ьма и заметки из записной книжки 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Пб., 1883. С.250.

③ 这个数字来自2011年出版的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 В 6 т. 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 СПб., 2011.基本上收集了卡特科夫论波兰问题的主要篇章。

义之初都未像卡特科夫的报纸那样持有如此好战、如此不妥协的立场。”^①

卡特科夫是 19 世纪中后期俄国颇具影响的社会政论家、出版家及文学评论家。1855 年，借着新沙皇登基后的宽松形势，卡特科夫申请出版《俄国导报》这一刊物。凭着自己杰出的政论才能，日益声名鹊起。到 1862 年，该刊物的订数已达到 5,700 册，这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仅次于老牌的《现代人》杂志（它的订数是 7,000）。卡特科夫本人也因此跻身于俄国最著名的政论家之列。1863 年波兰事件的爆发，也使卡特科夫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此后，他不仅成了保守派的领军人物，而且其麾下的一报一刊也对俄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影响。他刊物上的各种涉外评论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官方外交政策的变化，以至于卡特科夫文集第 1 卷总序的标题就用了时任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句话：“俄国……有两位帝王：亚历山大二世与卡特科夫。”^②当代俄罗斯学者叶戈罗夫也曾指出：卡特科夫的《莫斯科新闻》和《俄国导报》是“全国一切保守力量的组织中心”，^③足见卡特科夫影响之大。

跟斯特拉霍夫侧重文化角度的论述不同（这种角度的弊端在于脱离实际，有泛泛而论的嫌疑），卡特科夫从历史、现实、政治方面逐一剖析波兰问题的实质，分析了波兰问题形成的原因，最后指出俄国在波兰问题上应该持有的态度。自然，他的这些论断在许多方面跟沙皇政府高层不谋而合，因而最终得到了采纳。

在题为《波兰问题》的文章中，卡特科夫一开始就说：“在政治世界里没有比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更具有欺骗性的了。”^④所谓“普遍原则和抽象的公式”，就是指当时欧洲盛行的“民族权利”和“不干涉原则”。波兰自从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后，有密茨凯维奇、肖邦等人人为之大洒亡国之泪，因而在 19 世纪的欧洲始终是受压迫的象征。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自维也纳会议以来，波兰的压迫者就成了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民主主

① Твардовская В.А.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М.Н.Катков и его изда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8. С. 26-27.

②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1.Заслуга Пушкина: О литератор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СПб., 2010. С.11.

③ Егоров Б.Ф. Избранное.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деи в России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Летний сад, 2009. С.609.

④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 СПб., 2011. С.14.

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对手。法国和英国因为在欧洲没有统治隶属民族，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同情受人统治的波兰人来满足自由派的感情。各国的民主主义者都一致起来猛烈地谴责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专制统治。波兰蒙受的不公正待遇给这种谴责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把柄。……在十九世纪民主主义者手中，波兰的事业成了国际正义的象征。”^①波兰特殊的国情和地理位置使它成为 19 世纪欧洲政治的焦点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②在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面前，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即使不是公开，至少也不愿支持官方对波兰的镇压。流亡在国外的侨民如赫尔岑、巴枯宁者，更是抓住这个机会，四处发送传单，呼吁在波兰的俄国官兵调转枪口，跟波兰兄弟一起，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巴枯宁甚至同意发表宣言：“命令”俄国驻军“撤回斯摩棱斯克，撤回第聂伯河以南。”^③虽然巴枯宁并无此等能力，但这种态度实质上同意了将波兰领土恢复到 1772 年三国瓜分之前的状态。考虑到巴枯宁在当时俄国侨民中所具有的影响，这种表态不可小觑。

正因如此，卡特科夫才强烈反对这种态度。他认为：西欧各国及流亡侨民只知道波兰被俄国占领，受到俄国军队镇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境外势力的干预和波兰本身的野心膨胀。在卡特科夫看来，波兰的野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英法等国的支持，他们试图借助波兰之手削弱俄国，波兰只不过是他们操纵利用的一个工具（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在事件发生后马上跑到法国、英国去寻求帮助）。其次则是俄国国内外一些人士的冷漠和退让。他在题为《波兰起义不是人民起义，而是小贵族与神职人员的起义》的文章中，不但指出了波兰起义的性质，更指出了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俄国社会的冷漠和退让：“在此有责任

①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宋献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42-143 页。

② 恩格斯：《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40 页。

③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巴枯宁传》，第 291 页。

的是我们整体生活的方式，它导致了公众利益的冷漠。”^①所谓“整体生活的方式”，就是指知识阶层的西化，他们把西欧视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包含西欧文化的波兰则是这种文化的体现者，认为波兰人的反抗是文明对抗黑暗、民主对抗反动的正义斗争。因此，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在国家利益遭到损害时不但不思救国，反而以各种方式支持敌人，对自己人则漠不关心。卡特科夫认为，这实在是书呆子习气，须知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根本在于利益，跟普世价值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不要去跟英国人谈印度的民族权利，他会将你视为疯子；就像你跟法国人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权利一样。”^②既然如此，凭什么讲到俄国跟波兰的时候，西方舆论和某些民主人士就会莫名惊诧了呢？卡特科夫在此点明了英法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不但在当时令许多人如梦方醒，在今天类似的情境下也值得我们反思。这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的普世观念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 1834-1902）曾撰文指出：“它（指民族性——引者注）是对民主的驳斥，因为它为大众意志的运作设下了界线，而代之以一个更高的原则。”^③换言之，民主的普世原则为民族利益所取代。

波兰事件发生于 1863 年 1 月 12 日，卡特科夫 14 日就有短评，愤恨不已地谈到了 12 日夜里波兰人潜入俄军军营残杀熟睡中的俄国士兵。在随后的《俄国问题》一文中，卡特科夫以当时流传的一份波兰传单为依据，直接指出了波兰对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土要求。虽然该传单打着中间调解人的旗号，要求俄国与波兰停止战争，波兰加入俄国。但与此同时也要求俄国赋予波兰更多的特殊优待，比如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的人口可与波兰王国互相流动，促进交流。卡特科夫极力反对此种言论。他认为，从历史上来说，亚历山大一世在 1815 年让波兰成立王国，拥有君主立宪的独立宪法，这已是极大的优惠。但这种优惠换来的是波兰野心的膨胀，波兰人试图恢复 18 世纪被瓜分前波兰贵族共和国的版图，如红党领导人路·梅洛斯瓦洛夫斯基就要求波兰地主必须保持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

①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 С.134.

② Там же. С.16.

③ 约翰·阿克顿：《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419 页。

民的统治。从历史上说，俄国的西部领土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曾是波兰的。如果答应波兰人的条件，给予他们各种特权，那最后的结果不是波兰与俄国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而是波兰强大而俄国弱小。“波兰人不要自己纯粹的波兰王国；他们试图重建它，但有个必要条件即立刻征服立陶宛和俄罗斯。对我们来说，波兰问题具有民族特点；对于波兰贪权者来说，这个问题涉及使俄罗斯民族臣服于尚待重建的波兰王国。”^①卡特科夫进一步指出：按照这一目的，俄国势力在立陶宛、白俄罗斯及乌克兰将受到削弱：土地被波兰人收买，俄罗斯官员将受到波兰人排斥，影响渐弱^②。所以卡特科夫得出结论说：“不，我们与波兰的战争不是为政治而战，这是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对波兰爱国主义者的要求作让步，那就意味着我们给俄罗斯民族签署了死刑判决书。”^③对于 1863 年的波兰事件，史学界总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波兰民众反对俄国沙皇专制暴政的起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这是一场两个民族间的战争。前者是苏联时期的主流观点，其始作俑者为无产阶级史学家米·尼·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④。后者则是俄国贵族及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卡特科夫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应该说，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也都部分地符合历史真实，但苏联时期的研究者过于强调前一种观点，事实上反而模糊了历史真实。

对于 1863 年的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波兰已并入俄国多年，早已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大诗人普希金在这一点上也概莫能外。波兰曾于 1830 年爆发过反抗俄国的起义，俄军因残酷镇压起义者而招致西欧各国的谴责。普希金却用诗歌为俄罗斯辩护，认为沙俄对波兰的镇压只是“斯拉夫之间古老的家庭争端”，并且提出：

①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 С.135.

② 波兰起义并不局限于波兰，在波兰红党左翼领导人谢拉科夫斯基等人的策划下，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也爆发了起义。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269 页。十月革命后，毕苏茨基为首的波兰军队对该地的入侵，也是这种策略的延续。

③ Катков М.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6 т. Т.3 Власть и террор. С.23.

④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是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学者之一，参见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上册，贝璋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177-181 页。

“是让斯拉夫的条条小溪汇入俄国之海，
还是一任大海干涸？”

在获悉俄军重占华沙之后，诗人更发表诗作《鲍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将其与俄国历史上反抗拿破仑入侵的鲍罗金诺战役相提并论：

“——在鲍罗金诺日，
我们的战旗又一次破阵闯入
再度陷落的华沙城的缺口；
波兰好像一团奔逃的士兵，
血染的战旗丢弃在尘埃之中，
被镇压的反叛便默不作声。”^①

事实上，对于经历过 1612 年混乱年代的俄国来说，对波兰试图控制俄国的野心并不陌生。1604-1612 年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这与波兰的武装干涉有很多关系。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III Waza，1566-1632）企图占领俄罗斯，先后两度支持伪德米特里成为俄罗斯沙皇。波兰军队甚至直接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等三个地方。1812 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波兰直接派兵参加法国阵营，在整个欧洲联军中，波兰军队的数量仅次于法国。如今风水轮流转，轮到俄国控制波兰，凭什么要因为“正义自由”这种字眼而放任强邻在侧，养虎为患呢？

在分析完波兰起义的原因和性质之后，卡特科夫趁热打铁继续发表了《我们对波兰怎么办？》一文，直接为政府当局的善后出谋划策。卡特科夫提出了三个方案：（1）像 1815 年那样，赋予波兰特殊地位，继续与俄国合并；（2）让波兰独立；（3）将波兰并入俄国，其地位与其他行政区一视同仁。卡特科夫认为，历史已证明：第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早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亚历山大一世就为波兰王国制定了一部堪称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宪法，使波兰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自治国家。但今天看来，恰恰是这种宽容或者说放纵，导致了暴乱。第二条路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事实上对俄国未来发展不利。因此，俄国只有第三条路可选：必须严厉镇压波兰

^① 卢永选编：《普希金文集》抒情诗，乌兰汗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第 317 页。

的地主及贵族，收缴其土地，将其转手给俄罗斯地主，以加强俄罗斯人在波兰及西部省份的影响。卡特科夫的意图是，通过所谓的“非波兰化”及“俄罗斯化”，将多民族的帝国转化为现代化的公民国家。这一提议的实际效果，或可从俄裔美国史学家梁赞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1923-2011）的研究中略知一二。农奴制改革到1905年彻底废除农奴所需偿还的债务为止，俄国南方和北方的农奴主们获得的补偿，基本上超过了其土地本身的价值。“只有西部省份的波兰或者波兰裔的地主是例外，他们获得的补偿要少于他们土地的实际价值。”^①这应该不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而是政府对波兰力量的故意打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卡特科夫对波兰问题的认识自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但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卡特科夫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为捍卫俄国的利益而战，实在也无可厚非。这也是他在当时能受到上至宫廷、下到普通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波兰总督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哥哥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Великий Князь 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1827-1892），卡特科夫一味抨击帝国对波兰政策的种种失误，为自己晚年的人生悲剧埋下了种子。

三、阿克萨科夫的补充

相对于斯特拉霍夫的文化角度、卡特科夫的现实政治角度，以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则是从道德的高度来审视波兰问题。作为“青年斯拉夫派中最伟大的文人”、“最伟大的俄国政论家”^②，阿克萨科夫对波兰问题的思考，远在波兰事件爆发之前就已开始，且自有其独到之处。比如1861年11月18日的《白天》（День）报上，刊登了阿克萨科夫的文章：《我们与波兰的道德关系》。作者一开篇就声明：“只有道德真理、永恒因素，爱与公正才能在历史上具有真正的力量、真正的意义。这些因素并非常常

①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等著：《俄罗斯史》第7版，杨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4页。

② 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

得到思想家们的承认和关注，却又是诸多民族社会生活的推动力，为它们指出这样那样的历史道路方向，不仅从内部，而且从外部决定了它们的发展。”^①作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各国娴熟的外交艺术而言，俄国外交政策过于坦诚而又笨拙，但这种特性并非来自于某些达官显贵的个性，而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天性使然，这恰恰构成了俄罗斯在对外方面的道德优越。相形之下，“波兰社会内部分裂、贵族与天主教的谎言、对斯拉夫因素的背叛、波兰民族的骄傲与偏执，以及它在其他兄弟民族中引起的仇恨，导致了波兰的沦落。”^②一兴一亡，皆在道德。道德立场是作者审视波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有别于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的地方。

在波兰事件发生后的1863年8月10日，阿克萨科夫又发表了《谎言已成为波兰本质的一部分》一文，进一步从道德角度抨击波兰独立人士。作者首先指出，波兰事件后出现的大量小册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充分说明“充斥于整个现代波兰上流社会肌体的谎言不再是自主意识下的行为，而已成为波兰本质（我们不是说普通波兰人，而是讲波兰上流社会）中自然的、完全坦诚的内在功能。”^③阿克萨科夫以诗人密茨凯维奇的儿子弗拉基斯拉夫·密茨凯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Мицкевич）1863年初在巴黎出版的书——《波兰及其南部省份》为例，认为书中不但歪曲历史，把波兰国王对基辅的占领比作法国王亨利四世向巴黎的进军，而且完全虚构了俄罗斯南部地区的景象，虽然作者打着实地考察的旗号，言之凿凿地称自己是真实记录。此外，该书还引用莫须有的言论，说俄罗斯自认为自己已经超越了欧洲许多国家，并自称为北方的法国人。事实上俄罗斯根本不存在这种言论，作者如此妄言，无非是出于抹黑俄罗斯形象的目的。对于这种出于政治目的、蓄意将谎言视为真理并加以无限传播的做法，阿克萨科夫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真相与谎言的问题，而是说谎者自身判断标准出了问题。阿克萨科夫将其视为一种生理疾病。用今天的话说，现实的政治目的超越了真理与谎言本身，目的高于手段，这种做法比单纯的谎言更具危害性。

在阿克萨科夫看来，波兰人的谎言无非出于利益的诉求。正如某位格

① Аксаков Иван. Наше знамя-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Москва, 2008. С.282.

② Там же. С.287.

③ Там же.С.301.

勒菲尔丁（Гельфердинг）先生所认为的：“……波兰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波兰贪图俄罗斯的领土。”^①波兰与俄罗斯的矛盾在于两方面：其一是民族独立，其二是领土诉求。对于俄罗斯来说，波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波兰是俄罗斯社会的一部分，俄罗斯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那样完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就民族形象而言，波兰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不但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也获得了许多支持。这种支持使得它迸发出了复国的狂热愿望。正如阿克萨科夫所说：“我们将波兰并入自己的版图，也将波兰赶入了自身，使俄罗斯也中了波兰的毒。”^②针对上述矛盾，阿克萨科夫认为，除了“俄国社会持续努力以巩固它在西部地区的根基”^③之外，在社会影响方面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取缔波兰政治中心，避免其国家生活的过度发展，进而在消除其社会影响后彻底废除这一病态的、异常的波兰社会。应该指出，作者在这里讲得非常简单，寥寥数语便结束了文章。按照笔者的理解，阿克萨科夫的意思是要限制波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弱化波兰作为独立民族的色彩，尽量使其融入俄罗斯大家庭，以免它在独立复国的路上越走越远。

作为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的评论并没有卡特科夫那样来得具体而富有实践性，但他立足俄国传统社会道德，批评波兰社会因痴迷于独立复国而舍弃一切道德规范，这实际上击中了波兰独立分子的软肋。试想，一个连基本道德规范都不遵守的社会，退一万步讲，即使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是否能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四、讨论的意义

波兰事件从开始到停息，持续了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传统史学观点往往仅将其视为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又一次努力^④，却忽视了事件本身对于俄

① Аксаков Иван. Наше знамя-русск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С.305.

② Там же.С.308.

③ Там же. С.309.

④ 或如史家所说：“一月起义担负着推翻沙皇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双重历史任务，是一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参见刘祖熙：《波兰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7页。

国社会的冲击。事实上，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来说，波兰问题既是一个文化归属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的总爆发恰恰是在俄罗斯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这就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波兰事件的意义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思考：前者主要是指波兰事件在当时对俄国社会的多方面冲击，后者则是指对这种冲击的反思在今天的各种借鉴意义。

19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意大利的统一和普鲁士的立国，无不昭示着这一世纪潮流的兴起。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似乎并不算早。1831年，尼古拉一世在镇压了波兰起义后，意识到民族主义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责成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С.Уваров, 1786-1855）提出了“东正教、沙皇专制和民族性”的官方理论。但这一理论过于强调俄国社会特性中保守的一面，因而遭到普希金等人的批评。后者认为，民族性既有民族的一面，也有人民的一面。^①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打破了俄国人的欧洲强国之梦，以农奴制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之优劣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呈现在大众眼前。进入60年代，批评家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就已经注意到时代问题的焦点在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问题。他在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指出：“在我们所有问题——关于农奴制现状（何为犬儒主义？）及政治自由（哦，可怕！）——中就其自身意义而言还有更深刻更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文化和思想**独特性**的问题。”^②两年后的波兰事件恰恰对思考文化独特性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俄国文学、思想大发展的催化剂之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之后部分批评家开始摆脱西方思想的影响，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审视俄罗斯文学^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民族意识的剖析。1869年《战争与和平》的出版，在俄国文学界激起了千层巨浪。虽然仍有批评家从历史真实、阶级立场等角

① 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ь”既有民族性，也有人民性的意思。关于这一点可参见陈训明：“普希金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人民性的论述”，载《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第66-71页。

② Григорьев Аполлон. Письма. Москва:Наука, 1999. С.253.

③ 此前别林斯基曾论述过普希金创作的民族性，但因普希金在当时世界文坛地位尚不高，这种论述多少显得有些拔高。稍后屠格涅夫因情感问题久居英法，与福楼拜等人的交往也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俄国文学。但这种宣传具有较多的私人性质，自身未必真正意识到俄国文学的民族性。因此，俄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还是1860年代以后的事情。

度来解读该作，但斯特拉霍夫的阐释重点却是小说中的俄国特性，其主要观点自然跟之前那篇《致命的问题》一脉相承。《战争与和平》是俄国人寻找民族自我、发掘民族根基的最初尝试。在批评家看来，这种尝试的结果——《战争与和平》就是“与西方斗争的一种新武器”^①。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文学开始摆脱模仿西方的套路，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

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说，在整个沙皇帝国的西南边境，“俄罗斯化”的政策成为官方的基本方案。一切涉及波兰独立的東西都被取缔：波兰王国的名称被“维斯瓦边区”所取代；波兰不再设名义上的国王，沙皇任命的总督兼华沙军区司令独揽大权；波兰银行成为俄罗斯国家银行华沙分行；天主教会受到沉重打击，神职人员由官方授命，大量居民被迫改宗东正教；俄语成为官方用语。以上大多数措施都能从卡特科夫等人的政论中找到草案。1864年，波兰废除了农奴制度，工业得到极大发展。此后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波兰始终未有大规模的革命或暴动事件发生。这一方面固然跟国际大形势有关，但也多少可以证明俄国政府在波兰实行的政策是成功的，“俄罗斯化”的效果是明显的。

从俄国社会内部来说，波兰事件促成了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向：由崇拜西欧转为维护帝国利益。借用斯特拉霍夫在评价屠格涅夫小说《烟》时所说的话：“用文学的套话来说，1862年以前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是西欧派。那一年之后，我们所有人又或多或少成了斯拉夫派。”^②波兰事件之前，如卡特科夫等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莫斯科消息》等报刊抨击时政，要求当局实行英国式的宪政^③。《俄国导报》因其立场的进步性而

① Страхов Н.Н.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об И.С.Тургеневе и Л.Н.Толстом (1862-1885) Издание четвертое. Киев, 1901. С.276.

② Там же. С.74.

③ 卡特科夫极为推崇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美国史学家拉耶夫 (Marc Raeff, 1923-2008) 称卡特科夫称为“反动的自由派”，认为卡特科夫一方面羡慕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方面又执迷于俄国沙皇的特殊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使得卡特科夫外表鼓吹自由主义，而骨子里却坚持沙皇专制。拉耶夫说：“卡特科夫代表了19世纪俄国政治思想中悲剧性的悖论。经济与社会领域中自由与个性的鼓吹者整体上却是保守过时的政治体制的捍卫者。” Marc Raeff, “a Reactionary liberal”, *Russian Review*, 1952, Vol.11, №.3. 在笔者看来，卡特科夫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专制的维护看似矛盾，但它们的连接点是爱国主义。

被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著名阐释者及向社会灌输立宪思想之主要渠道。”^①但当波兰试图独立并窥伺乌克兰等地，俄罗斯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包括卡特科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将民族利益置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之上。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一切俄罗斯人首先是俄罗斯人，然后才属于某个阶层。”^②大敌当前，俄罗斯人自然要一致对外。著名抒情诗人费特(Афанасий Фет, 1820-1892)在愤慨之下，甚至摩拳擦掌，想亲自去参与镇压起义。另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波特金(В.П.Боткин, 1811-1869)则对此表示支持。两人都坚信：“为国家的巩固，为俄罗斯所起的作用，它必须控制波兰。”^③相形之下，像赫尔岑这种号召支持波兰的人反而成了另类，甚至被视为叛国者。波兰事件之后，赫尔岑及其《钟声》在俄国影响式微，或可作证。

需要注意的是，1863年的波兰事件是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爆发的。这样的背景使当时许多俄国人都将波兰起义看做是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国策划的又一次打击^④。波兰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交汇之处。俄国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本身就存在矛盾。1863年4月波兰战事方酣之时，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特地致函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波兰和俄国的天主教会脱离俄国政府而独立，成为“国中之国”。几乎是同时，英法驻俄大使也分别照会俄国政府，指出：波兰问题具有全欧洲的意义，俄国若不给予波兰独立的话，便是自绝于文明世界。^⑤这无疑是在给本已高涨的俄国民族主义情绪火上加油。反向观之，赫尔岑等人将自由民主理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或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不必说在当时的国情下

① 转引自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and its critics-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23.

② 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идцати томах. том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Л.: Наука., 1978. С.57.

③ 苏·阿·罗扎诺娃编：《思想通信——列·尼·托尔斯泰与俄罗斯作家》上册，马肇元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④ 事实上，确有现代史家持此观点。英国史学家泰勒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不管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它实质上是西方对俄国的入侵。”详见 A·J·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06页。

⑤ В·П·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下册)，史源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898页。

缺乏支持者，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是应者寥寥。普世价值——或许正如康德所说的“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①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以便使社会不至于彻底堕落。但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对于普世价值的实际接受时却需谨慎对待，尤其需要提防各种思想背后的利益企图。从这个角度来说，俄国保守派对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其次，对今天来说，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遗产的历史际遇同样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史学界会长期忽略对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他们对革命、对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怀疑甚至反对吗？但如果一种自由思想不能容忍反对它的自由，那这样的自由跟它所反对的独裁又有什么区别？所幸今天的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不但不应否定俄国保守派及其思想，反而要接受并予以推广。因为在历经了各种革命的洗礼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意识到，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一切的普世价值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舍此很容易使人成为某种理论的祭品。何况更重要的是：以卡特科夫为首的这批保守派，“他们爱俄罗斯，他们的心灵为俄罗斯人民而痛苦受难，他们竭尽所能来帮助自己的国家。”^②在波兰问题上，俄国保守派们非常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说，卡特科夫等人对波兰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沙皇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将本民族的发展建立在对其他民族利益的掠夺的基础之上，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加以肯定的。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脱离了具体历史语境的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念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本文着重介绍并分析俄国保守派（包括斯拉夫派）对波兰问题的看法，一方面因为它是俄国思想史上被曲解或被遗忘的一桩公案，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民族文化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尽管有某些不足，但毕竟为我们展示了 100 多年前俄国历史的另一面。

①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177 页。

② Д.Н.Бакун. Авт.-сост. 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осква, ГРИФОН, 2012. С.4.

【Abstract】 As an inevitable factor in Russian politic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Polish issue” has been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n academia. After the Polish uprising in 1863, the Russian publicist such as Strakhov, Katkov and Aksakov discussed about this issue respectively from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ll such analyses reflected furious debates between universal values and nationalism in Russian society in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The Polish Issue, M.N. Katkov, N.N. Strakhov, I.S. Aksakov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избежного фактора в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19-го века получил не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в учёном круге. На основе поль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1863 г, публицист Н.Н.Страхов, консерватор М.Н.Катков, славянофил И.С.Аксаков анализируют в сфере культуры, полит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этого дела и размышляют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а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аскрывают интенсивные дебаты между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й ценностью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19-ого ве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 М.Н. Катков, Н.Н. Страхов, И.С. Аксаков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波兰的长期恐俄症？ 精英和大众态度的比较

雷蒙德·塔拉斯*

【内容提要】东欧大多数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恐俄症是最广泛、最有影响力的民族恐惧，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仍然难以消解。在波兰，由于历史、地缘、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恐俄症在波兰民众心中根深蒂固，调查显示，在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之后，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憎恶又达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恐俄症对于波兰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卡钦斯基执政时期，制造并利用恐俄症，并以此塑造了波兰的对外政策。但调查显示，偏执的反俄情绪也并非所有波兰民众所共有的。整体上，波兰的反俄情绪是一种有理性的恐惧。精英在恐俄症的问题上看法也存在差异，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已经展示出更多与传统行动路径截然不同的倾向。

【关键词】波兰 长期恐俄症 精英态度 大众态度

【中图分类号】D83/87(51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4) 01-0022-(21)

相对于威权体制中领袖的政策偏好会成为国家的政策偏好，民主制从定义来看能更为敏锐地反映民意，让民意成为政策形成的诸多要素之一。因此，“民主选举权可能令社会更为偏好温和的对外政策……据此推断，那些难以

* 雷蒙德·塔拉斯 (Ramond Tarus)，美国杜兰 (Tulane) 大学政治系教授。

从战争受益甚或厌恶战争的人肯定会投票反对战争。”^①当然，民众并不总能看出他们的实在利益（objective interests）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民主的选举权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会引发对别国的战争。仇外情绪在民主国家可能有特别的影响力。“散播谣言（demagoguery）在人民（the demos）有些权力的地方最有效果。”^②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流言，是针对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和国内不被喜欢的少数民族的那种类型。煽动仇外情绪，在对外政策上可能会产生对厌恶国不理性的安全忧虑以及相应的对抗性政策。例如，如果大部分民众表现出反俄的态度，那就可能不仅让宣传恐俄论的政党赢得选举，也会使得反俄的政治领导人获得制定对俄政策的权力。

在大多数中东欧地区，恐俄症在历史上就是最大的国家恐惧，也是最有影响的。它意味着“极其仇恨”——深入骨髓的敌视——虽然诸国（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争端通常会产生其他的憎恶。这一地区的人民能够列举多种历史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一定会恐惧俄罗斯。但自从苏联帝国崩溃之后，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更难以言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可能是今天人们一直很少关心克里姆林宫政治的主要原因。（沙俄）领土收复主义（irredentism）虽可讨论，但俄罗斯影响力的扩张却毋庸置疑。在本文中，我提出一个被普遍忽视的方法，认为俄罗斯正通过这一方法对邻国构成威胁：即对谁是俄罗斯国外同胞（compatriots abroad）进行灵活（malleable）的理解，从而给出俄罗斯的 мы（我们）的合理重塑（recasting）和拓展（broadening）。

恐俄症的根源

对不同国家过时的成见（stereotypes）充盈于大众的意识之中。作为一个延续数世纪的帝国，俄罗斯收获的成见要远高于一般国家。俄罗斯毫不留情地追求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安纳托利·列文（Anatol Lieven）评论说，“因此，今天的恐俄症不是植根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是

① Ronald Rogowski,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s on Strategic Choice”, in David A.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2.

② Ibid, p.133.

民族憎恶……在这些关于‘敌’国仇恨的、精挑细选或是发明出来的历史‘事实’的结构中，它的文化、它的激进特性被抽离出环境，放入预先安排的知识结构中，以责难对方永恒不变的邪恶”。^①在毁谤俄国的共同的神话里，都说俄国独特的文化注定了它永远落后，它缺乏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前提，它注定是反西方的。^②

人民支持领导人政策的趋势能够为仇外提供基础。将“俄罗斯”而非“苏联”等同于二战后的东欧压迫者，滋养了恐俄症。因为，甚至今天那个地区的许多公民——在西方也是如此——都在怀疑，一直与威权主义实践有联系的俄罗斯是否已经真正去苏联化（desovietized）了。

所以，恐俄症可能首先是一个政治建构，但是它经常与民族（ethnic）的理解混在一起。^③强调这些没有意义，沙俄和苏联对外政策“不断向外拓展俄罗斯的边疆，对所有民族都冷血无视”。^④什么是政治的，什么是民族的，变得模糊不清。

恐俄症的类型包括以下几点：

- 1，对俄罗斯 a) 政治精英； b) 文化； c) 人民的偏见，敌意或者仇恨；
- 2，对俄罗斯的焦虑和恐惧——它的国际势力，军事力量和大战略；
- 3，对俄国病态的迷恋，由于： a) 它过去引起创伤； b) 与压迫者相联系； c) 自我厌恶。

弗拉基米尔·普京（Vadimir Putin）治下的俄罗斯政治复兴，使得恐俄症在西方死灰复燃，而它在东方也许从未减弱过。有关俄罗斯威胁不断增加

① Anatol Lieven, “Against Russophobia”,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0-2001, Vol. 17, No.4, p.28. 对这个现象的早期研究参见 John Howard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cy and Opin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② David Foglesong and Gordon M.Hahn, “Ten Myths about Russia: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Russia’s Complexity and Ambiguity”, i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2002, Vol.49, No.6, pp.6-9.

③ 我很感激斯坦福大学的 Wojciech Zalewski 对我强调这些观点。

④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9, p.300.

的新闻报道在近几年激增。^①BBC世界服务调查(BBC World Service Survey)发现,俄国形象在2008年开始恶化。21个国家的调查对象中,有42%消极看待俄国的影响(仅30%持积极观点)。在美国,这一比例增长到64%,而一年前还只有36%。德国最为消极(70%),而中国对俄罗斯最为积极(74%持称赞的观点)。反过来,俄国人看待美国比以前更为消极。(从2007年的53%上升到2008年的65%)。越来越多的俄国人以积极的态度看待欧盟的影响。(在2007年、2008年间,从51%下降到31%)。皮尤信托(Pew trust)全球态度调查经常提供数据,清晰地展现了国际上对俄国的担忧。单单民意调查并没有提供仇外的确凿证据,政治和学术性话语也需加以考虑。所以,一位英国外交官强调俄罗斯的“不可救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往事一笔勾销。我们所面对的俄罗斯,现在被恐惧所包围,怀疑外国人,天生嗜好独裁政治。古老的俄罗斯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很久。由于北约与欧盟东扩,俄罗斯从来没有消除过对西方‘和平意愿’的疑虑。”在美国,后来的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2008年选举活动中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普京政府已成功地损害了莫斯科的声誉,使恐俄症再次时兴起来”。^②他的目的在于谴责而不是鼓励恐俄情绪,但这也是一种承认,即这种现象在华盛顿已经盛行一段时间了。安德烈·齐甘科夫(Andrei Tsygankov),旅美俄国专家,曾撰写专著批评华盛顿具有影响力的反俄游说集团,阐述让美国新恐俄症(neo-russophobia)时兴的结构性因素和制度背景。他得出结论：“恐俄症并不是美国国家利益,也没有得到美国大众的支持”。^③

英国头牌外交政策研究机构的俄罗斯/欧亚项目的领导警告过前超级大国战略的延续和翻新：“俄罗斯是用21世纪手段——情报和隐蔽渗透,贸易与合资企业,游说结构和诉讼,能源与下游投资,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的各

① 这些书的概览,参见 Stephen Boykewich, “Devilish Forces”,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Winter 2009, pp.224-231. 对俄罗斯消极媒体报道的批评,参见 Anna Smolchenko, “When Success and Image Don’t Mesh”, *Moscow Times*, 27 June 2008. Reported by *Johnson’s Russia List* (2008-122)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default/cfm>. 感谢罗德岛大学 Nicolai Petro 提供的西方反俄新闻偏好的参考书目。

② Joseph Biden, *Wall Street Journal*, 24 March 2008.

③ Andrei Tsygankov, *Russophobia: Anti-Russian Lobb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国散居（diasporas）以及软权力的其他‘文明’样式——来追逐 19/20 世纪的传统目标。”^①

一位英国学者发现，西方一些游说集团再次成功地达到了遏制和孤立俄罗斯的这种冷战时期的目标。的确，“俄国政治缺乏透明性，无助于构建信任。虽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对普京政府提出异议，但无情地否定普京政府，把它的每一个行动都看做是为在俄罗斯建设威权秩序添砖加瓦，这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更何况“俄罗斯雄心的合法性，在于成为一个强国，甚至一个‘正常’的大国，也一直被质疑”。^②

另一位俄国问题专家提到西方普遍的“恐俄症”。这是“那些坚持、渴望 1214 年《大宪章》（Magna Carta）统治的社会对那些 1206 年《成吉思汗法典》（Genghis Khan's Great Yasa）治下的现代社会感到的恐惧。在欧洲，这两者的断层线恰恰位于东欧。”^③这不就含蓄地解释了为什么波兰，《大宪章》俱乐部的可能的成员，惧怕受到成吉思汗鼓舞的俄罗斯吗？

波兰憎恶从未间断

接受反俄态度，波兰人是例外吗？在他们有权决定对俄政策时，他们的反俄态度有价值吗？特别是最近的事件，2010 年 4 月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飞机失事使得许多波兰政界军界领导人丧生，波兰人会对俄罗斯产生更多疑虑吗？还是他们为了促进两国关系的友好只是做一些样子？

一项长期的调查分析结果展现波兰国民偏好与厌恶变化的重要趋势。在

① “European Interview with James Sherr, Manger of the Russian/Eurasia Programme at Chatham House”, *European Interview*, 2009, No.35. Foundation Robert Schuman, at http://www.robert-schuman.eu/entretien_europe.php?num=35

② Richard Sakwa, “‘New Cold War’ or ‘Twenty Years’ Crisis’ Russia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 Vol.84, No.2, pp.249, 253.

③ John Russell, “The Problem with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ir ‘Chechenophobia’, or our ‘Eurasiphobia?’”,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New York, 15 February 2009. Russell borrows the Magna Carta versus Great Yasa dichotomy from Yury Afanasiev, “The End of Russia?”, *Open Democracy*, 21 January 2009. <http://opendemocracy.net/article/Russia-theme/the-end-of-russia>. 1206 年《成吉思汗法典》是成吉思汗条针对民众列出的各种犯罪的惩罚性规则。1214 年《大宪章》列举出了英国人所享有的个人自由。

1993年，意大利人，美国人和法国人被波兰人列入波兰人最喜欢的民族清单。到2010年，11个欧洲国家列在美国人前头成为波兰人友好的对象，其中最受欢迎的17个国家有15个是欧盟成员国，反映欧盟的全面影响（挪威与美国一样是唯一的例外）。重要的是，在所有17个国家，天主教和新教占主导地位（日本位列第18名）。^①

相比之下，在1993年，罗马尼亚人被列为波兰人最不喜欢的民族。第二年，当吉普赛人（Roma）被加进去进行调查之后，他们立刻超过了罗马尼亚人。3个主要的东正教国家——乌克兰、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依次——紧随其后。白俄罗斯也不受欢迎。在2010年，波兰15个最不喜欢的民族，要么是非欧洲人（例如中国人、越南人），要么从宗教上看不是天主教或者新教民族——有7个是东正教占主导地位民族。最不喜欢的5个民族中有3个是穆斯林（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土耳其人）。因此，在这些排列中，宗教似乎相较于财富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区分作用。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明显的厌恶，意味着伊斯兰恐惧症的存在——在波兰并不存在强有力的伊斯兰共同体。就像波兰没有较多犹太人，却流行反犹主义一样，这样的态度可能是由于天主教人口对“非西方”宗教的厌恶。

波兰的被调查者对其他国家的厌恶在过去20年里下降得非常明显，但他们最不喜欢的民族（nations）依然是吉普赛人、阿拉伯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对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厌恶态度则降到了中间位次。^②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人对其他民族的评价更为积极，俄罗斯人从2010年的第38位上升到第30位，仅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印象。（提升最大的是西班牙人的记录——甚至在该国赢得世界杯之前。）

在天主教国家波兰是否存在恐惧东正教的偏见呢？调查一直表明，大部分东正教民族——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并不特别讨波兰人喜欢。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书中已经将东正教等同于一个

① “Stosunek polakow do innych narodow”, Warsaw: CBOS, January 2010, BS/12/2010.

② See mean scores reported in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Stosunek polakow do innych narodow”, Warsaw: CBOS, December, 2008, BS/193/2008.

独特的文明。与东正教的疏远，从波兰人的态度中可见一斑。^①矛盾的是，生活在波兰的目标群体微不足道：白俄罗斯人（50,000），乌克兰人（30,000），俄罗斯人（6,000）。

波兰在民族和宗教上都是非常同质化的社会，超过 90%的居民是纯波兰人，在名义上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如果说仇外政治在国家层面上发挥作用，他们就直指外国，而不是国内的少数族群。对俄国人的厌恶很少表现为对生活在波兰的数千俄罗斯人的厌恶，这一切都与双边关系的悠久历史有关。

仇恨的对象是一个外部实体而不是少数民族有意义吗？^② 讨厌邻近的——而不是遥远的——民族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会对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吗？从直觉上看，似乎对外国的憎恶，如俄罗斯，很可能对波兰对外政策的形成产生更大的影响。对外部主体的恐惧很难消解，结果会更持久。相比之下，对为数众多的国内少数民族的憎恶将会随着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互谅互让而逐渐改变。举个例子：波兰人对生活在波兰的乌克兰族的憎恶，由于波兰政府 1989 年之后一贯的政策，即支持乌克兰进入欧洲体系的事业，而彻底转变。我们需要更严密的调查，将针对少数民族同针对外国的仇视情绪相比照，以便获得更多重要的结论。

所以波兰人的恐俄情绪主要来自于对俄国国际行为的敏感。2008 年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之前不久，一项调查发现，54%的波兰被调查者相信俄罗斯正在尝试在东欧恢复影响力，仅 20%的人认为不是如此。^③这些看法与全球的态度倾向是一致的。2009 年的报告发现，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持消极态度——44%消极：31%积极——调查是在俄罗斯近期中断供应欧洲天然气之前进行的。作者解释说，“它的行为越像过去的苏联，国外喜欢它的人似乎就越少。”^④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② 我很感谢 Cas Mudde(Kellog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提出这个问题。

③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Opinie o stosunkach polsko-rosyjskich i możliwości pojednania polsko-niemieckiego i polsko-ukraińskiego”(Warsaw: CBOS, July 2008), BS/113/2008, www.cbos.pl

④ “Russia and China Seen Negatively”, *BBC News*, 6 February 2009.

斯摩棱斯克之后

2010年5月，飞机在斯摩棱斯克坠毁一个月后，波兰人在被问到有关波俄双边关系的一系列问题时，有一半人在回答“波兰最害怕哪个国家？”这一问题时，认为是俄罗斯。这是1990年记录的一倍，当时苏联正处在垂死挣扎之中。但它要比2005年末记录的2/3的顶峰下降一些。^①另一个最为害怕的国家是德国（17%，低于1990年两德进行重新统一谈判时的88%）。有趣的是，并列第三的是由伊斯兰国家像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美国（各7%，美国略高）构成的剩下的那些。2010年5月，有1/5的波兰人认为他们没有敌人。一个违背直觉的发现就是，老年人最不怕俄罗斯，而学历越高的波兰人越有害怕德俄的倾向。

在2010年5月，过半数的受访者（52%）接受波俄关系不好不坏的观点。但有29%的人认为这一关系是好的——达到历史最高点——只有15%的人认为是不好的（自2002年达至最低）。27%的人相信与他们东方邻邦的友好关系是可能的，而22%的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近半数人（48%）认为波俄关系将会在斯摩棱斯克悲剧之后得到改善，而另外37%的人认为关系没有变化。

对我们关于恐俄症研究相当重要的是，波兰人对俄罗斯政府和俄国百姓在这场灾难之后对波兰的积极回应和友好姿态的评价是十分积极的：32%的人认为俄政府的行为超出预期，40%的人认为俄国民众亦是如此。45%的人承认俄政府的行为（在每一方面）符合波兰人的预期。2/3的人赞同俄罗斯政府采取措施帮助遇难者家属的行为是好的。赞同俄政府想要查出坠机原因的人的比例较低（50%），相比之下，34%的人认为俄罗斯从未想过要查出事故的原因。

波兰人对俄国的影响和它所构成的威胁的焦虑——政治问题——没有表现出不断增长的文化憎恶。波兰调查研究者认为，波兰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似乎是由富有的文明化的“西方”的和穷困及文化落后的“东方”的刻板印

^① Cent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Opinie o stosunkach polsko-rosyjskich”, Warsaw: CBOS, June 2010, BS/74/2010, www.cbos.pl

象所塑造的。但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分歧可能部分地是由激进因素和宗教造成的。波兰人最喜欢的 11 个民族是天主教和新教占优势的民族。相比之下，最不喜欢的 9 个民族（以及最不喜欢的 16 个中的 14 个）要么不是欧洲民族，要么从宗教上看是既非天主教也非新教的民族（大多数都是东正教占优势的民族）。

波兰的安全政策与恐俄症

波兰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受到 2003 年波兰参与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的影响。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莱赫·卡钦斯基 (Lech) 与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 (亚雷克) (Jaroslaw(Jarek)) 兄弟 (Kaczynski) (在 2006 到 2007 年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 的私人矛盾，另一方面是他们与默克尔总理和普京总统的矛盾。的确，相形之下，与俄罗斯的接近使波兰与其西方邻居的关系变得糟糕了。正如克里斯托弗·切维斯 (Christopher Chivvs) 和托马斯·瑞德 (Thomas Rid) 所指出的，似乎俄罗斯越是依赖德国与西方联系，德国领导越是努力保持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①而在拿到欧盟的入场券之后，卡钦斯基兄弟类似冷战的政策 (Cold War-like policies) 疏远了他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波兰精英热情地支持 2005 年橙色革命后乌克兰亲西方的领导人，并在欧洲论坛上为该国获得泛欧组织的承认而费尽心力。当 2005 年德国和俄罗斯决定在波兰控制之外的波罗的海海底铺设一条天然气主干管道时，当时的波兰国防部长拉狄克·西科尔斯基 (Radek Sikorski) 把此决定比作 1939 年希特勒和斯大林为瓜分波兰签署的秘密协定。^②

在欧盟峰会上，波兰领导人强调了达成一个共同的欧盟能源安全协定的紧迫性。这一协定却由于俄罗斯与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分别签署能源协定而变得更加难以签署。波兰甚至计划要在北约确立能源领域的相等地位 (the equivalent)，如果成员国能源供应出现危机，其他成员国要给予帮助。

① 例如，参见 Christopher S. Chivvis and Thomas Rid, “The Roots of Germany’s Russia Policy”, *Survival*, Vol.51, No.2, April 2009, pp.105-122.

② “Polish Minister Attacks Schroder and Merkel”, Spiegel Online, 1 May 2006.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0,1518,413969,00.html>

在欧盟 2006 年赫尔辛基峰会上，波兰否决了欧俄伙伴关系谈判的启动，原因在于俄罗斯表面上出于健康考虑禁止了波兰肉类和蔬菜产品的进口。^① 欧盟峰会作出联合支持波兰的样子，而波俄关系受到了影响。

于是在卡钦斯基政府时期，波兰成了加剧欧俄紧张关系的破坏者。欧洲东、西部国家常常由于在处理对俄关系上的分歧而导致外交政策的分裂，波兰领导人却认为，他们正在有力地表达许多邻国的关切。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中东欧（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EE）代表和他们的民众通常将西欧成员视为对俄罗斯的绥靖者（appeasers），而西欧人则认为中东欧成员对莫斯科过于敌对了。”^②

波兰人在批评俄罗斯时似乎是过于坦率了。例如，西科尔斯基就挑衅式地评论道，“我们和德国的关系是广泛和深刻的，是大家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与俄罗斯联邦的关系却是不同的。”^③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普京为俄罗斯增加了一个新的国家节日，以庆祝 1612 年波兰军队被赶出莫斯科。

2007 年 10 月波兰议会的选举结果是，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政府失利，自由主义者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出任总理。几个月后，图斯克访问莫斯科，会见了总理普京。他谈到了两国之间的和解：“两边都厌倦‘冷漠’气氛”。在 2009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两人再次见面并同意举办一系列协商会议。但是 2009 年 4 月的日程，即普京访问华沙要进行的“广泛议程”——友好国家的议题暨两国“最重要的伙伴”计划的讨论，被推迟了。恰相反，普京此次访问被塑造为一次象征性的访问，似示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格但斯克（Gdansk）九月爆发七十周年——而不像他在 2005 年对奥斯维辛（Auschwitz）访问纪念集中营的解放。

据说“普京在波兰的行动获得许多以往的俄罗斯批评者的赞扬，尽管没有完全满足波兰对俄罗斯应负责任的要求。”^④俄罗斯领导人称，“俄罗斯永

① Quoted in “EU, Russia play down discord after Polish veto”, *Agence France Presse*, 24 November 2006.

② Janusz Bugajski and Ilona Teleki, *Atlantic Bridges: Atlantic Bridges: America's New European Alli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p.39.

③ Quoted in Jan Cienski, “Relations with Russia: Intent on keeping clear of the bear's embrace”, *Financial Times*, 20 December 2006.

④ “In a Visit, Putin Tries to Ease Rifts with Poland”, *New York Times*, 1 September 2009.

远钦佩波兰人民、士兵和军官们的勇敢和英雄气概。在 1939 年，是他们最先应战纳粹。”卡钦斯基总统那时更具攻击性，形容 1939 年 9 月莫斯科对波兰的入侵就像“用刀刺入波兰后背”。波兰领导人与那些前苏联集团国家一样，将苏联在战时的行为等同于纳粹罪行，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对。

华沙对前苏联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支持，在卡钦斯基兄弟执政时期最为热情。莱赫与这两个国家的总统维克多·尤先科（Victor Yushchenko）和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ael Saakashvili）的密切关系惹恼了克里姆林宫。2008 年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由波兰和瑞典（当然，由中右翼党执政）这对最不可能的盟友提出的东方邻居（Eastern Neighborhood）倡议。它的目标在于拉近欧盟与俄罗斯周边的前苏联共和国的关系。到 2009 年夏季，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已经签署了这个倡议。在 2009 年哈博罗夫斯克举办的欧盟—俄罗斯峰会上，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警告说，俄罗斯“不希望东方的伙伴关系变成针对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我仅仅不希望这种伙伴关系让那些有反俄罗斯嗜好的个别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联合起来。”^①

波俄关系中最被广为报道的问题，就是 2007 年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将在其国土上部署美国导弹拦截装置和雷达基地的协定。俄罗斯出于报复退出了 1990 年的限制欧洲军备水平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onventional Forces Europe Treaty）。克里姆林宫也威胁在波兰北边的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部署俄罗斯导弹。

波兰公众并没有给导弹防御体系以强大的支持。甚至在 2008 年夏末的俄格战争之后，反对者仍以 46% 的比例超过了支持者的 41%。到 2009 年春季，这种差距又回到了战前的水平：52% 反对，只有 29% 支持。^②这种“反战主义”情绪并不表明波兰公众长期的恐俄情绪，它也没有反映公众认可把波兰视为保卫西方文明最后一道防线的国家角色的概念，而导弹防御体系可以被理解成这种象征。

^① “Russia Alarmed over New EU Pact”, *BBC News*, 22 May 2009.

^② Centurum Badania Opinii Społecznej, “Opinia publiczna o tarczy antyrakietowej”, Warsaw: CBOS, March 2009, BX/45/2009, www.cbos.pl.

2009年7月，前总统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前国防部长亚努什·奥涅什凯维奇（Janusz Onyszkiewicz）以及前外交部长亚当·洛特菲尔德（Adam Rotfeld），签署了“中东欧致奥巴马政府的公开信”。时间安排意味深长，恰好在美国总统与俄罗斯领导人最高级会晤之后的第一周。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的前领导人也签了名。^①这些要人得出结论，他们的地区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少的领导人在回忆1989年革命时能够感受到华盛顿在保卫我们民主转型以及使我们国家牢系于北约和欧盟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失去这些记忆的新一代领导人正在涌现，并实施更为‘现实的（realistic）’政策。”可以推测的是，反苏（可以说是反俄）一代正在失去影响力，而这恰恰出现在俄国沙文主义正在泛滥之时。俄罗斯作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回来了，正在用21世纪的策略与方法完成19世纪的议程。在全球层面，俄罗斯在大多数议题上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在地区层面，对我们国家来说，它正在迅速转变为修正主义国家。它怀疑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历提出的要求，即获得能决定我们安全选择的特权。它使用公开或隐秘的经济战方式，从能源封锁、有政治动机的投资到媒体操纵，都是为了获得其自身利益，阻碍中东欧转向美国。^②而对于这封信的签署者来说，还没有到为了美国去现实主义地屈从另一个雅尔塔协定的时候：“我们希望保证对西方利益的狭隘理解不至于导致对俄的错误让步。例如今天的关切是，美国和欧洲各大国或许支持梅德韦杰夫用‘大国协作’计划来取代大陆已存在的基于价值观的安全结构。危险在于，俄罗斯的威逼利诱、以权谋私总有一天会使该地区采取事实上的中立立场。这封信提议“北约复兴（renaissance）”——冷战军事协定。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应该回到现实，即北约成员国应与莫斯科展开平等对话。当涉及俄罗斯，我们的经验就是对莫斯科采取更加决绝和有立场的政策，这不仅会使西方更为安全，而且最终会使莫斯科也采取更为合作的政策。

① “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azeta Wyborcza, English edn, 15 July 2009.

② “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他们中谁最恐惧俄罗斯

在 2007 年选举之后，曾作为卡钦斯基政府国防部长的西科尔斯基，转投政党，调换职务。他现在成为公民纲领党（Civic Platform）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同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伦敦一道参加了导弹防御体系的签署仪式，但却要抽出时间责备英国（他有英国国籍）。他在解释协议的基本原则时提到了历史：“英国在 1939 年没有来。你宣布战争但没有开始作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要求能力，‘脚踏实地’（boots on the ground），而不只是纸上谈兵（parchment）。”他补充道，“我们希望这次我们的盟友帮我们消除危险。”^①

当时他正在活动希望成为北约秘书长的候选人。这位波兰外长就导弹防御体系安抚俄罗斯道：“由于技术原因，歼击机不可能影响俄罗斯在乌拉尔那一边的导弹，我们已经给予俄罗斯任何时候的调查权，甚至可以对这一点进行工业检测以至于确保基地没有任何变动，它只具有我们所说的它确实拥有的能力，也就是说，与俄罗斯无关。”^②

但是或许是奥巴马政府而非克里姆林宫鄙视西科尔斯基的外交技巧。波兰国会议员的博客引用了这位外长说过的一则低俗的笑话。据说西科尔斯基问过，“你听说过奥巴马可能与波兰有联系吗？”，“他的祖父吃过一个波兰传教士。”一位波兰外交部发言人承认西科尔斯基的言辞引起了争议，但否认其目的在于冒犯奥巴马总统。西科尔斯基并没有讲带有种族歧视的笑话，被曲解了。“他只是选一个奥巴马总统竞选期间诸多带有种族歧视的烂笑话做例子。”^③

西科尔斯基的亲英和亲美的形象，加上他的恐俄的精妙言辞，开始毁掉他的政治前途。在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之后，他访问华盛顿，宣扬“西科尔斯基主义”。要是乌克兰像格鲁吉亚一样遭到俄国入侵，它要求北约采取军

① “Poland and the Missile Shield---an Interview with Radek Sikorski”, *Daily Telegraph*, 20 August 2008.

② “Poland and the Missile Shield”.

③ “Sikorski v. Komorowski”, *The European Courier*, 21 March 2010. [http:// European courier.org/test/2010/03/21/sikoriski-v-komorowski/](http://European.courier.org/test/2010/03/21/sikoriski-v-komorowski/)

事行动。2009年4月，当他意识到他的反俄倡议正在降低他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的可能性时，他宣布放弃自己的理念。事实上，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要求准许俄罗斯进入北约。但在那一刻，他已经失去了可能的北约秘书长职务。西科尔斯基受到的另一个政治打击，是他在2010年3月参加总统候选人的选举时落败于科莫罗夫斯基（Komorowski）。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国家好恶”（national sympathies and antipathies）的结果。西科尔斯基声称，英语技能是波兰实施对外政策的关键，但科莫罗夫斯基反驳说，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都不说英文，但他们一直在实施他们国家的对外政策。科莫罗夫斯基在因地下政治活动坐牢时，就通过谴责西科尔斯基在工作中操着一口牛津音（他在那里学习）而得分。

波兰安全政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博格丹·克里赫（Bogdan Klich），国防部长西科尔斯基的继承者。克里赫与英美鲜有联系，他拥有医学和艺术史学位，也同样走对俄强硬路线。他还谴责过普京，因为普京在2008年初召开的北约—俄罗斯峰会上威胁要粉碎乌克兰。在克里赫看来，普京言论标志着“临时乌克兰国家”（a provisional Ukrainian state）概念的回归，这一概念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被提出，但很快又被束之高阁。他还责怪西科尔斯基借助俄军的导弹防御进行现场核查。“我们没有对1993年的苏联士兵说再见，以便欢迎俄罗斯军官未来回到波兰领土进行军事驻扎。”^①确实，克里赫在国家安全机关中是对导弹防御体系的作战能力最为怀疑人物之一。

在对外政策的重要人物中，总理图斯克似乎对修复对俄关系最为乐观。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他赞扬普京的承诺——2008年在奥巴马选举之后作出的——如果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继续部署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就不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导弹（Isander missiles）。图斯克也对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晤寄予希望。

与之相反的是，在2005年被选为总统后，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的矛头直指俄罗斯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对俄罗斯服软的国家。一

^① “Klich: Putin grozil rozpadem Ukrainy”, *Wirtualna Polska*, 9 April 2008. <http://wiadomosci.wp.pl/page,2,title,Klich-Putin-grozil-rozpadem-Ukrainy,wid,9837376,wiadomosc.html>

个例子：在 2008 年俄格战争期间，他攻击德法“软弱”，追求一种“非常典型”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政府希望促进“历史友好和合作利益”，指望从俄罗斯赚大钱。^①或许他最夸张的反俄行为就是同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一道，指责俄军 2008 年 11 月在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边界巡逻时射杀平民。^②

极其讽刺的是卡钦斯基和国家大部分领导人死于飞机失事，地点离 1941 年苏联内卫部队屠杀波兰军官的地方只有几公里远。一听到空难的消息，莱赫·瓦文萨意味深长地断言：“又一个卡廷事件击打了波兰”。至于卡钦斯基本人，他过去总是对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事实上，这也是他未被邀请参加（卡廷事件）70 周年仪式的一个原因。普京只邀请了图斯克。失事当天，俄罗斯外长宣称还未完全得到通知，不知道卡钦斯基是否计划参加仪式。

这次斯摩棱斯克灾难原因并未使意见分化达到明显的程度。有少数媒体将飞机失事可能的机械故障同塑造俄美关系的持续冷战联系起来加以阐述。不同的是，美国媒体通常注意到飞机是俄造的图—154 中程客机。他们的俄罗斯对手则证实飞机一直使用的正是美国制造的卫星导航系统，包括 TAWS（地形感知系统）。但是两国政府之间对此事件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在 2010 年 7 月，两国的间谍交换以一种轻松方式进行着，反映关系“重启（restart）”正在顺利进行。

亚雷克在选举后取代其弟成为总统，巧妙地站在更为中立的立场，甚至高度评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事实上，在对俄关系上他依然有疑虑。在选举第一轮之后两位决胜候选人进行第一次辩论时，卡钦斯基批评由波兰自由派政府谈判、计划签署到 2037 年之前从俄获得 100 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协议。亚雷克更为温和的政策让他缩短了与自由派候选人尼斯拉夫·科莫罗夫斯基的人气差距。后者支持波兰同欧洲与俄罗斯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最终结果是科莫罗夫斯基以 53% 比 47% 的支持率获胜。

自 2007 年到 2010 年选举，波兰领导人在制定对俄政策之间的分歧变得

① Lech Kaczyński, in *Rzeczpospolita*, 16 August 2008. <http://www.prezydent.pl/x.node?id=18543115>

② “Shots Fired near Georgia Leader”, *BBC News*, 23 November 2008.

越来越明显。2007年，莱赫·卡钦斯基代表波兰的右翼，展现出来的是民族主义、天主教的和仇外情绪——不仅反俄且对欧洲存疑。西科尔斯基和克里赫似乎在对俄的方式上互相使用伎俩，虽然双方都不想对俄软弱。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现实，即已经对布什政府投入过多，现在对奥巴马总统的任何支持都不可能为波兰赢得红利。与俄罗斯联邦达成实实在在的妥协似乎是最为现实的选择。2007年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图斯克政府最愿意作这样的选择，2010年选举出来的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也是如此。

害怕的原因？对“同胞”的俄罗斯式理解

让我转过来审视在俄罗斯引起争论的政策，这种政策给各个邻国带来不安，包括以有限的方式影响波兰。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通常是在欧盟国家引起最多关注的问题，但我却希望关注俄罗斯的认同政治这种更为捉摸不透的问题。

1999年5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一项名为“俄罗斯联邦对海外同胞的国家政策”（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и за рубежом）的法案。它将海外同胞解释为那些“生在一个国家”和“共享同一语言、宗教、文化遗产和传统”，以及直系血统，不包括“属于国外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s）^①的逝者”^②。

这项法案成为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确定政策目标的重要法律工具。从这一方面说，它从法律上使模糊的国家边界制度化，包括理论上与波兰的边界。不仅法律文本，而且俄罗斯官员关于谁是“同胞”的声明也强调，“同胞”可以包括俄罗斯族人以及所有前苏联公民——这就准帝国主义式地构想出了俄罗斯空间。这表示，“同胞”不再是建立在族群—宗教标准之上的原

① 命名民族（titular nations）指的是其族群名称被用来对国家内行政区域命名的族群。这些族群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例如：奥赛梯人、鞑靼人、图瓦人、巴什基尔人等——译者注

② 这种表述来自奥哈娜·谢薇尔（Oxana Shevel），“Russian nation-building from Yeltsin to Medvedev: ethnic, civic, or purposely ambiguous?”（未发表文稿）。也可参见她的 *Competition, Migration, Refugee Policy,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he Czech Republic, the Russian Federation, Ukraine, and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始的、狭隘的理解，它赋予说俄语、信仰东正教的纯斯拉夫人以特权。

2006年6月，俄罗斯政府的“同胞自愿回归安居俄罗斯”项目获得总统批准和授权。这一“同胞回归安居项目”针对的是住在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族人。但所有俄罗斯国家机构都没有这个临时定义。因此，俄罗斯联邦移民局（Federal Migration Service(FMS)）将同胞回归安居项目视为是针对掌握俄语和专业技能的前苏联公民的。

可以得出推论，即所有前苏联公民和他们的后代都是“同胞”。既然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等在法律上恰恰没有得到详细说明，那么就暗示前苏联人所有的语言、宗教或者习俗都可以被解释为“共同的”。因此，统计显示只有6000俄罗斯人生活在波兰，波兰相对前苏联共和国来说就更难以成为俄罗斯同胞、俄罗斯空间以及俄罗斯边界构建的对象。在波兰，人们害怕的可能是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大俄罗斯统一主义，因为后者难以判断是什么。

在国外的名义上的后裔群体应不应该从定义中排除仍有争论。在确定“国外同胞”的同胞法的第1.2条包括了这种排除。但是界定“同胞”的第1.1条却没有。相应地，将所有前苏联公民和他们的后裔都视为同胞的理解，已经大量反映在政府声明和文件中。总理普京声称，同胞“并不符合法律分类……而是精神上自我认同”。随后俄罗斯外长也提出了相似的同胞概念：“那些感觉到与俄罗斯有精神联系的人”。

对奥哈娜·谢薇尔（Oxana Shevel）来说，关于同胞的模糊不清的、晦涩难懂的定义是有利的。它为在后苏联空间为了保护国外同胞利益而制定的复杂多变的俄罗斯政策提供了法律框架。俄罗斯联邦政策中，对目标群体是否视为同胞的界定较为严格地依据种族、语言、前苏联公民、特定后苏联国家甚至是俄罗斯公民来进行，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我们”一个更为严格，更为族群-文化定义将会使俄罗斯难以合法地干涉俄罗斯国界以外的那些散居的俄罗斯族人事务，比如阿布哈兹（Abkhazia）、奥赛梯（Ossetia）和德涅斯特左岸地区（Transdnistria）。所以，俄罗斯利益可能的指涉群体或许没有俄罗斯国籍，但可能是由于“自我认同”和“精神联系”被视为同胞的后苏联群体。另外优先照顾基于民族-文化特征之上同胞

入籍，有助于俄罗斯政府入籍移民管控。

总之，有关俄罗斯国外同胞的争论激起邻邦的关切。它们担心这个概念可能会用来进行对抗。俄罗斯关于国家的“实际”边界，国内俄罗斯族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大俄罗斯人（Russianness, russkost）范围的争论有外溢到其他主权国家特别是东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同胞的法律定义含糊不清足以以为更为广泛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或职业特征界定留有大量余地。俄罗斯政策制定者获得宽广空间，使用包括民族、市民的以及新帝国的方法对同胞概念进行掌控。

俄罗斯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其他国家对于俄国关于国外同胞问题的讨论的关注在不断增多。2009年，俄联邦成立了一个部级工作组来修订法案，并同意将同胞界定为“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能够作出自由选择，赞同与俄罗斯精神和文化联系的人群，通常属于在历史上生活在俄罗斯联邦的民族。”2010年5月，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向杜马推荐了一个修正的定义：“俄罗斯政府会将‘国外同胞’认同建立在‘通过相应的社会活动或专业活动所增强的自我认同的信念’之上，而不是根据出生地或者祖辈原则”。

民族学专家保罗·格布（Paul Goble）评论道：“这体现了一种大转变。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将‘俄罗斯同胞’界定为包括‘没有例外的所有人’——那些生于俄罗斯帝国的、1917年俄罗斯共和国的、苏联及其直接继承者的，不考虑民族或自我认同因素。”^①但是，漏洞还是有。对拉夫罗夫来说，“如果需要”，俄罗斯就会给予“人道主义帮助”，支持“俄罗斯种族—文化空间的存续”，这在1999年法案中得以展现。

2010年7月，杜马通过了另一个法律修正案。现在它将同胞简单定义为俄罗斯公民和其他国家说俄语的居民。俄罗斯将会在许多领域让居住在海外的同胞享有与俄罗斯公民同样的权利，例如，被俄国大学录取。俄政府也会帮助同胞在俄罗斯定居，这被视为法律最为重要的实际作用。最新修订的法律的漏洞在于，它并未提供文件说明同胞一定就是说俄语的人。然而，相

^① Reported by Paul Goble, “Moscow plans to cut number of ‘compatriots abroad’ by changing Russian law”, 22 March 2010. <http://www.eesti.ca/printarticle.php?id=27570>

应的同胞法的大量修正案对“同胞”给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俄国政府通过这些修正案目的似乎在于降低将俄罗斯人（russkost）视为紧跟对外政策的灵活概念而带来的恐惧。

结 论

法国哲学家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地图上标注欧洲文化时，画出了同心圆体系，从“真”欧洲（发达的西欧国家）开始，到“外围”希望被欧洲化的圆（东方部分）。^①外欧洲的概念似乎特别适用于 2006—2007 年卡钦斯基兄弟政府改组时期的波兰。正如一位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在 2004 年扩大^②之后很快作出评论：“天主教主义（Catholicism）必定发出愤怒的声响，反对它所看到的一个自由的欧洲。”^③

对一些波兰领导人来说，外欧洲——确实非欧洲——从俄国西部边界延伸至东方。它们就是假想的政治墙，远比文化差异重要。西斯拉夫的波兰与东斯拉夫国家乌克兰共享相似的政治价值，超越任何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但这种假象，在俄国人看来，就是合法地创造敌对国家圈——一堵围墙——围住俄罗斯。

卡钦斯基兄弟是排外仇外的波兰民族主义推动者。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这种塑造国家对外政策的取向似乎是合理的。另外，他们偏执的恐俄情绪被误认为是每个波兰人的想法。但调查的数据并没有证明这一点。

2007 年波兰人第一次选出了卡钦斯基兄弟之一。在斯摩棱斯克悲剧发生后他们又要选出另一个。在 2010 年总统选举时，他们否决了还活着的哥哥。这可能归咎于波兰选民，“任何对俄国因袭的憎恶、盲目武断的敌意会导致坏政策。”^④卡钦斯基政府的终结是这种对外政策走入“死胡同”（cul de sac）的证明。虽然许多波兰人一直表达着多种忧虑——包括俄国的影响力，

① Etienne Balibar,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Reflections on Transnational Citizen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69.

② 2004 年，波兰分别加入北约和欧盟——译者注

③ Michael Cahman, quoted in Graham Bowley, “Poles on Ramparts of EU Culture Wa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4 November 2005.

④ Lieven, “Against Russophobia”, p.25.

往小一点说，俄罗斯认同政治——它们并不增加波兰的例外主义。波兰反俄所达到的程度是可以衡量的，而非无边无际，反映是理性而不是非理性的恐惧。

新政治精英显得比他们的上一届较少具有跟随传统行动路径的倾向。他们，和波兰的每一个公民一样，变得更为欧洲中心化（这个术语的积极层面）。确实，总理图斯克的分裂议会表明，不是所有的对外政策原则都认可恐俄不再是波兰的国家利益。他们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方式几乎难以赢得公民的支持。

（孙超 译）

【Abstract】 In the case of much of Eastern Europe, russophobia has historically represented the greatest national fear,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 the russophobic repertoire is more restricted. In Poland, due to historic, geopolitical and religious reasons, russophobia has been deeply entrenched among Poles.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survey results, specially, after the air crash near Smolensk, Russia again became the country which Poles fear the most. Besides, russophobia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Polish security policy decision-making as well. Under the Kaczyński, Polish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shaped by russophobia. Nevertheless, it is also suggested by surveys that intolerant russophobia is not common to all Poles. On the whole, Poles' russophobia is characterized by rational fear. There also exist differences within elites' perspectives regarding russophobia, among whom new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elites have already shown contrasting attitud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es.

【Key Words】 Poland, Chronic Russophobia, Elite Attitudes, Public Attitudes

【Аннотация】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регион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сил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фактических причин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ая русофобия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распространённым и наиболее влиятельным этническим страхом,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анный страх перед Россией по-прежнему труд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В Польше, в сил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и других причин, русофобия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лась в сердцах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после аварии в Смоленске, антипатия народа к России вышла на более высокий уровень. Русофобия оказ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Польше, в период правления Качиньск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усофоб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польскую внеш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Однак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кже показывают,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разделяет не весь польский народ. В целом, польские антироссий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рациональным страхом. В вопросе русофобии у элит также есть расхождение во мнениях, новое поко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литы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о тенденции, отличные от боле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способов действ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ьша, хроническая русофобия в Польше, отношение элит, отношение масс

(责任编辑 封 帅)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欧盟国家的政党政治结构变迁*

余南平 周生升**

【内容提要】中东欧国家政党与政治结构有着特殊的不稳定性，而这个不稳定性与中东欧国家社会、经济转型高度关联。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无疑加剧了人们对于这一不稳定性的担忧。通过对选举结果的实证研究并全面分析和梳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变迁的总体结构后可以发现，中右、中左两大政治力量主导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动摇，任何意识形态的极端势力也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崛起。这就需要讨论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具有特色的政党政治生态环境，并对其影响政府运作进行研究，为把握中东欧国家目前的政党政治转型特征提供有分析力的解释。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 中东欧国家 政党政治 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D73/77(5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043-(31)

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不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危机时代俄罗斯与中东欧社会经济的转型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JJDGJW012）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可能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 余南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周生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仅给欧洲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政党与政治结构。从欧洲政党政治结构变化的角度看，截至 2013 年 4 月，老欧盟 15 国中已经有 6 国政府面临提前下台的窘境，其中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五个受债务影响严重的国家，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结构变迁和政党力量的重组，而且有的国家在提前大选后面临了组阁失败（希腊）和组阁困难（意大利）。作为 2004 年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捷克、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政党和政治结构，是否也会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而造成大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其转型和既有的民主进程？本文将分析欧债危机前后的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结构变迁，并尝试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政党政治的结构特点作出评估分析。

金融危机后欧盟中东欧国家的选举结果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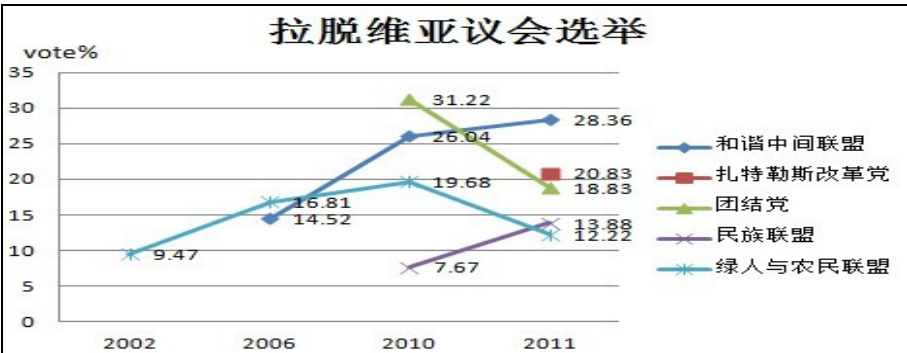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后，中东欧有 8 个国家经历了两次大选，其中有的还经历了政府提前解散，同时也发生了组阁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变化（图 1 列举了 8 国议会选举得票情况）。如在爱沙尼亚，中右政党爱沙尼亚改革党在 2011 年大选中以 28.45% 的得票率获得组阁权，并与同为中右阵营的祖国与共和国联盟组成执政联盟。而在 2006 年，该党却与执政的中左社会民主党组成过执政联盟。在拉脱维亚，2011 年议会选举中，中左政党和谐中间联盟虽然以 28.36% 的选票获胜，但由于仅获得 31 个议会席位，无法单独组阁（议席未过半），最后与团结党（18.83%）、扎特列尔斯改革党（20.83%）、全国联盟（13.88%）组成了以中右执政联盟为主的联合政府。在立陶宛 2012 年的议会大选中，中左的社会民主党以 38 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08 年大选时为 25 席），击败了 2008 年大选时获胜的最大的中右政党祖国联盟（2008 年 44 席，2012 年 33 席）。其后，该党与中间派的工党和右翼秩序与正义党组成执政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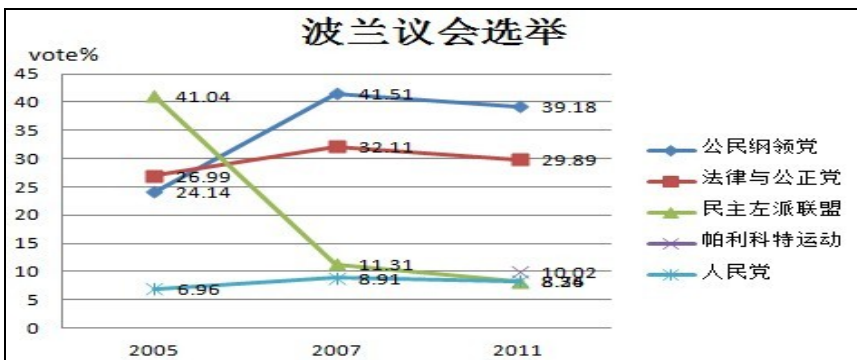
如果说，波罗的海三国的例子，体现了中东欧政党结构特有的变化，那么在波兰，政党力量的稳定性显然在增加。波兰中右的公民纲领党在 2007、2011 年两次大选中都以较大优势获胜（41.51% 和 39.18%），其第二大政党也

是来自中右的法律与公正党（两次大选得票率分别为 32.11%和 29.89%）。而波兰中左翼政党中，民主左派联盟曾经是议会第一大党（2001 年得票率为 41.04），在最近两次选举中已日薄西山，分别只获得了 11.31%和 8.24%的选票，显示了中左翼力量在波兰的持续衰弱。而在捷克，2010 年大选中，捷克国内“政治地震”后的力量分野已经非常清晰，三个中右政党——公民民主党、传统责任繁荣党、公共事务党占据了 200 个议会席位中的 118 个，组成了执政联盟。其中公民民主党与中左的捷克社会民主党是“死对头”。2006 年大选时，捷克公民民主党在第二次选举中以微弱优势取胜，而在 2010 年大选中，虽然社会民主党以 22.09%的得票率超越公民民主党获得单一政党领先优势，但其仅控制了议会 56 个席位，无缘组阁，只能屈居为在野党。在匈牙利，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曾经在 2006 年大选中以 43.02%的选票战胜中右翼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42.03），但在 2010 年大选中，前者受国内巨变的经济环境影响，得票率骤降至 19.03%，而中右的青民盟则获得了 52.73%的选票，显示出由于金融危机影响造成的严重经济衰退，对匈国内政党政治结构产生了变化性的影响。比较另类的是斯洛伐克。就在中东欧中左翼力量全面溃败的情况下，斯洛伐克中左翼政党方向社会民主党，在 2006 年以后就一直维持着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2006 年得票率为 29.14%，2010 年为 34.80%，2012 年为 44.42%），并逐渐与国内其他政党的得票率拉开了距离。在最近的 2012 年大选中，除方向党外，没有一个政党得票率超过 10%，显示了中左力量独大的局面。而在斯洛文尼亚，中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就没有那么幸运。该党在 2008 年大选中以 30.45%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但在 2011 年大选中只获得了 10.52%的选票，从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党。与此同时，2011 年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中左政党积极党，虽然令人意外地获得了 28.51%的选票而成为第一大得票党，但也因议席不足，既不能单独组阁，又无法组成执政联盟，而成为了在野党。最终的结果是，在近 3 次大选中表现平稳的中右民主党（2004 年 29.08%，2008 年 29.26%，2011 年 26.19%）与维兰特公民名单党、人民党、退休者民主党和斯洛文尼亚党组成中右联盟，执掌了最新一届政府。

纵观金融危机前后中东欧政党大选情况，可以发现，中东欧政党政治结

构变化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中东欧中右翼政党力量全面崛起。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中左翼政党在中东欧 8 国中参与了 4 国的执政（2001 年为峰值，中左政党参与 5 国的执政）。而到了 2012 年 6 月，只剩下了硕果仅存的斯洛伐克。除了斯洛伐克中左翼奇特地越来越强之外，其余中东欧 7 国政府全部由中右翼政党控制。其次，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在一些国家（捷克、斯洛文尼亚）中左政党虽然在选举中获得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是却无法成为执政党。这除了显示其国内政治力量分散外，还说明这些中左政党的执政理念与国内其他政党分野较大，而无法组成联合政府。最后，可以看到的是，捷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政府，分别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生过提前大选或政府解散重组。这不仅显示了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也显示了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在转型中的一些特有的问题，如政党稳定与政治结构稳定等特殊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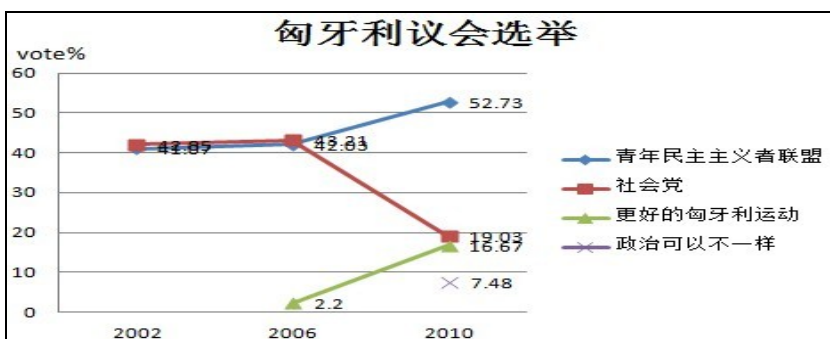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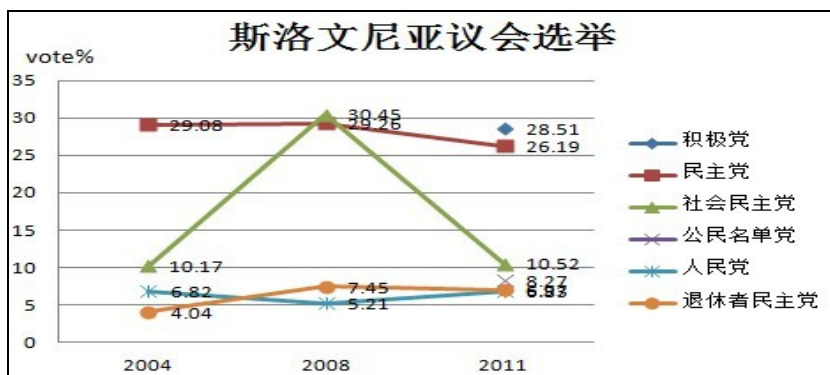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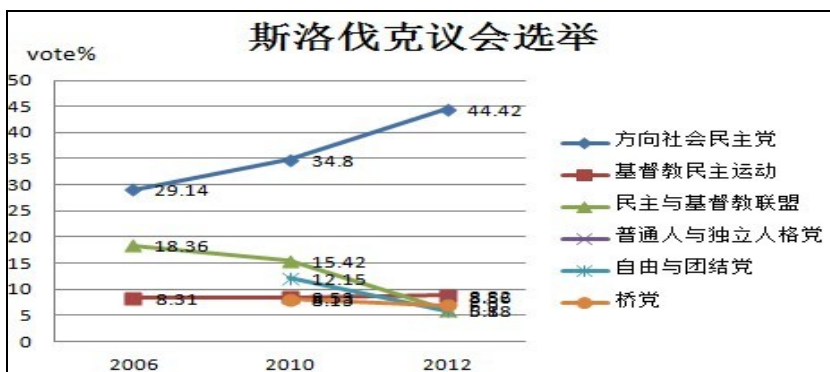


图 1 中东欧 8 国近 3 次议会选举结果

数据来源：European Election Database, http://www.nsd.uib.no/european_election_database/index.html

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结构变化原因与稳定性分析

(一) 经济投票在中东欧国家的结果检验

对于欧盟国家政党选举的分析，特别是结合西欧国家的选举实例，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韦瑟尔斯（Bernhard Wessels）博士有过专门的论述。他在研究中指出，政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成功因素是复杂的，但一些显而易见的答案在某些时候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即选民在投票时会惩罚表现不佳的执政党^①。那么决定政府表现不佳的因素又是什么呢？Bernhard对欧洲中左、中右两大派系选民进行调查后发现，虽然左右派系选民在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意见有区别，但双方对政府的经济诉求都非常高且远高于福利和教育指标（图 2）。同样，德国学者劳拉·普吉立斯（Laura Puglisi）在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欧洲政党变迁时，也采用了经济表现指标来解释选举结果。她认为，金融危机时刻所发生的政党变迁特别符合“经济投票行为”（economic voting）^②，在经济投票行为语境下，经济在国家大选中扮演主要角色。在选民决定投票之前，他们会观察就业市场、通胀、总体GDP和个人收入情况来评估政府的经济政策，由此会产生一种奖惩假设（reward-punishment hypothesis），即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只要经济衰退，政府就会在投票中受到惩罚，即得票率下降甚至下台。而上述理论解释在金融危机中的欧盟 15 国选举中都可以得到验证^③。

① Bernhard Wessels, “The Voter’s Choosy Heart Beats Left of Cent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ttitudes of Social Democratic Voters in European Comparison, 2002 – 2008”, Friedrich-Ebert-Stiftung, May 2012, http://www.fes-globalization.org/dog_publications/global_governance.htm

② 早在 1988 年，“经济投票”研究的开创者刘易·贝克（Lewis-Beck）等人就运用理论框架和实证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解释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政治，并对法国政治投票中的经济因素给予了实证分析检验，具体研究可见 Lewis-Beck, M. (1988) *Economics and Elections: The Major Western Democraci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而对于法国选举的实证数据检验研究可见 Lewis-Beck and R. Nadeau, (2000) “French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Economic Vote”, *Electoral Studies*, 19:2/3, pp171-182.

③ Laura Puglisi, “European party landscape in transition”, *Research Brief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November 14, 2012, <http://www.dbresearch.com/>

对于本派系政府改善哪个方面的政策最容易感到满足		
	社会民主党派选民	保守党派选民
健康保障体系	1.4	2.0
教育体系	1.2	0.6
经济状况	5.1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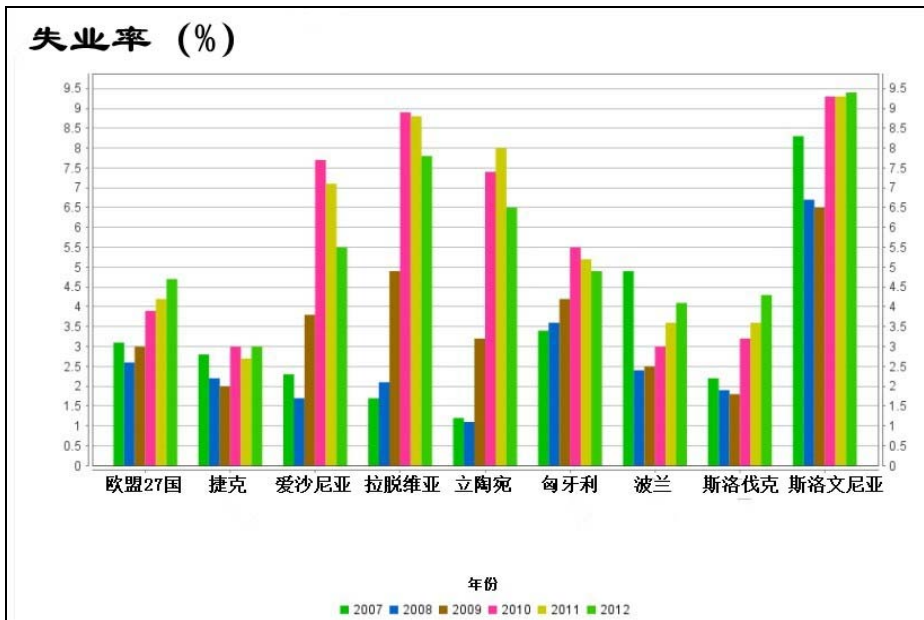
图 2 欧洲左右两派选民意向

资料来源：Bernhard Wessels, “The Voter’s Choosy Heart Beats Left of Cent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ttitudes of Social Democratic Voters in European Comparison, 2002-2008”, Friedrich-Ebert-Stiftung, May 2012. http://www.fes-globalization.org/dog_publications/global_governance.htm

最为明显的是希腊。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希腊的经济表现不良，高负债、高赤字的“双高”问题，早在中右翼希腊新民主党执政的 2004 年到 2009 年期间就已经出现，可以说希腊新民主党对希腊经济衰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 2011 年的提前大选中，2009 年成为执政党的希腊社民党却在投票箱遭到惩罚，得票率仅为 11%，自 1990 年代以来第一次沦为第三大党且得票率极低，而新民主党居然获得了 30% 的选票。又如，在欧洲中右政党大获全胜之时，2002 年和 2007 年两次大选中都获胜的法国中右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却在 2012 年大选中败给了中左的法国社会党。分析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西欧几个政府提前下台的国家的政党选举，我们可以发现，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由于经济情况极度恶化，显示了经济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同时，法国、英国等国执政党在后金融危机期间大选的失利，也可以从侧面实证经济表现对于政党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性。总体上看，至少在金融危机时期，选民并不在意究竟是谁搞坏了经济，而只关注所面对的经济好坏本身。然而，我们关心的是，这一理论解释和实证验证对于欧盟的中东欧转型国家是否完全适用？

我们以金融危机中同样经历过提前大选的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作为对比例证。从图 3 的数据解释中可以看到，虽然斯洛伐克长期失业率表现要远好于斯洛文尼亚，但其 2009 年和 2012 年的 GDP 增长率均低于斯洛文尼亚。然而在斯洛伐克，疲弱的经济并未影响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地位，相反在 2010 年和 2012 年接连两次选举中，中左翼的得票率不降反升（2010 年 34.80%，2012 年 44.42%），显示了中左翼在斯洛伐克独特的强大力量。

而在斯洛文尼亚，糟糕的失业率似乎也没有影响到选民的情绪。新成立的中左翼积极党，理念其实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差别不大，但选民们似乎是喜欢上了新政党的领导人，而不在乎政党执政理念本身。其次，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长期失业率和 GDP 增长率，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可谓非常糟糕，然而拉脱维亚政府始终由中右翼政党控制，并没有因为经济表现不佳而被中左翼政党所取代。最后，检视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经济状况表现平稳的捷克，更可以发现，其国内两大政党社民党和公民主党，在 2010 年大选中得票率同时大幅下跌，引发了国内第三党、甚至第四党的出现。归纳上述实证分析可以认为，不可否认，中东欧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对比，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很显然，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是，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东欧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生的政党政治变迁还存在其他特殊因素，而这些特殊因素也可以被视为转型国家自身的政党稳定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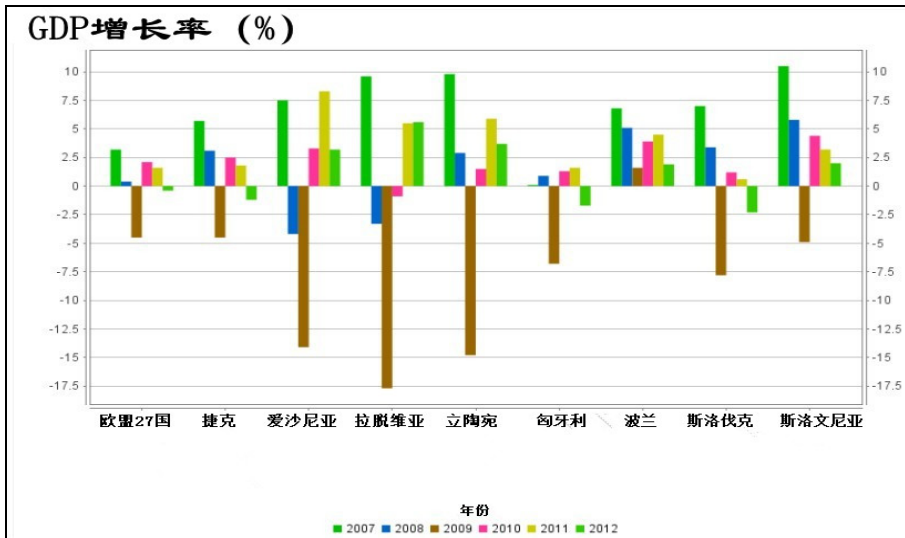


图3 欧盟27国、中东欧国家失业率和实际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 Eurostat,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

(二) 中东欧转型国家政党稳定性的特殊问题

对于“政党稳定性”这个命题的研究,著名的政治学研究者马丁·李普赛特和斯坦因·罗坎早在1967年就采用了“社会分歧结构”理论假说,对西欧国家历史演化而来的政党稳定性进行了解释^①。随后,大量的学者沿着“社会分歧结构”这个经典的路径,对于西欧国家政党和政治结构变迁,特别是这些国家的政党稳定性进行了大量经验性和实证性研究。如理查德(Rose Richard)和尤因(Derek Urwin)对于1945年以后西欧政党稳定性的经典解释性研究^②,斯蒂法若(Bartolini Stefano)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欧中左政治力量的历史回顾与检验^③,克鲁齐(Colin Crouch)对于西欧社会变迁对于政党与政治的影响的研究等^④。

① Lipset.S.M and Stein-Rokkn(ed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 pp.13-16.

② Rose Richard and Derek Urwin,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Western Party Systems Since 1945”, *Political Studies*, 1970, Vol.18, No.3.

③ Bartolini Stefano,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The European Left 1860-1980: The Class Cleav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Colin Crouch, *Soci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上述杰出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全部集中于传统的西欧国家。那么，中东欧国家情况如何呢？早在 1996 年，政治学研究者伊丽莎白（Prodromou Elizabeth）就从“社会分歧”中宗教分歧的角度出发，对四个世纪以来欧洲宗教分歧制约欧洲政党政治的发展结构，从而造成东西欧洲的长期分裂，进行了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①。根据伊丽莎白的研究结论，东西欧洲不仅政党动员能力不同，政党结构不同，同时选民对于政党和政治的认识也不同，而这将极大地影响到政党的稳定性。如果说伊丽莎白的研究成果不仅时间较早，同时还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话，那么从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看，挪威学者伊丽莎白·巴克（Elisabeth Bakke）和匈牙利学者尼克·西特尔（Nick Sitter）的联合研究指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二十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一共有 37 个政党进入过议会，截至 2012 年，其中 22 个政党已经跌出了 5%得票率的议会席位门槛。在这 22 个政党中，目前只有 1 个政党通过努力重新进入了 5%门槛，5 个政党发生合并，8 个政党依旧在活动，剩下 8 个政党处于僵死状态^②。

当然这一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上述三国。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波罗的海转型国家，也同样存在政党稳定性差的问题。比如在拉脱维亚，一度是议会最大政党的人民党，在 2010 年大选中与“第一政党”（此为政党名字）合并为“为了一个好的拉脱维亚”党，仅获得 7%的选票，并且在 2011 年的提前大选中彻底消失。又如在波兰，2006 年成立的左翼民主党在 2007 年获得了 13.15%的选票，但该党却在 2008 年因为内部分裂而解散了。与政党稳定性差相对应的是，中东欧转型国家政治结构中有一种现象层出不穷，突出表现为新政党不断涌现，并且往往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举进入议会。如捷克的传统责任繁荣党成立于 2009 年，其在 2010 年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而在拉脱维亚，2010 年以后成立的扎特勒斯改革党、团结党和全国联盟，不仅在 2011 年拉脱维亚大选中获得议会席位，而且还形成了执政联盟。又如

① Prodromou Elizabeth, “Paradigms, Power and Identity: Rediscovering Orthodoxy and Regionalizing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6, Vol.30, No.2, pp.125-154.

② Elisabeth Bakke & Nick Sitter, “Why do parties fail? Cleavages, government fatigue and electoral failure in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Hungary 1992-2012”,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3, Vol.29, No.2, pp.208-225.

在斯洛文尼亚，成立于 2011 年的积极党，在同年大选中成为斯洛文尼亚第一大党。另外，还有诸如爱沙尼亚祖国与共和国联盟、更好的匈牙利运动、立陶宛工党等等，都是成立不到 10 年的年轻政党，且拥有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

除了新组建政党迅速进入议会、并获得可观的议席这一特点之外，与德国、法国等传统西欧国家不同的是，中东欧国家不仅政党数量多，而且得票非常分散。一般而言，经过长期历史演化而来的政党结构构建，在西欧国家，主流政党数量一般稳定在 5-6 个，甚至更少，如德国、法国都是 5 个，而英国是 3 个。理论和实践证明，政党越多，国家政治结构越不稳定。如西欧国家中的特例意大利，2008 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超过 1% 的政党有 8 个，而在 2013 年的选举中增加到了 10 个，显示了国内政治力量得分散，并严重影响了政府效率。而“意大利政党结构模式”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却非常普遍，如在斯洛文尼亚有大大小小政党 20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有 10 个；斯洛伐克有政党 26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有 12 个；而在看似比较稳定的捷克，主要活动政党有 9 个，非主要政党有 17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有 9 个。相对而言，中东欧大国波兰的政党结构更接近西欧的德国与法国，波兰一共有 11 个政党，而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为 7 个。另外，波罗的海国家中的爱沙尼亚一共有 9 个政党，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 6 个；拉脱维亚有政党 13 个，议会得票超过 1% 的政党也是 6 个；立陶宛情况比较特殊，国内一共有政党 17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 12 个。如果考虑人口因素，那么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党总体表现为多，而不是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除去不能参加政党活动的人群（未成年人），除波兰以外，如果用政党—人口比例这个指标来衡量，相较于西欧国家，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特点是：更少的人拥有更多的政党。这不仅显示了中东欧国家政党不成熟、不稳定的特性，同时也体现了中东欧国家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政党政治家个人影响力等复杂的因素，而其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家个人，而非政党组织本身的影响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另外，如果以 2008 年为时间节点，对比分析 2008 年前后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中政党数量以及选举得票情况，那么可以更清楚地发现，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

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政党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在议会选举中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数量也在增加。如斯洛文尼亚，2008 年议会选举时有政党 17 个，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有 9 个，而 2011 年政党数量增加到 20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为 10 个；在斯洛伐克，2010 年议会选举时共有政党 18 个，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有 10 个，而到 2012 年提前选举时，全国政党已经达到 26 个，议会选举得票超过 1% 的政党数量也增加到了 12 个。同样的情况也在波罗的海国家也有发生，显示了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东欧转型国家选民政治认同的分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同时也显示了中东欧国家执政的政党应对危机的能力缺乏。

如果说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政治结构，受政党不稳定、政治家个人能力超越政党本身动员能力、选民易受影响、意识形态多元化等等特点的影响，而呈现出国内政党和政治力量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那么还有哪些特别因素在影响着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呢？从制度层面看，正如荷兰莱顿大学的学者费尔南多·卡塞尔·贝尔塔（Fernando Casal Bértoa）观察到的那样，由于中东欧转型国家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阶段，而政治体制设计对于政党体系会起到重要作用。中东欧国家普遍实行的是“半总统制”，这对于政党体系分散化和政治稳定会带来影响。因为，总统普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意识形态隔阂，但其负面影响是，也可能造成各股政治力量不断争权，而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①。虽然贝尔塔的研究结论，可以说明中东欧转型国家政治结构的一定特点，但同样采用“半总统制”的法国，其国内政治虽然有过“左右共治”阶段，而带来政府运转的效率问题，可是法国并未发生国内政党林立、新党不断进入议会、并且联合执政的现象。因此，政治制度设计本身并不是政党稳定性的核心因素，而真正的核心因素还是需要在中东欧转型国家自身特点上去寻找。

比较有说服力的思路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研究者萨维奇（Lee Michael Savage）提供的研究视角。萨维奇通过研究证明，在中东欧转型国

^① Fernando Casal Brtoa, “Parties, regime and cleavages: explaining party system institutionalisa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128, No.4, pp.452-472.

家的联合政府形成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强势主导政党”模式^①。虽然萨维奇没有展开论述“强势主导政党”模式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但通过逻辑分析可以认为，在一种“赢者通吃”的模式下，选举获胜的强势主导政党，将获得包括总理在内的主要内阁职位，而选举失利的政党，只能沦为真正的“在野党”，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事务失去发言权。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下，选举失利的政党只能利用议会作为舞台不断地发起反击，力图解散执政的政府，用包括新组建政党等方式，重新夺回选举优势地位。因此，在德国，选举获胜的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可以和竞争对手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两党的执政理念虽然有分歧，但并不完全对立相左。而在中东欧转型国家，党派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分歧过大，其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看法不一，包括对于如何融入欧盟看法也不完全相同，因此，党派对立，缺乏沟通与和解也是中东欧转型国家的一大政治特色，而这必然会影响到中东欧国家的国内政治的稳定。

后金融危机阶段中东欧政党力量博弈与政治生态

（一）中左翼政党力量在中东欧的地位与挑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始于2010年的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化，全面影响了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经济，同时对欧洲政治格局也带来重大的影响。其中突出的特点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中右保守党派全面崛起，中左政党的力量明显下降，中东欧转型国家同样也不例外。回顾近十年来中东欧国家政党活动的历史可以看到，2004年刚加入欧盟时，中东欧入盟的8国中，中左翼（作为主要政党或次要政党）参与政府组成的国家有5个，它们分别是立陶宛、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到2009年尚有4国，但到了2010年，只剩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由中左政党领导执政，显示了中左力量在中东欧的急剧下降。

对于金融危机中选民们为什么将选票投给中右政党的原因，德国学者劳

^① Lee Michael Savage, "Identifying key players in the government-formation process: Strong and dominan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3, Vol.29, No.1, pp.1-18.

拉·普吉立斯 (Laura Puglisi) 有过精辟的实证分析研究。普吉立斯的研究结论是，历史数据显示，每当欧洲陷入经济衰退时，选民们更愿意将选票投给中右的保守党派。而如果进一步引入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伯恩哈德·维塞尔斯 (Bernhard Wessels) 博士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欧洲中左和中右两派选民对于政府的经济诉求很高。金融危机发生时，恰好许多危机国家的中左社民党处于执政地位。这固然是导致中右保守党派大胜的重要原因，但选民不会完全做到经济理性，他们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伯恩哈德的研究发现，欧洲中左社民党派选民对于中左政府的表现要比对中右政府或者左右联合政府更满意，同时对于现政府的批判性更强，而对现政府的好表现却少有褒奖。反之，中右保守党派选民对于中右政府或左右联合政府的满意程度高于中左政府，对于现政府的包容力以及褒奖要强于中左派选民。同时，欧洲选民还存在“审美疲劳”，即不愿意看到一个政府长期执政。而在这个方面，中左选民又甚于中右选民。因此，当一个政府持续了 4 年，就会失去 1.5% 的中左选民和 0.5% 的中右选民的选票，这一数值会不断上升，且中左选民上升速率明显更快。因此，从确保选民方面来看，欧洲中右保守党派要比中左社民党派更为有利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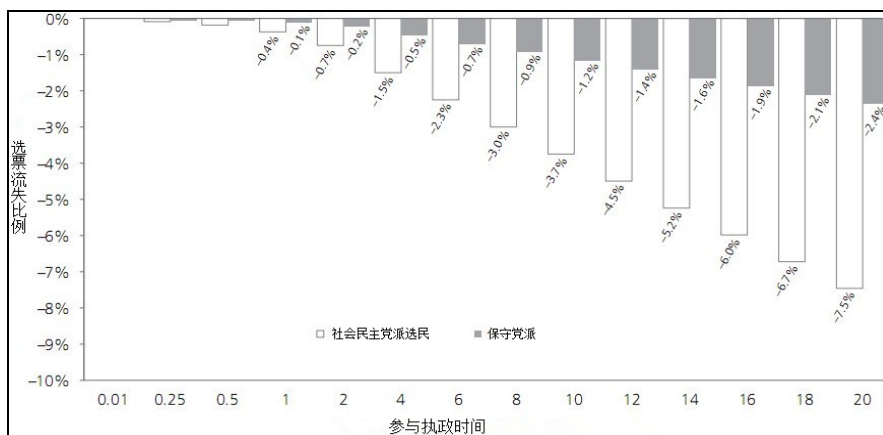


图 4 欧洲国家政党执政时间与选票流失关系

资料来源：Bernhard Wessels, “The Voter’s Choosy Heart Beats Left of Centre,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Attitudes of Social Democratic Voters in European Comparison, 2002-2008”, Friedrich-Ebert-Stiftung, May 2012. http://www.fes-globalizeti.org/dog_publications/global_governance.htm

由于中左政党的先天缺陷，在金融危机中，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中，在整个欧洲，包括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内，中右党派力量上升、中左党派力量下降这个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当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转型国家还有着—个特殊的背景，即前苏联国家和转型国家。学者兰格（Kai-Olaf Lang）在深入分析中东欧转型国家政党的历史及其与“老欧洲”国家政党的差异后指出，苏联解体后，左翼政党总体而言对于中东欧国家选民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只要提到左翼政党，选民们往往将其和“低效率的经济干预主义”、“中央集权”等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曾经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既希望能够“重新做人”，但又不希望作为旧共产主义的继承人，以左翼政党的形式存活在前苏联的巨大阴影之下。因此，外部压力和内部矛盾并存，导致中东欧左翼政党将在很长—段时间内无法成为政治主流^①。而历史的断裂和宗教的差异，又同样使在传统欧洲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在中东欧转型国家找不到立足点^②。

如果仅看到在中东欧 8 国中只有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导执政，可能会得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东欧国家中左翼全面溃败的结论。但事实上，微妙的变化还是存在的，如在 2012 年最新的大选中，立陶宛中左翼的社民党领导组成了新一届内阁。而斯洛文尼亚政府则通过提前选举实行重组，中左的积极党获得第一大党地位，虽然最后在总理任命问题上因维兰特公民名单党竭力反对而未获得组阁权，但其和社会民主党合计获得 38 个议席，控制了议会 40% 以上的投票权，形成了微妙的“左右共治”局面。最吊诡的是捷克。2013 年 8 月，捷克议会决定自行解散，宣告了捷克中右执政联盟的失败，同年 10 月举行的提前大选的结果，使得—直在野的捷克社会民主党获得优先组阁权。这一变化，不仅是由于中右集团的分裂，而且反映出，中左政党在捷克还是具有深厚的基础和长久的传统。因此，一些微妙的变化迹象表明，在中东欧国家，中左政党并未到全面溃败的程度。

① Kai-Olaf Lang, “Parties of the Right in East Central Europe”, *Debat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2005, Vol.13, No.1, pp.73-81.

②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社会民主党在中东欧国家有很大的发展，但受到苏联政治和冷战的影响，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在中东欧已经断裂，而宗教差异又使得在西欧影响力巨大的基督教民主党在中东欧没有选民基础。

当然也有学者依然对整个欧洲中左翼还抱有极强的信心。如艾伯特基金会政治分析处处长恩斯特·海勒布兰德博士（Ernst Hillebrand），就在其研究报告《欧洲中左翼现状》中对比了1990年代末到2012年欧盟国家的政党分布，指出，中左翼政党在欧洲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过程。海勒布兰德从社会经济承诺兑现不足、核心选民流失、民族国家认同感削弱、移民问题、代议制民主危机等角度，谈论了欧洲中左翼失势的原因。他认为，欧洲中左翼2000年以来在政治行动上的诸多失败举动导致了今天的消极情况。然而，金融危机使得公众对于放松管制、新自由市场感到失望，而中右保守党派往往同这些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反而给了欧洲中左翼政党一个重新崛起的机会。他甚至充满激情地写道：“社会民主主义虽然远不及二十世纪下半叶时那样强大，但它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更加积极的领导下，凭借新的旨在重新联合工人阶级选民的政策建议以及反映强烈个人主义社会关注和利益的政治策略，这些党派甚至可能重新变成这个时代的政治领导力量”^①。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海勒布兰德的激情想象是否能够在未来变成现实，但就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国家政治力量对比的特征来看，中左政党在中东欧甚至还面临历史负担的特殊困难，这个特殊难题就是，中左政党如何在秉承社会保护与社会公正价值观的前提下，与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遗产划清界线，并让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驾驭市场经济。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极右翼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表现

金融危机中，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后，全欧洲范围内极右势力迅速上升是一个公认的事实。2010年9月，德国最重要的新闻周刊《明镜》刊登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列举出当时在欧洲各国议会中存在的极右势力，宣称右翼民粹势力正在获得欧洲的广泛民意，并将使欧洲主流政党右倾化^②。根据这篇报道的分析，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极右党派在议会中的比例分别是：瑞典民主党5.7%，挪威进步党22.9%，芬兰真正芬兰人4.1%，拉脱维亚祖

^① 恩斯特·海勒布兰德，《欧洲中左翼现状》，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简报，2012年12月第17期

^② 目前学术界尚无法准确区分右翼民粹和极端右翼，故本文将其笼统归入极右政党。他们共有的特征是具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性质，极端右翼往往被指在行为上过激。

国与自由党 5.0%，立陶宛秩序与公正党 12.7%，比利时佛拉芒利益 7.8%，奥地利自由党 17.5%，奥地利未来联盟 9.2%，斯洛伐克民族党 5.1%，斯洛文尼亚民族党 5.4%，匈牙利杰布科 12.2%，保加利亚阿塔卡 10.1%，希腊泛东正教 5.6%，丹麦人民党 13.9%，瑞士人民党 31%，意大利北方联盟 8.3%，荷兰自由党 15.5%，其中瑞士人民党和意大利北方联盟已经参与组阁。情况比较特殊的是法国，虽然法国极右的人民阵线在法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其领袖勒庞甚至曾经有机会问鼎法国总统的宝座，但其在议会中却无代表席位^①。

长期以来，对于欧洲极右政党的支持和得票已经有大量的学术实证研究，如男性、青年人、中低受教育程度，包括特定社会阶层的投票者，比较倾向于支持极右政党^②。研究还显示，宗教信仰对极右翼政党支持者的影响也很大^③。而最新的研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两位年轻的德国学者诺拉·巴切尔龙（Nora Langenbacher）与布莱塔·施伦堡（Britta Schellenberg）完成的。他们利用全欧洲的研究网络，对西欧、东欧、北欧极右政党的组成和政治动员结构进行分析后指出，极右政党共同的特点是，往往利用三个因素推动自身发展。这三个因素分别是社会问题、抨击政治腐败和传播民族认同^④，而金融危机不仅催生，而且还膨胀了这三个因素的发展。还有学者如迪米特里·阿尔梅达（Dimitri Almeida）更敏锐地关注到，“欧洲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带来的问题，也是欧洲极右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催生因素^⑤。如果说上述研究是对全欧洲范围内极右政党的描述，那么，在中东欧转型国家，极右政治势力又有什么特点呢？

① “Continent of Fear: The Rise of Europe’s Right-Wing Populists”, Spiegel online, September 28, 2010.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continent-of-fear-the-rise-of-europe-s-right-wing-populists-a-719842.html>

② Lubbers, Marcel, Mérove Gijsberts, and Peer Scheepers,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2, Vol.41, No.3, pp.345-378.

③ Kai Arzheimer & Elisabeth Carter, “Christian Religiosity and Voting for West European Radical Right Partie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009, Vol.32, No.5, pp.985-1011.

④ Nora Langenbacher and Britta Schellenberg, “Introduction: An anthology about the manifestation 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adical right in Europe”, in Nora Langenbacher, Britta Schellenberg (ed.), *IS EUROPE ON THE “RIGHT” PATH? Right-wing extrem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11.

⑤ Dimitri Almeida, “Europeanized Eurosceptics? Radical Right Partie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ume*, 2010, Vol.11, Issue.3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东欧转型开始，得益于宽松的政治环境、混乱的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积压许久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少数派的压力，在整个中东欧范围内，极右政治势力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按与政治关联度高、特别是以有组织的政党运作方式来分类，那么在上世纪 90 年代，在斯洛伐克有斯洛伐克民族党（SNS），该党带有典型的法西斯式的民族主义意识认同，与保加利亚的阿塔卡（Ataka）属于同一类型。认同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依靠个人领导力组成的政党，有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萨摩布鲁纳（Samoobrona），有匈牙利的公民联盟（FIDESZ）、斯洛伐克的民主运动斯洛伐克（HZDS）。而典型的属于宗教特征的政党，在波兰则有波兰家庭联盟（LPR）。另一方面，如果按与政治关联度低、以社会运动形式来分类，那么在捷克有捷克共和党（Republicans），该党与匈牙利的杰布科（Jobbik）一样，是带有法西斯式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而在波兰还有非法西斯式民粹主义政党独立波兰联盟（KPN-SN）、匈牙利的匈牙利正义与生活党（MIEP）；属于宗教色彩的政党有波兰的基督教全国联盟（ZChN）、匈牙利的（KDNP）。上述各类型极右翼政党各有各的纲领和选民基础，并在过去二十年间影响了中东欧国内政治，包括社会思潮。（已对脉络进行区分，此处分为两个大部类，与政治关联度高和关联度低。各部类中，分别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宗教色彩政党）

中东欧国家极右翼政党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从议会选举得票情况看，以每五年为一个统计阶段，那么保加利亚一直到 2005 年之前，极右政党尚无法影响政治，属于社会运动阶段，但 2005-2009 年之间，保加利亚极右政党总共已经获得 8.7% 的得票率，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12% 的得票率。在 2013 年最近的一次议会选举中，极右政党阿塔卡获得了 7.3% 的选票，并获得了 23 个议会席位。在匈牙利，在 1990-1994 年的议会选举中，极右政党的得票率仅为 0.8%，1995-2004 年平均为 5%，2005-2009 年为 1.7%，2009 年欧洲议会选举得票率为 14.8%，而在金融危机后 2010 年最新的议会选举中，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得票率为 52.73%，更激进的杰布科（Jobbik）得票率为 16.67%，如果再加上匈牙利正义与生活党（MIEP）的 0.03%，那么按保守、民粹的双重概念统计，极右翼政党已经控制了匈牙利议会近 70%

的议席，是整个欧洲范围内极右翼势力上升最快的国家^①。在波兰，近二十年间极右势力反复较大，1990-1994年的议会选举中，波兰极右政党得票率为14.1%，是中东欧国家中比例最高的国家，而1995-1999年下降为8%，2000-2004年迅速反弹为18.1%，2005-2009又下降到10.4%。比较特殊的是，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波兰的极右势力得票一直不高，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势力得票率仅为1.5%。在波兰最近一次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以法律与公正党（PiS）为首的保守右翼政治力量共获得了近40%的选票，足以证明波兰右翼力量的传统与强大。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其他国家极右势力不同的是，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虽然可以归类为极右势力，但它是以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和民粹主义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如果不算这个党，那么以波兰农民党为核心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极右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在11%左右，显示了金融危机后波兰政坛基本平稳的态势。斯洛伐克的情况比较怪异。在2000年以前，该国极右势力有斯洛伐克民族党、民主斯洛伐克等很强的极右翼政党。如在1998年的议会选举中，民主斯洛伐克就曾得到过27%得票率，而同期斯洛伐克民族党的得票率仅为9.07%，极右政党在议会的席位超过1/3。但从2000年开始，民主斯洛伐克得票率急剧下降，2000-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极右政党总得票率为7%，而2005-2009年，由于斯洛伐克民族党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反弹上升为11.7%，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极右政党总得票率为5.5%。而在金融危机后2012年的最近一次选举中，这两个昔日强势的极右翼政党均跌出5%的门槛，其中斯洛伐克民族党得票率为4.56%，民主斯洛伐克仅为可怜的0.93%，在中左的社会民主党胜利的同时，极右势力几乎完全退出了斯洛伐克政坛。在斯洛文尼亚这个昔日的南联盟国家，以斯洛文尼亚民族党为核心的极右政党，在1992年的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达到了10.6%的峰值，从此一路下降，在过去二十年间得票率一直保持5%左右，而在2011年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斯洛文尼亚

① 需要指出的是，中东欧极右翼政党有一个与传统欧洲国家不一样的特点，即早年以极右翼政党意识形态为出发点的政党，经过时间磨练与改造，逐步开始向传统欧洲中右政党理念靠拢，如匈牙利的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又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PiS），这类政党在今天学术语境下既可以归为中右政党，同时其保守、排外的特性也可以将其定义为极右势力。

民族党得票仅为 1.8%，失去了议会席位，显示出金融危机以后，选民更趋理性。在传统上极右力量最弱的捷克，自 1990 年代捷克共和党获得 6.8% 的议会选举得票率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捷克的极右势力政党极度退化，从 2005 年开始，议会选举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极右政治势力的代表。相形之下，在 2010 年的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左翼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却得到了 11.27% 的选票，得以进入议会。

总结上述中东欧各个国家极右政党选举得票情况，可以看到，与老欧洲不同的是，除了匈牙利的极端特例，保加利亚因为族裔问题而持续上升的极右力量和波兰传统保守的极右运动以外，在中东欧大部分转型国家中，极右力量并未利用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崛起，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三国，表现最为明显。这显示了转型的中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后，经过制度建设、民主意识培养和各种文化交流，社会价值观更趋于多元与开放，选民更趋于理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欧盟的影响力和资金支持，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中东欧转型国家希望以开放的态度来欢迎投资，而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来排斥外来文化。而这一点，与金融危机后极右势力上升速度较快的北欧国家以及瑞士、奥地利等国的情况完全不同。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转型国家政党生态环境

在政治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下，除了考虑体制、机制对于政治和政党运作的影响外，还需要考虑环境因素对于政治的综合影响。在中东欧转型国家，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环境背景，除了转型国家的历史宏观大背景外，一个更现实的环境就是全球性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以及欧洲特有的欧债危机解决过程并存的现实。那么，在这两个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民主制度下，议会控制着立法与主要政策的通过，中东欧转型各国的主导政党在议会中又面对哪些具体的生态环境呢？

在捷克，2009 年刚成立的传统责任繁荣党在 2010 年大选中拿下 16.7% 的选票进入了议会。而另一个年轻的政党公共事务党（成立于 2001 年）也在此次大选中首次进入议会。目前，两党与中右政党中最大的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传统的中右和中左两大政党民主党和社民党虽然得票率大幅下降，但依旧保持了各自的地位。另外一些传统党派，如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和摩

拉维亚共产党、德国基民盟等，得票都略有下降，其中，基民盟首次跌出了5%的议会门槛。理论上，中右执政联盟可以稳定执政，就像德国基民盟与自由党长期互为执政伙伴一样。但鉴于转型国家的特点，2013年8月，捷克的中右执政联盟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自行解体，并于2013年10月提前进入大选，显示了在捷克，经过多年的民主化改造，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党派之间互信不够，即使在大方向上认同接近，但选民基础不同，特别是在预算约束具体政策方面互不认同，导致执政联盟解体。因此，捷克政坛自2006年“政治地震”后，议会中政党力量一直属于分散状态。

在中东欧最大的国家波兰，2010年4月的卡钦斯基总统飞机失事事件并未影响波兰政坛，2011年的议会选举也同样表现平稳，两大中右政党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牢牢占据着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而成立于2010年的帕利科特运动党获得了10%的选票，首次进入议会，但并未改变议会的政治生态。波兰的政治平稳一方面得益于两大中右政党的紧密合作，更重要的是得益于波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与长期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阶段，包括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波兰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其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强劲增长和内需消费旺盛。波兰经济一反常态，成为整个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突出的经济表现不仅让金融危机中的整个欧洲对波兰刮目相看，而且选民也极为满意执政党的表现，选民用选票高度评价了两大政党的合作与团结。

匈牙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政党在2010年大选后进入议会，分别是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党（成立于2003）和政治可以不一样党（成立于2009）。两大传统政党的境况截然相反：保守的中右翼青民盟获得了52.73%的选票，成为议会绝对多数党；中左的匈牙利社会党的得票率则骤降至19.30%，而且在2011年发生党内分裂，以前总理久尔恰尼为首的10名党员退出社民党另组民主联盟党。其余小党没有特别变化。这个结果显示，在匈牙利，虽然其过往开放、激进的吸收外资政策引发了高速增长，但金融危机爆发时，其过高的负债，以及外资的迅速撤离，引发了匈牙利经济的灾难与地震，选民只能将过失记在2006年通过选举上台的社会民主党头上，使该党成了欧洲中左政党选举失利的典型范本。

金融危机中短期表现不好的斯洛伐克，虽然在 2012 年提前进入大选，但在 2010 年和 2012 年两次议会大选中，除了社会民主党（方向党）逐渐拉开了与其他政党的差距外，并没有出现政党合并重组、新兴政党进入议会等情况，显示了金融危机中斯洛伐克经济情况总体平稳。中左翼的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不仅能够一枝独秀于中东欧转型国家，而且其稳健的社会政策，包括加入欧元区的选择，也得到了选民的认同。但提前进入大选的斯洛文尼亚则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议会格局：2011 年成立的积极党以 28.51% 的得票率获得 28 个议会席位，击败传统政党民主党和社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同样以新兴政党身份进入议会的还有成立于 2011 年的公民名单党，其获得了 8 个席位，虽然积极党可以被视为是分裂的中左政党，但它的出现完全打破了斯洛文尼亚政坛原来的平衡。

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情况异常平稳。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选举中，没有新政党进入议会，也没有传统政党面临分裂。在 2007 年大选时得票率最高的四个政党，改革党、中间党、社民党、祖国与共和国联盟，在 2011 年大选中总得票率都有上升，共占据了总得票率的 80% 以上，而其他小党则无一通过 5% 的门槛。这显示爱沙尼亚平稳度过了金融危机风暴，不仅国内政治平稳，且政治认同更加集中，体现了议会中良好的政党竞争与合作。立陶宛的议会格局在 2008 和 2012 年两次大选中变化也不大。工党、社会民主党、祖国同盟、自由运动等在 2008 年大选中获得席位的政党，继续占据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小党中，于 2012 年成立的勇气之路党首次进入议会并获得了 7 个席位，而在 2008 年成立并获得 8 个议会席位的自由与中间联盟，则在 2012 年选举中跌破 5% 的门槛失而去议席。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变化。变化较大的是拉脱维亚，2006、2010、2011 年的三次大选中，没有出现较为稳定的大党。2011 年大选后进入议会的政党都是经历过重组合并或是年轻政党，如和谐中间联盟（民族和谐党、社会党、新中间党于 2006 年合并而成）、扎特勒斯改革党（成立于 2011 年）、团结党（新时代党、公民联盟、社会政治改革党于 2010 年合并而成）、民族联盟（成立于 2010 年）、绿党与农民联盟（成立于 2002 年）。因此，波罗的海三国中数拉脱维亚议会政党力量最为分散，且得票比较平均，显示了拉脱维亚较为复杂的政

治格局。

分析中东欧转型国家的在金融危机、特别是在欧债危机影响下的政治生态，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特征，即在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环境下，经济表现平稳和较好的国家，如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陶宛，政党与政治格局变化不大；而匈牙利则因受恶劣的经济表现的影响，引发了政治地震；捷克的情况比较特别，平稳的经济并没有给政党博弈带来稳定，内部分裂引发的政治动荡属于政党合作和信任的话题。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政府运作特征

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在各种类型的民主制度下，政党如何影响政府的运作，一直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对此已经有过大量经典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阿伯柏氏（Aberbach）和普特南（Putnam）等人的开创性研究^①。而对于欧洲不同民主体制下高级文官任免的差异，以及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政府的问题，则有佩奇（Page）和赖特（Wright）进行了专门研究^②。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转型国家一个非常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议会选举时政党的更替、包括政党重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政府的运转？很显然，与美国等文官制度历史悠久的国家不同，与英国、丹麦等政府官员“去政治化”不同，甚至与德国、法国等技术文官成熟的国家也不同，中东欧转型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两位来自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研究者简·欣里克迈耶·萨林（Jan-Hinrik Meyer-Sahling）和蒂姆·维恩（Tim Veen）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认为，在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府始终要面临控制权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施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两位学者所说的“文官政治化”现象，即选举获胜的执政党为确保在政府内的控制力，将任命本党派成员担任政府高级官员。而当选举结果发生改变后，新的政府领导人与政府官僚机构之间的控制问题就会变得

① Aberbach, Putnam and Rockman, *Bureaucrats and Politician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Page and Wright (eds), *Bureaucratic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an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特别突出^①。例如，政府更迭是大规模的、跨意识形态的，那么政府就会大规模地更换官员。而相比之下，那些只包括一部分政党流动，且只涉及政治集团内部各政党的政府更迭，则只会产生较小的信任问题。

因此，从政治文化习惯和制度安排角度看，在中东欧国家，提升新部长和改变高级司局级官员的可能性都非常小。在中东欧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如果政府交替只是局限于总理的更换，而政府的控制党派构成仍然保持原样的话，那么控制问题和人员更迭将是最低程度的。而这个习惯和通常做法带来的弊病是，在这种“赢者通吃”的模式中，在执政政党频繁更迭环境下，政府的政策连续性非常差，技术官员不关心自己应该精通的业务和提升管理水平，相反却非常热衷于与本党有关的政治活动，将政党与政府完全关联和等同，造成“党国一体”的政治生态。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认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文化，特别是文官制度发育，还相当不成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前苏联体制的政治管理遗产。

例如在匈牙利，虽然 2002 至 2010 年相对较长时期的政府稳定，在本质上逐步增加了政府官僚机构的稳定性，但 2010 年最新的一次大选中，匈牙利中左的社民党惨败，中右翼青民盟的压倒性胜利造成了政府的彻底更迭。而问题的根源在于，2008 年社民党重组政府时，曾经彻底排除其他同盟者，把持了几乎所有部长职位，成为少数政府，而 2011 年组阁的青民盟不过是如法炮制。同样在波兰，波兰民主左派联盟（SLD）在 2005 年大选中降为得票率较低的一个小党，失去了政府中重要的阁员位置，直到 2011 年选举时还未恢复。2005 年至今，波兰政府由中右党派轮流执掌，但对大部分高级官员的替换在 2007 年仍然还在继续，而这种替换可以被视为波兰中右集团内部的斗争与博弈。又如在斯洛伐克，到目前为止，仍无法以传统西欧政党意识形态的左和右来区分政治集团。一个政治集团由具有社会民主党特征的方向党主导，但其中又包括右翼的民族党和人民—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而另外一个集团则主要是中右政党，包括保守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主政党。

^① Jan-Hinrik Meyer-Sahling & Tim Veen, “Governing the post-communist state: government alternation and senior civil service politicis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28, No.1, pp.4-22.

自 2006 年以来，以方向党执政（2006）、在野（2010）、重新执政（2012）三次议会大选经历为契机，斯洛伐克政府文官也进行过三次比较有规模的更换。捷克的政府更迭模式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模式很接近，主要的差异是在时间的长短上。在过去近十年间，只有 2006 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导致了政府内部的大规模更替，中右的公民民主党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在政府中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轮换。但与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相比，捷克的政府官僚更替并不算那么频繁。

斯洛文尼亚和立陶宛政府的更迭模式，则随着时间和环境而不断变化。直到 2004 年，斯洛文尼亚的政府一直都由政府体系中的一个集团所主导，即中左政党集团。在 2004 年前，政府高级文官相对稳定，选举之后的政府人员流动性比较低。但自中右的民主党扬沙政府于 2004 年上台起，斯洛文尼亚政府经历了转型以来最大的一次对人事任命的政治干预。斯洛文尼亚的例子说明，即使是经历了长时期的政府稳定，转型中的中东欧国家的高级文官政治化现象仍有可能反复出现。可以对比的是 2008 年前，立陶宛的政府更迭模式与斯洛文尼亚刚好相反。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立陶宛，大规模的、跨集团的更替出现在 1992 年和 1996 年，主要原因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主导的中左集团在选举中被前民主运动后继党中右集团的祖国同盟逐步替代而引发的政府规模性更迭。但 2000 年立陶宛议会选举后，中左翼政党再次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但政府的主要官员却仍然由中右集团的一些成员担任。立陶宛中左党派在 2001 年主导了一次大规模政府官员任命，权力移交几乎花了一年时间。而在 2004 年的议会选举中，中左集团胜出，于是再次确认了政府体系中中左力量的稳固。这意味着，立陶宛用几乎用了 8 年时间，完成了政府从中右向中左掌控的转变。但 2008 年的议会选举中，中左党派集团失利，又一次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跨集团的政府更迭，中右的祖国同盟再次重组政府。因此，立陶宛的例子说明，虽然经历了多年的相对稳定的建设，包括对专业公务员体系机制化建设的大量投资，但一旦议会选举结果发生改变，高级文官和公务员体系马上面临动荡，这给政府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比较例外的是，波罗的海三国中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没有出现过大规模

模的、跨集团的政府更迭，它们也是“高级文官政治化”程度最低的两个国家。在拉脱维亚，议会选举之后的所有政府变更都是局部的、中右政党集团内部的更迭。“高级文官政治化”的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得到大部分的解决。爱沙尼亚政府变化的轨迹与拉脱维亚相似，中右政党曾主导政府。1995年和1999年，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政府更迭，但主要是在保守主义政党与自由主义政党之间进行转换，而这两者其实都是明确地属于政治光谱的右翼。非常有意思的是，爱沙尼亚中左政党其实是执政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们却始终都不是较高级别的联盟伙伴。在过去十年里，爱沙尼亚所有的政府更迭都是局部的、集团内部的替换。与拉脱维亚非常相似的是，高级文官的政治化现象只是在独立和转型早期曾经是一个政治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由于转型国家的特点以及政治文化遗产（前苏联体制）的影响，中东欧转型国家由于政党选举变化带来的政府更迭是普遍的。而这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政策保持连续性以应对危机是不利的。中东欧许多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证明，高级政治家热衷于选举获胜，高级文官则完全听命于获胜政党的任免，这就导致国家经济政策混乱，造成不必要的动荡。匈牙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可信任的文官制度，以保证政府公共管理不受议会党派变革的影响，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是一个长期有待解决的问题。

结 论

总结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国家转型和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的多重背景下，中东欧转型国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党政治变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

从政党稳定程度来看，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的“政党表”最为稳定，在金融危机时期的几次大选中，进入议会的政党没有变化。其次是波兰、立陶宛、捷克，各有1-2个年轻政党进入到议会中，但其传统政党的根基依然较

稳固^①。匈牙利、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的“政党表”则有较大变动。匈牙利在最近一次 2010 年大选中，不仅中右政党获得压倒性多数，国内主要政党社民党于 2011 年发生分裂，同时另有 2 个新兴政党进入议会，显示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党体系重新洗牌。而拉脱维亚现议会中的 4 个主要政党则全部成立于 2010 年以后，显示出国内政党的新组合。斯洛文尼亚议会目前的最大的政党是 2011 年才成立的积极党，另有 1 个年轻小党进入议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我们将研究视角细化到议会席位时，中东欧各国政党结构又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如在爱沙尼亚议会中，主要政党改革党、中间党和社民党在最近几次选举中都占据了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政党结构平稳。在捷克、波兰、立陶宛，传统政党同样把持着议会多数席位。斯洛伐克议会中的政党数量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社会民主党（方向党）在 2012 年的最近一次大选中获得了 44.42% 的选票，呈现出一党独大。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匈牙利中右的青民盟身上。而拉脱维亚议会虽然都是新政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过去议会中的传统的大小政党合并而成的。在我们考察的中东欧 8 国中，只有斯洛文尼亚出现了新兴政党黑马夺魁，而改变国内政党力量对比的情况。

从政府的稳定性来看，以政府更替作为视角分析，如表 1 所示，波罗的海三国政府几乎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左右更替情况，斯洛文尼亚、捷克、匈牙利紧随其后，波兰和斯洛伐克政府大规模更迭最为频繁。其中，除斯洛伐克、匈牙利外，其余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并没有出现左右集团的大规模更替。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对中东欧政党结构的影响并不具有规律性，其主要变化还是依据转型多年来政治变迁的结果，而金融危机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则对某些国家的政治结构重组发生了重大影响，如匈牙利。但中东欧转型国家转型的起始点，特别是前苏联影响的历史记忆，对于中东欧国家今天的政治格局及其定型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如在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经过二十年转型，左翼几乎没有翻身的可能。波兰对于

^① 捷克情况比较特殊，2013 年 8 月议会解散是因为中右执政联盟内部分裂，虽然三个中右政党的选民基础依然稳固，但 2013 年 10 月的大选结果显示，基于对中右长期控制捷克政坛的厌倦，中左政党社会民主党开始主导捷克政坛，但这似乎与金融危机没有直接关联，更多的是民主制度下“政治厌倦”的积累。

前苏联（包括俄罗斯）传统上的仇恨，使得在波兰几乎没有像样的左翼。而捷克中右政党是转型后稳定的传统大党。捷克虽然在历史上有很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但“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记忆，还是使很多捷克选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高的选民排斥来自“左”的意识形态。因此，在 2006 年后，捷克中左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机会执政，同时，捷克社会民主党也同样排斥“更左”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共产党。

表 1 1990-2011 年中东欧国家选举造成政府更替的情况

	左右派系 大规模更替	左右派系 部分更替	派系内部 大规模更替	派系内部 部分更替
拉脱维亚	0	0	0	4
爱沙尼亚	0	0	2	2
立陶宛	1	0	1	1
斯洛文尼亚	0	2	0	1
捷克	2	0	0	2
匈牙利	3	0	0	0
斯洛伐克	4	0	0	1
波兰	4	0	1	0

数据来源: Jan-Hinrik Meyer-Sahling & Tim Veen, “Governing the post-communist state: government alternation and senior civil service politicis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2, Vol.28, No.1, pp.4-22.

如果说，金融危机过程中对于中东欧国家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党认同是一个很好的检验，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的政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了差异化，有些国家呈现出稳定迹象，有些国家则依旧混乱，存在着缺乏强有力的政党、高级官员丑闻、执政联盟内讧等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在外部危机的催化下，极有可能继续延续中东欧政党的不稳定状态，比如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在 2013 年都面临了政府解散重组的窘境。

从金融危机开始的 2008 年到 2013 年 8 月份，我们所考察的中东欧 8 国分别经历过 1-2 次议会选举，其中捷克、拉脱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遭遇了议会提前解散。在本文完成时，捷克议会处于解散状态，而其他中东欧 7 国政府结构如下表 2。

表 2 中东欧各国政党分布情况

	2013 年 8 月
中右党派为执政党，中左党派为反对党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
中左党派为执政党，中右党派为反对党	斯洛伐克
联合政府（中右主导、中左参与）	
联合政府（中左主导、中右参与）	斯洛文尼亚、立陶宛

从总体对比可以看到，除了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一枝独秀，为整体衰落的“粉红色欧洲”在中东欧增添一抹亮色以外，中左翼政党在金融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的表现是持续衰退，而传统上强大的中右党派则借机强势占据了中东欧的政治版图。比较特别的是，在金融危机中，中东欧国家的极右势力相比北欧、瑞士、奥地利并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政党，除了在捷克还有一定影响力外（选票较 2006 年下降），在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已经看不到其政党活动的迹象。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转型的中东欧国家，中右、中左两大政治力量主导政坛的格局没有发生动摇，任何意识形态的极端势力也没有利用金融危机崛起。

总体而言，从转型的角度看，除了少数比较稳定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与捷克之外，中东欧政党结构仍然处于浮动的阶段，特别是其政治与公共管理的边界不清带来的困惑，将长期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政府能力。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是否能够进一步将政治制度化，并逐步重构其政治生态，这是一个与转型有关的长远问题。

【Abstract】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EC) have a specific instability which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within those countries.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and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2009, concerns about this instability were exacerbate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lection results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CEEC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s were still dominated by the traditional centrist parties, namely central right and central left. Meanwhile,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extreme parties have risen during the cri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EEC and its impacts on government in order to offer convincing explan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features of CEEC's party politics transition.

【Key Words】 Post-crisi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arty Politics, Structural Transition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артийная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особой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данн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и связана с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м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2008 г.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олговой кризис 2009 г., несомненно, укрепили опасения людей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этой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ыборов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анализа общей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осткризисный период можно обнаружить, что положение двух доминирующ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л — правоцентристских и левоцентристских — не изменилось, никако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ие силы также н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финансовым кризисом. Данны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вызываю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обсуждения особой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а также проведения анализа её влияния н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 тем, чтобы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ущих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ле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形象·符号**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石芳*

【内容提要】启蒙时代是“欧洲”建构的关键时期，而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对“欧洲”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在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构造了较为权威的启蒙运动模式的俄国观，将其刻画为一个通过学习“欧洲”，从而摆脱野蛮、落后，在“文明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繁荣先进、文明开化的“欧洲”形象也呈现在这种俄国镜像中。伏尔泰塑造的俄国形象，对其后几百年欧洲的身份认同和欧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作为“学徒”的预设的不平等地位，在数百年中主导了欧洲关于俄国的话语，至今仍然是导致欧俄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欧俄关系 俄国形象 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 启蒙时代

【中图分类号】 D83/87(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4)01-0074-(18)

启蒙时代是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作为一种文明的“欧洲”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精英们主导了这一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而启蒙思想家们尤其贡献卓著。他们将“欧洲”定义为一种世俗文明，并叙写其历史，丰富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心态内涵，塑造其现代性，构成“欧洲”观念的元叙事，影响此后欧洲人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与策略。同二战后

* 石芳，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一样，在启蒙时期，“‘欧洲’被描述为由商业聚集在一起的诸国所组成的共和国”，“以结束接连不断的破坏性战争”。^①同样，启蒙时代的“欧洲”东部边界也模糊不清，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始终是欧洲认同的一个棘手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在探究了历史、宗教、心理、知识、社会、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基本因素之后，关于俄罗斯的欧洲身份或非欧洲身份的争论，依然没有定论。“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事实在于，这些争论的基本参数，仍然与几个世纪之前一样。”^②

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国开始走上一条“欧洲化”的道路。北方战争的胜利遏制了三十年战争的主要战胜国瑞典，成功地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奠定了俄国作为强国的重要基础。俄国的崛起震动了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了他们对这个“奇异而陌生”国家的关注。同时，发展臻至完美而衰的法国乌托邦文学，开始将主题从遥不可及的“新世界”转向了更加实在的、更可感知的实例，“文明化”的俄国正好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俄罗斯迅速成为法国文人好奇心的主要目标和重要的文学角色。”^③不仅孟德斯鸠、丰特奈尔、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十八世纪的标志性人物对俄国论述颇多，还有很多其他文人也写下了俄国主题的游记、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十八世纪的俄国在法国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很早就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冯·莫伦席尔特的《十八世纪法国文人生活中的俄国》（1936），以极其广泛的资料，研究了在法国文学中作为一个主题的俄国。^④莫莎科夫斯基的博士论文《十八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俄国形象》，着重分析了十八世纪各类文学作品塑造的多样的俄国形象：从最乐观的对俄国“文明化”成就的“痴迷”（视俄国为启蒙的化身、“新欧洲”的楷模），到最悲观的“诋毁”，（抨击叶卡捷琳娜为专制的伪善者，视俄国仓促匆忙的荒谬改革为其所有邪

① J.G.A. Pocock, “What Do We Mean by Europe?”, *The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1997, Vol.21, No.1, p.29.

② Vladimir Baranovsky, “Russia: A Part of Europe or Apart from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 2000, Vol.76, No.3, p.444.

③ Marek W. A. Mosakowski, “Image of Russia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Ph.D. Thesi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7, p.7.

④ Dimitri Sergius Von Mohrenschildt, *Russia i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36.

恶的根源), 落差巨大。^①

在启蒙思想家中, “伏尔泰是第一个在细节上、以启蒙叙事清晰阐述欧洲崛起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作品的主题, “聚焦于一种独一的、共同的欧洲文明的存在和演变。”^②伏尔泰对俄国的兴趣最早体现在他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史》(1731)中。在《查理十二》中, 伏尔泰将彼得大帝描绘为查理十二的主要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 沙皇彼得的人格、成就越来越让伏尔泰着迷。与浪漫英雄式但实质上没有建设性的查理十二相比, 伏尔泰逐渐将彼得大帝视为一个更具深刻历史意义的伟大人物。1746年, 伏尔泰成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 其与俄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从1745起, 伏尔泰就劝说沙皇伊丽莎白允许他写作一部关于其父彼得的历史。1748年, 《沙皇彼得大帝的趣闻轶事》出版。1757年, 伏尔泰被任命为俄国官方史学家, 并获得授权写作彼得大帝的历史。两卷本《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历史》在1763年最终完成。终其一生, 伏尔泰与包括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内的一些俄国政治、知识精英保持着联系, 也是在法国沙龙中宣传俄国的旗手之一。凭着他关于俄国历史研究的著作, 以及其与俄国的长期紧密联系, 伏尔泰获得了“俄国专家”的头衔。

伏尔泰与俄国的特殊关系, 是一个比较受关注的研究主题。这些研究成果集中于伏尔泰与俄国统治者、知识界的关系, 他所塑造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形象等问题;^③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伏尔泰对俄国文学和政治的影响。^④但这些研究, 大都忽略了伏尔泰在所塑造的俄国形象中反映出来的欧洲观念。拉里·沃尔夫所著的《发明东欧: 启蒙运动想象中的文明地图》

① Marek W. A. Mosakowski, “Image of Russia i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Literature”, Ph.D. Thesi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7. UMI No. 9720120.

②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 history from Voltaire to Gibbon*, Cambridge,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2.

③ Hélène Ravera Day, *Voltaire’s Portrayal of Peter the Great*, Boston: s.n., 1971; Carolyn H. Willberger, *Voltaire’s Russia: Window on the East*, Oxford: The Voltaire Foundation at the Taylor Institution, 1976; Carole Elaine Crate, “Voltaire and Russia”, A.M.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64; Inna Gorbato, “Voltaire and Russia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rbis Litterarum*, 2007, Vol.62, No.5, pp.381-393; Inna Gorbato, “From Paris to St.Petersburg: Voltaire’s library in Russia”, *Libraries & the Cultural Record*, 2007, Vol.42, No.3, pp.308-324.

④ Wanda Dzwigala, “Voltaire in 18th century Russia and Poland”, M.A.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1981.

(1994), 主要研究启蒙运动如何塑造“东欧”(包括俄国)的黑暗、混乱、落后的形象。^①但他与许多研究伏尔泰史学的学者一样,忽略了伏尔泰的俄国史著作。中国学界对伏尔泰的研究,主要关注他的社会历史观、哲理小说等;对他的“中国观”论述较多,但较少关注伏尔泰对其他“他者”的兴趣。在研究资料方面,对伏尔泰史学的研究基本根据《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实际上,伏尔泰的俄国史著作值得重视。他描述了最早、最权威的启蒙模式的俄国形象,并在其镜像之中反观自身,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伏尔泰塑造的俄国形象,以及这种形象中反射出来的“欧洲”文明图景,通过这两部畅销的历史著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历史》,以下简称《俄国史》上、下卷)而深入人心,建构了关于俄国和欧洲观念的元叙事,对其后几个世纪欧洲身份认同的塑造以及欧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欧洲还是亚洲：俄国的身份问题

自从十六世纪西欧人重新发现俄国以来,他们就对俄国的地域归属存在着疑惑。俄国到底属于哪个大洲?这个问题无论对欧洲还是俄国的身份认同而言都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欧洲”所指涉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陆地,也是一种“文明”。在近代早期,“一种文化与政治的排他性”和“优越感”产生了,并“逐渐变得坚定起来,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自负,认为欧洲是最文明的。”“正是在这个时刻,由于地理知识的进步,源自古典时代的欧亚划分观念受到侵蚀,区分欧洲与亚洲的诉求在意识形态上反而强化了。”^②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人们提出许多划界方案,从维斯瓦河到叶尼塞河之间的各条南北向河流以及乌拉尔山,都曾被提议作为欧亚的分界线,以求解决古希腊人想象的“亚速海—顿河”界线的消失所造成的欧亚界线不清问题。^③

①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The Map of Civilization on the Mind of the Enlighten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Mark Bassin, “Russia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Slavic Review*, 1991, Vol.50, No.1, p.3.

③ W. H. Parker, “Europe: How Fa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960, Vol.126, No.3, pp. 278-297. 此文根据欧洲历代地图,详细分析了欧洲人创制的各条欧亚北段界线方案。

伏尔泰的《俄国史》也不能回避寻找欧洲东部边界的这场论争。在结束对俄国西部领土的描绘时，他写道：“考察了这些巨大的省区之后，将视线投向东方，你会再一次对欧洲和亚洲的边界感到困惑。……当我们跨过亚速海之后，我们不再知道欧洲在哪里结束，或亚洲从哪里开始。”^①在此书下卷所附的俄国亚洲部分的地图上，欧亚之间的分界线是伯朝拉河、卡马河、伏尔加河中游以及顿河下游。看起来，伏尔泰接受了彼得大帝时期兴起的观点，即，将俄国视作由位于欧洲的宗主国和位于亚洲的殖民地组成的帝国，将俄国的核心部分归属于欧洲。

尽管伏尔泰承认俄国的核心部分属于欧洲，但话语之中流露出来的态度却是复杂的。伏尔泰称，“现在被称为俄国的这个国家，其范围比欧洲的其他部分还要大”；彼得堡的新夏宫“是欧洲最漂亮的建筑之一”；在莫斯科，“很久以前，在鲍里斯·戈东诺夫沙皇统治时期，他们就能铸造出欧洲最大的钟”。^②这些描述，显然将俄国包括在欧洲范围之内。不过，伏尔泰又说，“这个广袤的国家，在彼得大帝之前几乎不为欧洲所知。”^③既然俄国不为欧洲所知，暗含的意思就是俄国不属于欧洲。这种下意识的“排除”，在伏尔泰笔下并不少见。“那个时候莫斯科既不辉煌壮丽，也没有我们欧洲的伟大城市的艺术。”显然，不“伟大”的莫斯科城，不在“我们欧洲”的范围之内。“西班牙是所有欧洲王国中人口最稀少的，我们可以估算为每平方英里40个人；而在俄国，你可以计算为不足五人。”^④既然在欧洲所有王国中人口最为稀少的是西班牙，那么更加稀少的俄国就应该不是欧洲王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当伏尔泰将欧洲阐释为一个共享某些宗教、公法和政治原则的国家体系时，毫不犹豫地排除在外：“长期以来，基督教欧洲（俄国除外），可以被视为一个与分为若干邦的大共和国相类似的国家。”^⑤

① Voltaire, *Histoire de L'Empire de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2 parties, *Oeuvres historiques*, Pairs: Gallimard, 1957, Première partie, p.368.

②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54, 358, 362.

③ Voltaire,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roi de Suède*, *Oeuvres historiques*, Pairs: Gallimard, 1957, p.69.

④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62, 354-355.

⑤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页。

俄国的地域身份令人困惑，不仅是由于欧洲人所继承的古希腊地理知识的缺陷，也因为“俄国人的行为、服装和习俗，总是更接近于亚洲而不是基督教欧洲”^①。“他们的婚礼是按照土耳其和波斯的习俗举行的”；沙皇从其臣属的美女中选妻，是“古代亚洲的风俗”；“大部分税收以实物形式上交，像土耳其的风俗那样”。“沙皇的头衔，很可能起源于喀山汗国的‘Tzars’或‘Tchars’。……‘Tzar’这个名称是那些东方君主的称号。”“在常备军方面，俄国与土耳其相似。”在莫斯科，“一个荷尔斯泰因的本地人，一定会为沙皇的巨大宫殿的亚洲式壮丽感到震惊。”“节日里，莫斯科的宫廷按照波斯君主的方式展示其宏伟壮丽。”在宗教方面，“自从11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宗教就是我们所说的与拉丁教会相对的‘希腊教会’，但比起那些基督徒定居的省区，这里往往有更多的伊斯兰教和异教省区。”^②普鲁特河战役，彼得被土耳其军队包围，陷入了异常危险的境地，不得不使用贿赂的方式以脱离险境。伏尔泰告诉读者，这是“远古东方的习俗”，“东方的风俗与我们的如此之不同。”^③梁赞诺夫斯基在其《俄罗斯史》中写到，“从有关资料中得出来的一个印象是，土耳其比莫斯科公国更接近西方，这不由得让人怀疑俄罗斯人是否为真正的基督徒”。^④伏尔泰正是提供这种资料的源头之一。

关于俄国的地域归属，鉴于其“包括了欧洲和亚洲的北方部分”，^⑤伏尔泰还提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将从波罗的海到中国的这整片土地，命名为北极或北方大陆（arctiques ou terres du nord）也许是合适的，就像我们将位于南极、面积并不比其小的土地称为南方大陆那样。”^⑥十九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提出了一个“俄—欧亚”（Russia-Eurasia）的概念，不仅将俄国所占据的欧亚大陆北部作为一个单一的地理整体，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人种整体。如今很难判断，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否受到了伏尔泰的影响，但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人比伏尔泰更执著地使用“北方”这个词汇来指称俄国。“在本世

①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80-381.

② Ibid, pp.430, 389, 428, 382, 361-362, 383.

③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Seconde partie, pp.490, 496.

④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焱、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2页。

⑤ Voltaire,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p.68.

⑥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368.

纪开始时，一般人除了查理十二之外，很少知道北方的其他英雄。”“直到很晚的时候俄国才接受了基督教，就像其他所有北方的国家一样。”^①在《风俗论》中，俄国这片土地的出场则是这样的：“我从北欧的基督教国家说起。莫斯科大公国当时正在形成一个国家……”^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早期欧洲的语境中，“欧洲北部”、“北方”，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方位概念。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划分，即“文明”、“繁荣”的南方和“野蛮”、“未开化”的北方。这是源自古罗马地域观念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的视角。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也说，“意大利把所有位于阿尔卑斯山背后的民族统称为野蛮人。”^③但到了十八世纪，根据拉里·沃尔夫的研究，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将这种南北划分转变为东西划分，构造出“混乱”、“黑暗”的东欧和“秩序”、“光明”的西欧。^④不过，在十八世纪，长期流行的南北二分法话语系统还没有完全改变，作者们仍常用“北方”来指代波兰、俄国等地。^⑤伏尔泰将俄国定位于欧洲北方，有意无意地描画出了俄国“野蛮”、“未开化”的形象。

二、俄国肖像：“欧洲门口的野蛮人”

居斯蒂纳侯爵在其 1839 年的俄国游记中写道：“很容易被这里的文明假象所欺骗”，但“当你仔细观察人、事、物的本质，你就会觉察到存在着一种真正的野蛮状态，它仅仅被掩盖在一种令人恶心的富丽堂皇的外表之下。”^⑥这本俄国游记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游记作品之一，并在冷战时期再次大受欢迎。“欧洲门口的野蛮人”，是欧洲的俄国观最具典型性的表达，可以在

①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53, 383.

② 伏尔泰：《风俗论》，中册，第一一九章，梁守锵、吴模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80页。

③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8页。

④ Larry Wolff, “Voltaire’s Public and the Idea of Eastern Europe: Toward a Literary Sociology of Continental Division”, *Slavic Review*, 1995, Vol.54, No.4, p.933.

⑤ Guido Franzinetti, “The idea and the reality of Eastern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008, Vol.34, No.4, p.364.

⑥ Astolphe, marquis de Custine, *Empire of the Czar: 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trans. Anonymous,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128.

最近三个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追溯到其踪迹，且至今仍然存活于欧洲关于俄罗斯的话语中。在冷战时期被回收再利用的居斯蒂纳的观点，实际上受到过启蒙运动所塑造的套话和偏见的深刻影响。

在十八世纪，虽然伏尔泰没有到过柏林以东的地方，却没有人比他更权威、更热情地书写俄国。在其作品中，法国的“俄国幻景”，特别是“彼得神话”，更进一步发展。他将俄国设想为“一种挣脱野蛮的救赎精神”，^①塑造了俄国作为一个落后之地的观念。“这些莫斯科公国人还不如被科尔特斯发现的墨西哥人文明：他们天生就是奴隶，而他们的主人也同样野蛮，还处在无知的状态之中。”^②“今天文明民族所怨恨的各种弊端，对俄国人来说可能都是天经地义的法律。”^③在伏尔泰的笔下，自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发表《莫斯科纪事》^④（1549）以来，西欧文献中关于俄国的诸多意象也再次呈现，如妇女闭门不出、作为俄国专制统治象征的鞭子、代表俄国人道德放荡的狂欢节、残酷的刑罚等等。“野蛮”常常是用来概括俄国印象最“合适”的词汇。

伏尔泰在《俄国史》上卷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描述俄国概况，但（也许是故意地）没有明确区分彼得改革之前和之后。关于莫斯科，他引用卡尔利尔伯爵的抱怨：“不能在莫斯科找到任何使生活舒适的东西”。^⑤其他地区并不优于莫斯科。南部顿河流域的别尔哥罗德、沃罗涅什、下诺夫哥罗德三个省份，是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但伏尔泰并没有讲述它们如何肥沃，暗示这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开发。关于乌克兰，伏尔泰称，“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扩张到了那么多的地方，但他们的省区远没有乌克兰这么肥沃。”然而，“自然表达了它对这些居民的厚爱，他们的事业却没有跟随上它：他们部分地依靠没

①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p.11.

② Voltaire, *Histoire de Charles XII*, p.69.

③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一九〇章，谢戊申、邱公南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65、473-474页。

④ 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Sigismund von Herberstein）曾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使臣两度出使莫斯科公国，他的《莫斯科纪事》（*Rerum Moscovitarum Commentarii*）于1549年以拉丁语发表，随后被翻译成德、英等多种俗语，被认为是第一部向拉丁基督教世界全面展示莫斯科公国的著作，对后来关于俄罗斯的描绘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仍不时以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再版。

⑤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362.

有开发但肥沃土壤的自然产出生活，更主要地依靠劫掠为生。”阿斯特拉罕，拥有“十分令人愉快的气候”，物产丰富，但“这个美好的地区被鞑靼人嵌入而不是定居，他们从不开发这片土地，而只是像异乡人一样生活。”^①至于那片从 1563 年才逐渐被人们发现、原始且大得吓人的西伯利亚，除了勇敢且常常丧命于此的探险家，就只有与当地的野蛮人做皮毛生意的商人，以及逃亡的农奴、被流放的犯人出没。伏尔泰笔下的这一片广大的俄国土地，从其核心区域到边缘地区，处处显示出一派蛮荒、未开发的状态，即伏尔泰所说的，“他们拥有全球最大的领土，却还没有一切必要的技艺”。^②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也同样未开化。根据一份 1747 年缴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统计表，伏尔泰推断，“俄国现在至少有 2400 万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罪犯或农奴，就像波兰、某些德意志地区，以及以前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样。”伏尔泰申明，这份统计结果不包括被征服者、哥萨克、乌克兰人以及西伯利亚等地区的人，那些地方根本没有进行过人口统计。所以这 2400 万人口，就是伏尔泰所谓的“真正的”（*proprement dits*）的俄国人了。^③且不说伏尔泰描绘的俄国边缘地区“身高只有 3 腕尺”、“在只能得到鹿奶和鱼、长满苔藓的岩礁上定居”的拉普兰人^④，那些“不认识面包的用途”、“住在洞穴、雪地中的茅棚”用毛皮换取钉子的西伯利亚野蛮人，以劫掠为生的哥萨克、鞑靼人等，^⑤他们处在伏尔泰的历史时间之轴的哪一个时代，就是这些“真正的”的俄国人，也还处在“以前欧洲”的状态，处在过去。到了十九世纪，强调俄国境内存在的穆斯林以及其他亚洲少数民族，“欧洲门口的野蛮人”这个形象便进一步地强化了。

俄国人生活在“过去”，明显地体现在其习俗、社会和制度等各方面。

①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64, 366.

② Ibid, p.388.

③ Ibid, p.377. 前文伏尔泰曾说道：“斯基泰人、匈人、玛萨塔塔伊人、斯拉夫人、辛布里人、盖塔伊人、萨尔马特人如今都是沙皇的臣民，而真正的俄国人是古代的罗科索拉尼人或斯拉夫人。”（p.376）

④ “拉普兰人”，原文为 *Pygmées septentrionaux*，意为北方俾格米人。中译本《风俗论》译为“北方小人国”，童话色彩有点浓。伏尔泰用“*Lapons*”称呼俄国极北地区的这个族群，为避免误会，此处也译为“拉普兰人”。

⑤ 伏尔泰：《风俗论》，中册，第 483 页。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 359, 369, 364.

除去东方的、亚洲的因素，他们的习俗总体上是古代的：例如“收取实物贡品的古代习俗；以实物支付大使在路途上、在当地停留时期的费用的古代习俗；从不在教堂里或在君主面前佩剑的古代习俗”。俄国人穿的长袍，虽然比西欧的“假发和短上衣更愉悦眼睛，也更适合寒冷的气候”，“但这种服装，原先所有国家都使用，只是看起来不太适合战争和手工劳动”。所以，彼得大帝禁止长袍无疑是进步的举动。彼得改革了波雅尔贵族上战场时带着大批家臣和农奴的习惯，“这是法兰克人、匈奴人、哥特人、汪达尔人的组织方式”，如果这种军队与“我们时代整个欧洲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作战，他们“一定会被轻而易举地摧毁”。^①总体而言，俄罗斯的这些习俗与伏尔泰的时代相比，属于过去。

伏尔泰虽然继承并利用了十六世纪以来西欧传统文献中关于俄国野蛮形象的诸多象征，却更加关注风俗习惯、行为举止、社会经济状况。因此，粗野、懒惰、酗酒、放荡、淫荡、野蛮、残酷等等惯用于“野蛮人”的习语，逐渐退居次席，而“落后”这个术语则浮出水面。启蒙思想家总体上具有人类与社会将不断进步的信念，他们将全世界不同的社会状况、习俗、行为，甚至不同的人种及其文化，都组织成了一部进步的阶梯。既然启蒙运动模式中的彼得大帝献身于拯救俄国于野蛮、无知和落后的状态，那么，说俄国人生活在“我们的过去”就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俄国史》围绕着彼得大帝与瑞典的北方战争以及他“对俄国的伟大计划”展开。为了写作这部史书，伏尔泰几乎阅读了所有他能得到的关于俄国的旅行记录及各种档案。伏尔泰还长期与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内的俄国政治和知识精英通信。威尔伯格认为，伏尔泰“欢迎俄国加入启蒙的西方国家共同体，并且表扬它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在技艺和科学上的进步”；但是启蒙思想家们对“俄国的文学成就采取了共同的轻视”，“除了他宣称俄国在艺术方面的进步外，没有实际地提到任何杰出的俄国文学作品。”^②纵观全书，不仅没有提到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的文学成就，也没有提到任何能被伏尔泰看作“文明”的艺术和科学成就。而同样试图书写一个时代的《路易十四时

①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381, 408.

② Carolyn H. Wilberger,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Scholarship on Russian Literature", pp. 506-507.

代》，则辟出专门章节铺陈当时法国的商业、科学、文学和艺术，构成了伏尔泰所赞颂的“最接近尽善尽美之境的时代”^①最华丽高贵的篇章，可称之为全书的高潮部分。《俄国史》与《风俗论》几乎同时成书，作为一个以法律、艺术、风尚、精神为旨趣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个认为“唯有良好的法律、各种研究机构、科学和艺术的不朽成就才能与世长存”的历史学家，^②对这一时期俄国的文学、戏剧、音乐、建筑、绘画、科技等文明成果都没有描绘，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1716年，彼得大帝再次出访西欧诸国，这一次他到了巴黎。“当进入卢浮宫看到挂着奖章的画廊时，他更加惊讶了……”^③伏尔泰详细描写彼得参观卢浮宫、戈贝兰挂毯厂、艺术家的工作间以及法兰西科学院，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与对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艺术、科学成就毫不提及相对照，这显示出，无论伏尔泰如何称赞彼得引进了“我们”的习俗和艺术，使艺术、科学在俄国繁荣起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还是认为，俄国的“文明”程度比起以法国为代表的“我们”来，仍然差得很远。“俄国要变得像我们南方国家那样人口稠密，富饶，城镇密布，还要几个世纪以及一系列像彼得大帝那样的君主。”^④卢梭的论断是，“俄罗斯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开化的民族”，^⑤对俄国与野蛮决裂、走向文明的潜力的质疑时常出现。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俄国人始终都是“欧洲门口的野蛮人”。

三、文明图景：俄国镜像中的“欧洲”

“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⑥对“欧洲”而言，俄国从来没有完全成为欧洲的“他者”，一直介于“自我”和“他者”之间。

①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7页。

② 同上，第492页。

③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Seconde partie, p.535.

④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354.

⑤ 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1页。

⑥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26页。

“欧洲”观念也就在辨别俄国的欧洲成分与非欧洲成分的过程中形成。作为“第一个在细节上以启蒙运动方式的叙事，清晰表述欧洲的崛起的人”^①，伏尔泰不仅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阐释了共享某些宗教、政治、公法基础的欧洲；不仅在《风俗论》中通过对世界各地历史的铺叙总结了欧洲的特性；也在其《俄国史》中通过对彼得改革的描绘将欧洲的“文明图景”展现出来。由于“引进我们的习俗”使得俄国具有了欧洲国家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特征就在彼得大帝“关于俄国的伟大计划”中展现出来。这个“伟大计划”，“是一种镜像，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像，赞美彼得大帝就像是彼得大帝在赞美我们的服装、我们的习俗、我们这一部分欧洲。”^②

在《俄国史》初版一开篇，伏尔泰就表达了对俄国崛起的钦佩与惊讶：“在1700年，谁能够想到索利卡姆、喀山以及伏尔加河、萨伊科河岸边的居民，能够与我们最优秀的军队相匹敌？”^③当时俄国不仅在北方战争中打败了瑞典，而且武力干涉了德意志事务，所以“我们”一词的使用将包括瑞典、德意志在内的一个主体与俄国区别开来。在伏尔泰笔下，“我们”一词并不罕见：“我们以前不把莫斯科公国称为俄国，我们对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④“离我们的世界最近的省份是利沃尼亚”。“彼得大帝在生活上，在旅行上，在行动上，所有事都显得与我们的行为和习惯非常不同”。^⑤“我们”一词的频繁出现表明，伏尔泰虽勉强承认俄国是欧洲国家，却保留了明显的“你”、“我”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还未完成的情况下，具有明显世界主义特征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我们”，指代的并不只是法国人，而是所有能够阅读其作品的欧洲读者公众。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其不断增加的财富，扩大了艺术、音乐、文学、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消费受众。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就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阅读公众”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通过提及欧洲的公众，尤其是使用复数第一人称，伏尔泰对‘他们和我们’的比较所析出的精华，

① Karen O'Brien, *Narratives of Enlightenment*, p.22.

②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p.209.

③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Oeuvres historiques, notes et variants*, p.1687.

④ 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一九〇章，第465页。

⑤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356; Seconde partie, p.528.

将论述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差别和着重强调的非我性。”^①

伏尔泰阐明，彼得大帝争夺波罗的海、黑海出海口的目的，除了发展贸易、航海和增强国力外，“荣耀也是每个改革者都热切追求的。它既不存在于波斯也不存在于土耳其，而存在于我们的欧洲部分（notre partie de l'Europe），在这里，一切种类的才智和能力都处于不朽的地位。总之，彼得大帝并不想在其臣民中引进土耳其或波斯的习俗，而是我们的。”^②“对伏尔泰来说，彼得大帝不仅将欧洲的行为举止赋予一个欧洲国家；他做得更多，他将‘我们欧洲部分’的行为举止，赋予了属于另一部分欧洲的一片大地。”^③很明显，在他眼里，“我们的欧洲”与俄国的欧洲不同，最为可喜的是，他们所学习的是“我们的”。

彼得大帝一生中两次出国考察。第一次出国考察时，彼得大帝的全部活动就是考察学习欧洲的先进技术。彼得大帝对荷兰和英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尤其感兴趣。他在荷兰学习造船实践，在英国则学习其基本原则。他还在铁匠铺、制绳、造纸、钟表等各种工场中学习；还学习数学、天文学等各种自然科学。与此同时，彼得大帝还派遣官员往意大利等地参观，延请技师、工匠。在见识了英国的舰队、荷兰的船坞之后，彼得大帝前往维也纳考察德意志陆军。这次旅行，除了学习多种多样的技艺，彼得大帝还将一些人带回了俄罗斯：“3位军舰舰长，25位商船船长，40名海军军官，30名领航员，30名外科医生，250名炮手，及超过300名技师。”他还从英国聘请了地理学家以及一些数学家前往俄国，将近代算术引进俄罗斯。^④终其一生，彼得大帝都热衷于将各种工匠、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商人引进他的国家。伏尔泰对彼得大帝第一次出访欧洲的描写，刻画了欧洲、特别是英荷两地工场贸易繁荣、航海技术发达、科技进步的景象。彼得大帝第二次出国考察时，他已掌握了北方战争的胜局。这一次，伏尔泰描述的重点是彼得在法国的经历。“彼得大帝在法国受到了他应有的待遇。”盛大、精致的仪式、奢华的盛宴、文明的宫廷礼仪，都让彼得大帝大开眼界，甚至让这个粗鲁的沙皇感到浪费

① Larry Wolff, “Voltaire’s Public and the Idea of Eastern Europe”, p.940.

②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418.

③ Larry Wolff, “Voltaire’s Public and the Idea of Eastern Europe”, p.941.

④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419-425.

时间和不自在。^①而他在参观法国国王的手工艺品、艺术场所、艺术品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惊、艳羨，向读者展示了法国艺术繁荣的“文明社会”的状况。

“沙皇努力使其臣民采用他去的那些国家的行为方式和习俗。”^②彼得大帝以欧洲西部国家为其心仪的典范，希望将俄国的一切，包括政府、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等统统都西方化。彼得大帝改革中最成功、最突出的应属军事改革。在陆军方面，瑞典人是他们战争艺术的老师，“他向查理十二学习如何战胜他”。^③海军则是向英国学习，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聘请英国教官、水手。在政府组织、财政方面，彼得大帝主要是向北欧国家学习，设立参议院和现代的分管各类工作的部门、委员会，在地方推行自治，摆脱无序状态。彼得大帝在旅行过程中注意收集材料，吸收了丹麦、瑞典、英国、德意志和法国的可适合于俄国的司法制度、法律条文，而且“大部分是从瑞典那里学来的”。^④回国后即编纂法典，整顿司法体系。在国家经济方面，他鼓励创办工场、建立矿产、开发西伯利亚、建设城市、鼓励贸易，并试图建立自己的商船队。这些都是向西欧的经济生活靠拢。在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创办数学、军事学校和科学院，采用“我们的书写方式”，建立印刷工场，引进戏剧；推行“我们的服饰样式”，剪掉贵族的胡子，让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交活动，改用西欧的公元历。这些也是在向欧洲西部国家看齐。特别重要的是，彼得的这些改革都有大批从“欧洲”引进的人才相助。^⑤

伏尔泰一再强调的正是彼得大帝使俄国“文明化”的事业。“地球上曾发生过多次数惊心动魄的革命，但没有哪一场革命使人类精神得到如此满足，为人类精神增添如许荣誉。我们看到过许多征服者和蹂躏劫掠行为，但是只有一个人，在 20 年中，改变了地球上幅员最广阔的帝国的风尚、法律和精神，使用各种办法来改造沙漠，这便是令人敬佩之事。”^⑥伏尔泰笔下的彼得

①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Seconde partie, p.533.

②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430.

③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Seconde partie, p.598.

④ Ibid, p.572.

⑤ Voltaire, *La Russie sous Pierre le Grand*, Première partie, pp.430-431.

⑥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序言，第60页。

改革使得一个文化的“沙漠”成为欧洲的文明国家之一，而彼得改革所学习、所模仿的是“我们的欧洲”。这就向读者描绘了“欧洲”的文明图景，即工商业繁荣、教育文艺辉煌、科学技术先进、司法法律完善、社会管理有序、礼仪习俗文明；总之，欧洲是更加进步的、文明的。

四、结论

伏尔泰在其《查理十二史》和《俄国史》上、下卷中，描绘了权威的启蒙运动模式的俄国。将其刻画为一个刚刚挣脱野蛮、落后、混乱的国家，通过学习“我们”的科学、技术、艺术、法律、习俗等，在“文明化”和“欧洲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参与欧洲事务、改变欧洲力量格局的国家，为1767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奠定了基础。伏尔泰塑造的落后、野蛮，但又越来越深地影响欧洲事务的俄国形象，以及俄国镜像中繁荣先进、文明开化的“欧洲”观念，随着其广泛的阅读受众而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之中，构成了欧洲的“元叙事”，为后世欧洲的优越感、进步观念、欧洲中心观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源泉。1991年8月，当戈尔巴乔夫短暂恢复权力时，《纽约时报》头版宣布，俄罗斯人为“将其国家文明化的艰巨任务”准备好了。^①伏尔泰视俄国处于文明边缘的观念影响如此深刻，“不论是在十八世纪还是在二十世纪，俄罗斯都被视为刚刚开始文明化。这可能是对伏尔泰《俄国史》的无意识引用，这个引用鲜明地显示出古老公式的影响力。”^②

伏尔泰俄国史著作的核心是关于彼得大帝及其改革。他将彼得刻画为一个服务于国家利益、增进人民福祉、推动文明和进步的启蒙开明专制君主，将他视为欧洲君主的榜样，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启蒙之梦”。伏尔泰颂扬彼得大帝将俄国从野蛮、粗鄙之中拯救出来，给了北方一张“新面孔”，成为“欧洲”的一员，尽管是较低级、不发达的一员。这实际上提供了一条成为

① Bill Keller, “After the Coup: Old Guard’s Last Gasp; Communism as a Political Force is Dead, and the Reformers Gain Strong Legitimacy”, *New York Times*, 22 Aug., 1991, Section A, p.1, Column.1.

② Larry Wolff, *Inventing Eastern Europe*, p.371.

“欧洲”大家庭一员的途径，即向欧洲学习。而这在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欧洲”自视为“老师”的特权。“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个学生、学徒，或者是一个成功的学徒（启蒙运动的主流观念）；或者是一个被误导的学生（启蒙运动的其他观念）；或者是一个应该学习却拒绝学习的侥幸成功者（十九世纪的主流观念）；或者是一个旷课生（二十世纪的观念）；或者是一个有天赋却顽固的学生（目前的观念）。”^①

通过学习“欧洲”而具备“欧洲性”，成为欧洲国家，自然就意味着俄国与伏尔泰笔下的“我们”相似性更多，相异性更少。在圣彼得堡，狄德罗在他的冥想中，称赞俄国的文明化工程，“在语言上、在习俗上，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比俄国更快地法国化”。^②卢梭则批判彼得大帝的“欧洲化”计划：“在需要他把他的人民培养成俄国人的时候，他却想先把他们培养成德国人或英国人”。^③无论到过（狄德罗）还是没到过（卢梭）俄国，无论对彼得改革持称颂还是批判态度，俄国试图成为欧洲一部分的改革，都意味着放弃俄国特征和身份，“结果很可能就是它自己被欧洲所降伏。”^④对于向来对俄罗斯（苏联）深怀戒心的欧洲来说，俄罗斯成功地学习“我们”，越变得像“我们”，就越不是一个威胁。而这个学习过程中断的潜在可能性，则是一种威胁。可能也因此，欧洲（欧盟）持续向俄罗斯施压，要求其继续学习“欧洲”，以变得更像自己。

然而，伏尔泰作品中欧洲化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幻想。叶卡捷琳娜二世从来都无法与那些自封的老师们融洽相处。1774年，她在一封写给伏尔泰的信中，愤怒地嘲弄重农学派成员勒梅尔西埃·德·拉里维埃：“六年前，他认为我们用四肢爬行，因此非常客气地不辞劳苦地从马

① Iver B. Neumann, “Russia as Europe’s Other”, abstract, *EUI working paper*, no. 96/34,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Robert Schuman Centre, 1996. http://www.eui.eu/RSCAS/WP-Texts/96_34.pdf

② Diderot, “Entretiens avec Catherine II”, *Oeuvres politiques*, édité par Paul Vernière, Paris: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1963, p.267.

③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51页。

④ 同上。

提尼克岛来到这里，教我们如何用后肢站立。”^①狄德罗对其驻留圣彼得堡期间的真实经历一直保持沉默，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的法律改革建议也被禁止在俄国传播。实际上，俄国很长时间以来就自视为第三罗马。这种心理基础决定了许多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都坚持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大国，坚持它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平等地位，而不能适应、接受暗含着不平等地位的“学徒”身份。因此，一方面是欧洲要求俄罗斯继续向自己学习，变得更像自己，一方面是俄罗斯拒绝“学徒”的地位，张力就由此产生在欧俄关系之中。

【 Abstract 】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Russia, in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Europe”. Among the enlightenment thinkers, Voltaire constructed a relatively authoritative Enlightenment model of Russia, portraying it as a country making great achievements in “civilizing” through learning from “Europ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savagery and backwardness. In addition, a prosperous, advanced and civilized “Europe” image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is Russian mirror. The Russian image, created by Voltaire, ha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identity of Europe and Europe-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ubsequent several centuries. The unequal status of Russia as an “apprentice” in the presupposition, dominating European discourse regarding Russia in several centuries, has still been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ensions of Europe-Russia relations so far.

【 Key Words 】 Europe-Russia Relations, Russia’s Images, Voltaire’s Works on Russian History,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 Аннотация 】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евым периодом постро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а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Россия

^① W.F. Reddaway (ed.), *Document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Voltaire and the Instruction of 1767*,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first published in 1931), p.203.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35OZl_99gM0C&pg=PR3&hl=zh-CN&source=gbs_selected_pages&cad=3#v=onepage&q&f=false (2013年10月30日最后访问)

оказывает важ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Европа». Среди мыслителей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Вольтер создал наиболее авторитетную концепцию России в модели движения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зобразив её страной, путём учения у «Европы» избавившейся от варварства, отсталости и добившейся больши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в превращении в более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ую» стран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образ процветающей, передовой и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й «Европы» также стал находить отра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еркал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Созданный Вольтером имидж России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отен лет оказывал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европейскую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и отношения Европы и России. Нерав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России как «подмастерья» Европы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еков занимало доминирующие позиции в дискурсе Европы о России и по-прежнему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основ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приводящих к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Россией, образ России, труды Вольтера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 军事专家及其影响*

张建华**

【内容提要】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事物资的援助，为北越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然而，由于冷战的特殊背景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政府长期对于这段历史秘而不宣。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政府揭开了这段秘辛并公布了相关档案文献。本文探讨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战争中的活动和作用，并关注他们身上所反映和塑造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象——“苏联形象”。

【关键词】越南战争 苏联军事专家 苏联形象 苏越关系 中越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092-(47)

越南战争（1961-1975）是冷战背景下最大的一场局部热战，对于国际局势，尤其是美苏关系和中苏关系，以及美苏各自的全球战略影响巨大。越南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当然成员，苏联自然不能漠视身陷战争之中的越南的命运。但由于复杂的冷战环境并处于苏联全球战略的考虑，苏联除了在外交和政治上公开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声援外，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则采取了秘密和低调的方式。1955-1987年一直担任北越总理和统一后的越南总理的范文同（Phạm Văn Đồng）曾经说过：“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喜悦和热情，我们始终记得苏联经常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胜利来自苏联的奉献。它的象征是越南坦克手驾驶着苏制T-54坦克，在1975年4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中可能的疏漏由作者负责。

** 张建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月 30 日第一个开进西贡的总统府；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乘着高尔基汽车制造厂制造的卡车向西贡进军”。^①他的讲话肯定了越南战争期间苏联给予越南的经济援助。但是，苏联军人是否直接参加了越南战争，或者以何种方式参加越南战争，则始终是一个谜。由于苏联严密封锁相关档案文献，使其长期隐没于历史背后。^②因此，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米诺夫上校（И.Я.Куминов）强调：“直到今天，在俄国和外国历史著作中，关于苏联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和军事技术援助仍然是一个‘空白

① Цветов П. Ю., Чаплин Б. Н. В одержанной победе велик вклад СССР// Правда. Ежедневная газета. М.: КПРФ, 8-11 сентября 2006. №98.

② 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仅见张秋平：《苏联对越南战争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庄斌、李桂峰：“限制与脱身：赫鲁晓夫时期越南政策论析”，《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 年第 9 期；景晓强：“越南战争中的美苏互动（1964-1968）”，《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上述研究多使用中文文献或少量英文文献，极其缺少俄文档案文献的支持。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基本未涉及苏联军事援助越南之事。英语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拉菲伯的《美国，俄国与冷战 1945-2006》（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McGraw-Hill Humanities. 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牛军、翟韬、张静翻译）中虽谈及越南战争，但主要涉及的是美苏双方在越南问题上的外交博弈，对苏联援助越南之事基本未涉及。美国空军大学（Air University）是研究苏联与越南战争的一个学术重镇，相关研究有 Boyd, Robert S, Spetsnaz: Soviet Innovation in Special Forces, *Air University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86, Vol. XXXVIII, №.71; Drenkowski, Dana, Grau, Lester W, “Patterns and Predictability: The Soviet Evaluation of Operation Linebacker II”,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7, Vol. XX, №. 4. 俄罗斯学界相关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俄国学者甘杜克（Илья Валерьевич Гайдук/Илья Валерьевич Gaiduk 1961-2011），他利用苏联最新解密档案写出两部关于苏联与越南战争的英文著作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Dee, 1996. 他的研究成果具有极高价值，为国际史学界推崇。1999 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主题为“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年代的俄国与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 наш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Вьетнамом в годы отражения вьетнам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1964-1973гг)）大型学术研讨会，内容涉及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苏联防空系统在越南、气候条件对苏联援助的影响等，随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2005 年出版了由“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主席卡列斯尼科（Н.Н.Колесник）主编的文集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Экзамен, 2005. 内容主要是参加越战的苏联老兵和苏联军事专家的回忆文章。“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参加越战的退伍军人组织还设有官方网页 <http://www.nhat-nam.ru/vietnamwar/>，内有参加越战老兵提供的回忆录、照片以及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创作的歌曲和诗歌等。

点’。”^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苏联《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派出的著名记者伊里英斯基(Михаил Ильинский) 曾经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我曾经作为《消息报》的记者被派到战火横飞的东南亚小国。在那里工作的日日夜夜里,我用我的笔记录下了这个丛林小国发生的一切,但是鉴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并不是我所有的文章都能见报的,其中大多数只能深藏于我心中。如今,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深藏在我心中的那些久远的秘密都可以公之于众了。”^②

1989 年 4 月 13 日出版的苏军机关报《红星报》(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发表题为《正是我们保卫着越南》(И мы защищали Вьетнам) 的文章。文章作者达库恰耶夫少将(А.И. Докучаев) 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这段历史。2004 年 11 月 2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В.В. Путин)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向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Trần Đức Lương) 转交了苏联军人参加越南战争的有关材料,俄罗斯官方这才正式揭开了这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苏越关系秘史。

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一万余名苏联军事专家和军人赴越参加了抗击美国的军事行动^③。苏联的军事物资和人员援助对增强北越的综合军事实力,尤其是北越的防空能力以及北越取得战争的胜利并统一越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苏越之间的战时合作,扩大了两党两国

① Хюпенен А.И.,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ды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4-1973 гг.). Москва, 2000. С.28.

② Михаил Ильинский. Пилоты в пижамах в ханойском плен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07.2008.

③ 关于苏联在越南军事专家和作战人员的人数缺乏较准确数字,俄罗斯官方亦未提供数字。1999 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美国入侵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苏越军事和经济合作”研讨会上库米诺夫提供的数字表明,1965 年 7 月到 1974 年 12 月,苏联向越南派出军事人员:军官计 6359 人,士兵计 4500 人。参见 Куминов И. Я.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омощь Вьетнаму в годы войны//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 РФ;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за выпуск Н. Н. Колесник.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ды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4-1973 гг.)». Москва, 2000. С.39-45.

关系的基础，离间了越南与中国的传统党际和国家关系，使越南成为苏联势力在 20 世纪 70 年代南下的“第一桥头堡”。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苏联军事专家不仅向越南社会展现了不同的人文体貌、文化和生活习俗，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国家形象，构成了立体的“苏联形象”，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越战期间和战后越南社会的政治选择，促进了苏越关系的发展。

一、越战初期：苏联的“旁观”与谨慎介入

在越南战争问题上，苏联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和态度。越战初期（1961-1964 年），苏联为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在越南问题上采取了“不介入”的政策。1964 年底至 1965 年夏，苏联推行了“有限介入”政策。1965-1968 年，苏联积极介入越南战争，一方面加大了对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手段，推动美越走向谈判。1968-1973 年，随着中美关系的突破性发展，苏联感受到了来自中美两个方面的压力，它更加积极地介入越南战争及其善后事务，最终促成美越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结束了这场持续了 13 年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 (Ho Chí Minh) 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向法国宣布独立，于 1945 年 9 月 2 日在河内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在此之前的 1949 年 4 月 27 日，流亡中的前越南皇帝保大 (Bảo Đại) 在法国的支持下在西贡建立了越南临时政府^①（南越）并就任国家元首。南越得到法国、美国、英国和台湾当局的支持，北越则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按照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规定，南北越暂时以北纬 17 度线划界，统一国家的选举定于 1956 年 7 月举行，但是这场选举却没有举行。最后，美国和南北越都没有签署协议中的选举条款，南北分治并采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成为事实。

^① 1955 年 10 月 26 日，吴廷艳（也写作吴廷琰，Ngo Đình Diem）组织了公民投票，结果有 98% 的人支持废除保大的王位（其结果的准确性受到质疑），于是废除保大的王位，成立越南共和国。

1965年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批准了“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由美国空军第2航空师（即后来的美国第七航空军）联合美国海军和南越空军，于1965年3月2日至1968年11月1日北越进行轰炸行动。1965年3月8日，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岘港登陆，越南战争正式爆发。

1965年3月至1968年11月间，美国空军共出动153,784架次的飞机轰炸北越，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出动了152,399架次。^①1967年12月31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在“雷鸣行动”中共投下864,000吨炸弹，而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才投下653,000吨炸弹，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投下的炸弹也只有503,000吨。^②

由于美国担心刺激中国和苏联而引发与这两国的正面冲突，因此对于轰炸目标的选择与交战规则有非常多的限制。对北越的所有轰炸行动与目标都由华盛顿进行严密控制，每天轰炸目标的选择由国防部和白宫来规划。在这种束手束脚的指挥下，“滚雷行动”几乎无法正常发挥其打击力。北越的工厂大多已地下化，剩下的目标因有中苏两国人员在附近而安全无虞；同时，由于苏联与中国的船只或运输部队的掩护，使北越能够持续和顺利地接收大量的军事物资。因此，美国学者丹尼斯（M.Dennis）评价“滚雷行动”说，“这次行动是冷战时期进行的最激烈的空中/地面战斗，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轰炸之后，美国海空军参与的最为艰难的战斗。由于北越获得盟国的援助，拥有精良的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使得美国的空中轰炸与地面攻击皆十分困难。”^③美国空军史学家蒂尔福德（Earl Tilford）也认为：“被挑选的任务目标与实际效果之间有很大差距，因为执行任务的飞机组之间协调不佳，而且轰炸的目标也是随意挑选的，有时挑选得甚至不合乎逻辑。如果根据任何合理的目标挑选方法，北越的机场都应该是优先进行轰炸的对象，然而华盛顿拒绝的理由则是担心误炸了苏联或者中国的顾问而越了雷

① Wayne Thompson, *To Hanoi and Back*,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p.303.

② Berger, Carl, *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1961-1973. : an illustrated accou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77, p.366.

③ Dennis M, *Drew Rolling Thunder 1965: Anatomy of a Failure (CADRE Papers)*,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6.

池。”^①

二战后，苏联对越南的政策也是矛盾和复杂的。一方面，战后初期，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仍试图谋求与美、英、法等大国合作，力图推迟对抗和冷战局面的到来；另一方面，战后的苏联自身满目疮痍，没有足够的力量帮助相距遥远的越南；再一方面，此时苏联还没有制定推进全球世界革命的战略。另一重要原因是，根据斯大林和苏共的考虑，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工”，中共应是越南的主要支持者和援助者。1950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同时来访的毛泽东和胡志明说：“越南战争、越南革命，苏联是可以支援的，但具体的和切实的还是要靠中国来管。”1962年，毛泽东在会见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Võ Nguyên Giáp)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要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越南战争爆发前后，中国政府积极地给予北越大量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支援。^②

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执政后热衷于搞苏美对话与缓和，极力避免在有争议的地区与美国发生面对面的冲突。他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20大上对苏联以往的国际战略作了重要修改，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三和一少”路线。1955-1965年，苏联向北越提供的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总共仅3.2亿卢布，而此前仅在1955年苏联向北越提供的无偿贷款就有4亿卢布。胡志明和北越政府曾向

① Wayne Thompson, *To Hanoi and Back*,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2002, p.80.

② 中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中国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自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中国于1965年春决定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抢修并保障铁路运输，建设重要公路、机场、以及红河三角洲及附近海岛的抗登陆紧急战备工程等。此举使得北越军队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对南方作战。从1965年到1970年，累计有32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被派往北越，高峰时的1967年有17万人。文革中也有数量不详的年轻人自愿越境前往抗美最前线参加战斗。中国援越部队及援越工程技术人员共有1433人在越牺牲(阵亡或病逝、意外事故等)、4200余人负伤。除了陆军炮兵第63师第609团的团长程玉山、团政委李万安、团参谋长王锡森团三人，作为在越牺牲者中职位最高的团职干部，遗体运回中国国内安葬外，其余1,400余名牺牲者安葬在越南北部的57座烈士陵园(现已合并为40座)中。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实地调查后编辑的资料《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记载，安葬在上述越南烈士陵园的中国籍烈士有1446位；其中，抗法战争时期中国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6名，中国驻越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2名，访越艺术团人员8名。

苏联提出军事武器援助的请求，苏联只给了 3,000 支战时苏联缴获的德国枪支，胡志明气愤地说：“把它拉到博物馆去！”^①

而且，在苏联看来，越南实行南北分治不仅有利于苏联与欧美大国外交关系的调整，更有利于战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即通过援助和发展北越经济刺激苏联国内经济发展。因此，在 1957 年，赫鲁晓夫曾提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和越南共和国（南越）作为两个“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②1964 年 7 月 31 日“北部湾事件”发生后，苏联仅在 8 月 3 日的《真理报》（Правда）上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执政以后，中苏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两党两国由同盟转向对立，苏联的国际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加紧了向东南亚和印度支那的渗透，以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之势。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越南局势愈加紧张。1964 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情报局向越南河内派出情报人员。最初向莫斯科汇报美军轰炸情况及相关评估的是伊万诺夫（Ефим Иванов），他精通越南语，是最早被派往越南的情报工作人员之一，由于当时苏联还未在驻北越大使馆内设立武官及相关机构，伊万诺夫最初的掩护身份是苏联大使馆的三等秘书。1967 年苏联在驻越使馆内正式设立武官办公室，别洛夫上校（А.М.Белов）为首任驻河内的苏联大使馆武官。武官处除了收集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的技术、装备和军事行动情报外，还负责在越苏联军事专家、对越军事援助等的管理工作。

1965 年 2 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北越领导人讨论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提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宣称：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同时期，河内关键性的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 1 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965 年 6 月，美国情报部门

① 张会军、赵里：《三大经典反侵略战争回眸》，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 年，第 302 页。

② 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 64 页。

首次发现北越军队使用苏联武器装备。9月，美国发现苏联提供给北越的不仅有地对空导弹设施，还有一些高级雷达探测系统，以及米格-17战斗机和伊尔-28轻型轰炸机。^①1965年4月3日，在美国对越南实行“滚雷行动”第31天后，美国飞机遭到了米格-15的攻击，这是北越空军首次亮相。米格-15、米格-17和米格-21是北越空军主要使用的战机，它的整机、技术和教练都来自苏联。北越空军最初只有米格-15和米格-17共53架。^②到1966年，北越又得到了先进的米格-21，其性能已与美军战机接近。到1967年，北越空军已经拥有100架用于执行截击任务的飞机，其中大多数的基地都位于中国境内，美军无法对那里发起攻击。^③

1965年3月23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红场庆祝苏联宇航员归来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般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感情。”^④他指的是，莫斯科防空区的战士给领导写信，表达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愤慨和去前线援助越南的要求：“将军同志：莫斯科防空区的战士向您提出请求，我们每天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听到看到美国侵略越南的罪行……我们请求派我们去援助英雄的越南人民。”^⑤

1965年4月17日的《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声明：“如果美国强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胜利成果而战斗的愿

① Ilya Valeryevich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 Dee, 1996, p.50.

② John Morocco, *Thunder from Above*, Boston Publishing Company.1984, p.102.

③ Ibid, p.148.

④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卷，第156-157页。

⑤ Галенко В. Г., Старовойнов К., Юрченко В. М., Иванов Г. Ф., Авдулов Г. Г., Чоговадзе В. Д. Письмо в полит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йск ПВО СССР// Героические будни. Войска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ой обороны стран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68. С.402-403.

望。”^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和妇女会议上，支持和援助越南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并且通过了一系列决议。

1967年9月24日苏越发表会谈公报，表示苏联将“给予越南以全面的协助，帮助它加强防御能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越南的请求，苏联在1968年将向越南提供飞机、地对空导弹、大炮、枪支、弹药以及其他军用物资，还有成套设备、交通工具、石油产品、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和其他必需物资”。而据西方估计，1965年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5.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到1968年已达10亿美元。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北越军队装备的基本上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美国著名越南问题专家戴维·谢布隆（David Schoenbrun）在1968年出版的《越南：我们怎样进去，又是如何脱身》（Vietnam :How We Got In ,How to Get Out）一书中点明：“大量的卡车、防空大炮、导弹和飞机，都是苏联生产的。”^②引用这一资料的俄罗斯学者格拉祖诺夫（Е.П.Глазунов）^③也提到：“在1964年6月，在共同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军事专家已经首次参加与美国飞机的战斗。然而，在苏联报刊上看不到一点报道，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空系统是用苏联军事技术建造的。”^④

但是此时的苏联仍然避免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更不能明显表现出给予北越以军事、技术和物资援助。从苏联海运部长卡巴耶夫（В. Кабаев）1968年7月11日写给苏共中央关于向越南运送物资的困难的报告中即可见一斑。报告称：“……海运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20-22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前往越南的运输活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卷，第158页。

②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ды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4-1973 гг.)». Москва, 2000. С.15-16.

③ 格拉祖诺夫也是俄罗斯“继续教育医学科学院”（МАПО）院士和“越南友谊协会”（Общество дружбы с Вьетнамом）主席，1974-1975年曾在越南河内工作。

④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С.15.

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保障。”^①报告中提到，“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 10-15 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只越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 月 7 日，‘苏维埃茨克’号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 350 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 100 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茨克’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 5 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了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②报告指出，“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防空岸炮连旁，显然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并且，“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这份绝密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海自由（通航）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③

由此可见，尽管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已正式爆发，但美苏双方在处理该问题时还是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证明了这一点：1965 年 4 月 4 日，苏军飞行员驾驶米格-17 歼击机在越南上空击落两架美军轰炸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30 卷，第 153 页。

② 同上，第 153-154 页。

③ 同上，第 154-155 页。

机 (F-105)。^①但是苏联对此消息秘而不宣。但北越在当天公开报道越南人民军飞行员冯贵 (Фам Гиаем)、李明洪 (Ле Минь Хуаном)、常辉洪 (Чан Нгуен Намом) 和常汉 (Чан Ханем)^②击落了两架美军轰炸机 (F-105)。但 4 位北越飞行员中有 3 位在战斗中牺牲, 只有常汉活着, 击落美军飞机的真实性也只有他个人的证明, 他因此获得了“越南英雄”称号。^③而美国方面的信息也说明: 1964 年 4 月 4 日, 美军损失 3 架 F-105 飞机, 其中 2 架是被北越飞行员在空中打下, 1 架是被地面防空导弹击中。^④根据苏越协议, 苏联军事专家只能从事幕后工作, 即培训越南飞行员和建立防空导弹系统, 苏军直接参战是被禁止的。^⑤因此, 直到 46 年后的 2010 年, 俄罗斯国防部才正式公开这个秘密, 宣布越南战争中首次击落美军飞机的不是北越飞行员, 而是苏联援助越南的军事专家。^⑥

时任美国密歇根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中心主任齐默尔曼 (U. Zimmerman) 通过特殊渠道获得了苏联的有关文件, 他分析这些文件是发给苏军正规单位的, 据此判断苏联将直接干预越南战争, 并可能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因此,

①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4.05.1965 // Календарь памятных да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люди, события, факты/ Под общ. редакцией д. и. н., профессора,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а В. А. Золотарёва. 2-е издание, 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дополненное. М.: Логос, 2001. С. 156; Календарь памятных дат//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ый журнал/ Гл. ред. В. С. Ещенко. М.: Науч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фирма «Церера», 2005. №4. С.187.

② 冯贵、李明洪、常辉洪和常汉的名字均是笔者借助俄文文献的音译, 暂未找到对应的越南文拼音。

③ Toperczer, Istvan, *Silver Swallows // MiG-17 and MiG-19 Units of the Vietnam War*,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pp.30-31. (Combat Aircraft). *Hoang Van Thai Victory in Vietnam: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Army of Vietnam, 1954-1975*,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p.138, 166, 175.

④ *Obson, Chris. Chapter Five: 1968, Vietnam air losses: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Navy and Marine Corps fixed-wing aircraft losses in Southeast Asia 1961-1973*, Saint Louis: Midland Publishing, 2001, p.143; *Davies, Peter, War in Laos // F-105 Thunderchief Units of the Vietnam War*,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Limited, 2010, pp.24-25, 30.

⑤ Заборский В. Ни на чём не основанный вывод//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Ежедневное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е. М.: ЗАО «Редак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газеты“», 7 октября 2005. №. 38 (447). С.8.

⑥ Бочарова А.Л. Апрель в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Ежемесячное 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ое изда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Ф, 2010. № 4.

在越南战争中，对苏联和中国直接参战的恐惧一直伴随着美国政府。^①

二、积极介入：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

1965年7月6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第525-200号决议（№.525-200），宣布建立苏联军事专家团（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СВС）。军事专家团成员，根据个人自愿原则，在苏联现役军官、指挥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士兵和警察中挑选。1966年7月4日，北越总理范文同与苏联驻北越大使谢尔巴托夫（И. С.Щербатов）在河内会晤。范文同建议在备忘录中写入“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件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②范文同在解释这一点建议时表示：“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突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意义”。^③在已经解密的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外交部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向苏共中央提供的背景资料》的档案中记载：“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基本观点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遣志愿人员。”^④

苏联对越军事援助由来已久。美国“外国军事研究处”（The Foreign Military Studies Office- FMSO）主任格劳（Lester W. Grau）认为，苏联对越南的军事援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当时斯大林应胡志明反对法国殖民者的请求，于1946年10月26日至1947年1月13日派出了苏联专家

① Record, Jeffrey, Terrill, W. Andrew, “Comparisons: Then and Now. Relative U.S. Military Power // Iraq and Vietnam: Differences, Similarities, and Insights”, U.S. Army War College. - Report. - Carlisle Barracks, Pennsylvani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2004, p.5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0卷，第157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59页。

团。^①关于苏联军人参加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详细资料尚未见到，但根据苏联海军中将（вице-адмирал）胡尔斯（И. К. Хурс）的回忆，在 1954 年，他还是二等大尉，曾与其他几位苏联水兵到越南协助组织海军并帮助平民。当时北越没有自己的贸易港口，苏联水兵租用载重船只从南方向北方运送食品，而实际上船上装载的是武器弹药。胡尔斯回忆：45 毫米的迫击炮安装在大象的背上，就成了一个移动的武器装置^②。1957 年至 1961 年，苏联边防军军官卡拉楚帕（Н. Ф. Карацупа）被派到越南从事训练当地边境部队的工作。为表彰他富有成效的工作和贡献，越南边防部队设立了以卡拉楚帕命名的荣誉奖章^③。

苏联国防部向越南派出军事专家始于 1960 年初。^④根据北越政府的请求，苏联空军司令斯科里普科元帅（Н.С. Скрипко）派苏联飞行员小组到越南帮助培训北越空军和实施空中运输。^⑤从 1960 年初开始，在越南和老挝境内就出现了里-2（Ли-2）和伊尔-14（Ил-14）运输机，执行运送士兵和军事物资的任务。^⑥1961 年，苏联第 319 红旗直升机独立团在越南执行军事任务。1964 年，第 339 空军运输团向越南运送了大量军事物资。^⑦1961-1964 年，第 11 防空军的飞行员在越南工作，1960-1963 年，苏联空军在老挝执行任务超过 1,900 个作战架次，飞行时间超过 4,270 小时，运送 7,460 人及 1,000

① Drenkowski, Dana ; Grau, Lester W, "Patterns and Predictability: The Soviet Evaluation of Operation Linebacker II",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7, Vol.XX, №.4, pp.1-3, 33-38.

② Жирнов Е. Вьетнам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нас просто замучил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Власть. 7 марта 2000. №.9. С.52-55.

③ Мусалов А. Легенды спецназа: Пятьдесят фактов о Карацупе// Братишка. 2011. № .5.

④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赴越南军事专家总领导：1965-1966 年，那扎林上校（Н. В.Назаркин）；1966 年，格列恰宁上校（В. П. Гречанин）；1966-1967 年，科罗基里什科夫上校（Б. И. Колотильщиков）；1967-1968，卡帕尔金上校（С. В. Капалкин）；1968，苏拉诺夫上校（Б. С. Суранов）；1969-1970，谢尔盖耶夫上校（Г. И. Сергеев）；1970-1971，日隆金上校（В. Г. Жиронкин）。

⑤ Сомов С.А. По воздушным трассам дружбы// Это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слово «Льенсо». Сборни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МО РФ, 2003.

⑥ Бедретдинов И.А. Штурмовик ОКБ П. О. Сухого Су-25.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Р-Мажор, В & Со Publishing Group, 1994. С.141-142.

⑦ Бысенков И. Мужество. Он учил летать вертолёты// Братишка. 2005. № 7.

吨货物。^①1961年2月17日，苏军专家斯洛明上尉（А. Н. Соломин）在越南阵亡，他是苏军在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第一人。^②

根据苏越协议，1965年4月16日，北越接收了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约100人，领导人是苏军上校德杰扎（А. М. Дзыза），任职到1965年9月。这个军事专家团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安装2个防空导弹综合系统。同一日，来自巴库边区的导弹防空军的200名士兵和技术人员乘火车经过中国领土来到越南。^③最初，为避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注意，苏联军事专家团的飞行路线绕过中国，即从苏联飞到缅甸/万象辗转到河内。而美国人也使用这条空中航线，其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苏联军事专家拉古金上校（А. А. Логокин），以蔗糖专家的身份乘飞机从缅甸飞往万象，遇到一个准备飞往西贡的美军飞行员。美军飞行员用极蹩脚的俄语与他交谈，并且与他相约在越南见面。^④

许多苏联军事专家和飞行员有着相当的实战经验，并且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军飞机战斗过。越南人民军防空司令部顾问、苏军少将苏佳金（Н. В. Сутягин），在朝鲜战争期间参加过第64歼击机航空兵团的作战行动。他曾击落22架美军飞机，包括15架F-86“佩刀”战斗机（F-86 Sabre），该飞机是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别洛夫少将（Г.А. Белов）于1965年9月至1967年10月派驻越南并担任了苏联军事专家团的领导工作。他回忆，最初苏联统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相应决策是随着美军进犯北越行动的升级而制定的。考虑到美军空降北越领土和开展地面部队进攻的可能性，因此授予了苏联军事专家团广泛

① Бедретдинов И. А. Штурмовик ОКБ П. О. Сухого Су-25. М.: Кучково поле, Р-Мажор, В & Со Publishing Group, 1994. С. 141-142. 211.

② Ярёмченко В. А., Почтарёв А. Н., Усиков А. В.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1961-1974 гг.) // Россия (СССР) в локальных войнах и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 Под ред. В. А. Золотарё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 РФ. М.: Триада-фарм, 2002. С.193-196.

③ Колесник Н.Н. Обучая, сражались и побеждали// ПВО Страны: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Сборник. К 70-летию отражения первого налёта фашист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на Москву. М.: Руспринт, 2011. С. 1-35.

④ Рощинский С. Двенадцать дней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часть I)//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газета. 27 ноября 2012. №. 222.

的职能，但防止空中对北越的打击是军事专家团的主要任务。^①第一批苏军顾问和文职专家，包括数百名战斗机飞行员，无线电、雷达、防空导弹系统工作人员被安置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位置——首都河内、红河上的重要桥梁和港口。^②

表 1 越南战争时期苏联军事专家团教导团领导名单

苏联军事专家团教导团 (Старшая Группа)			军事专家、防空战士专家团 教导团			越南空军军事专家团 教导团		
军衔/兵种	名字	年代	军衔/兵种	名字	年代	军衔/兵种	名字	年代
少将 炮兵	德杰扎 (А. М. Дзыза)	1965.4 – 65.9	少将 炮兵	德贞扎 (А. М. Дзыза)	1965.4 – 65.9	上校 空军	西莫夫 (С.А. Сомов)	1960–1961
少将 合成兵 种	别洛夫 (Г. А. Белов)	1965.9–67.10	少将 炮兵	基斯梁斯基 (В. С. Кислянский)	1965.9 – 67.10	少将 空军	西琴科 (В.П. Сизенко)	1966–1967
中将 空军	阿布拉莫夫 (В. Н. Абрамов)	1967.10 – 68.12	上校 炮兵	库里巴科夫 (Н. И. Кульбаков)	1967.10 – 68.9	少将 空军	安奇菲洛夫 (Е. Н. Анциферов)	1968–1969
中将 炮兵	斯多尔尼科夫 (Б. А. Стольников)	1968.10 – 70.12	上校 炮兵	斯图奇洛夫 (А. И. Стучилов)	1968.9 – 69.12	少将 空军	苏加金 (Н. В. Сутягин)	1970–1971
少将 合成兵 种	马克西缅科 (Н. К. Максименко)	1970.12 – 72.12	上校 炮兵	古杰 (В. А. Гуде)	1969.12 – 70.12	少将 空军	菲先科 (М. И. Фесенко)	1972
少将 炮兵	修宾涅 (А. И. Хюпенен)	1972.12 – 75.1	上校 炮兵	柯连金 (Ю. В. Коленкин)	1970.12 – 71.12			
			上校 炮兵	布扎诺夫 (А. И. Пузанов)	1971.12 – 72.12			
			上校 炮兵	巴宾科 (К. С. Бабенко)	1972.12			

资料来源：Группа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Вьетнам. <http://ru.wikipedia.org/wiki/>

① Белов Г.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е//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137-151.

② Мусалов А.Неизвестная война: Безумный сон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женера // Братишка. 2011. № 3. С.55-57.

苏联军事专家团最初接受的任务之一，是在最短时间内为越南人民军培训两个防空导弹团。于是，在河内附近建立了两个培训中心：一个中心由茨甘科夫上校(М. Н. Цыганков)领导，由莫斯科防空军区专家培训越南人民军第 236 导弹防空团。另一个中心由巴热诺夫将军(Н. В. Баженов)领导，由巴库防空军区专家培训越南人民军第 238 防空导弹团。奥尔忠尼启则高等防空导弹指挥学校(Орджоникидзе́вский высшей зенитный ракетный командный училищ ПВО)的 2-3 位军官和教员负责培训第 238 防空导弹团。根据扎依科上校(А. Б. Заика)的回忆，实际上，第 238 团还没有完成所有教程的学习就投入了战斗。1965 年 7 月，莫斯科防空军区的 100 人到位，到 1966 年初，苏联军事专家团成员已经达到 382 人。从 1965 年 4 月至 1967 年 5 月，为帮助越南人民军建立导弹防空力量，又派了 2,266 名苏联军事专家。^①

培训中心位于河内附近的丛林中，经过了精心伪装，典型的建筑是污垢地板和茅草屋顶的木棚子。苏联专家的工作是极为繁重的，每个专家要指导一个特定的部门，指导一个或两个科目。课程内容非常复杂和科学化，教学必须通过翻译来沟通。教学从早晨 4 点开始，到中午气温变得炎热难当，苏联军事专家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中心基地。^②

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Россия)的《航空时代》(Время Авиации)节目(2010 年 5 月 12 日)采访了曾参加培训北越空军王牌第 372 航空师(代号“九龙师”)的原苏联空军上校库兹涅佐夫(Виктор Кузнецов)，他透露了苏越关系史上的一段秘辛。

1975 年初，库兹涅佐夫(时为上尉)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被派往北越执行任务。当年 2 月，他随苏联专家团秘密来到河内，负责维护北越空军最先进的米格-21 歼击机(Мг-21)，当时北越只有第 372 航空师下辖之第 937 团(驻内排)和第 933 团(驻建安)装备该机。库兹涅佐夫回忆：“越

① Колесник Н. Н. Обучая, сражались и побеждали// ПВО Страны: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Сборник. К 70-летию отражения первого налёта фашист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на Москву. М.: Руспринт, 2011. С.1-35.

② Канаев В. Наш боевой расчёт//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201-207; Кучерова Л. На войне бывает и не такое...// Армия. 2011. №3. С.12-17.

南的生活很艰苦，而且越南人与我们有隔阂。当时我们住在内排基地的简易平房里，如果没有组织安排或北越外交官陪同，北越哨兵禁止我们离开基地半步。北越安全部门对苏联专家组特别‘关照’，所有与我们交往的越南人（包括翻译、服务人员、空军技师）都需要向安全官员汇报。实际上，我们只有在每个月一次向苏联驻河内大使馆作例行汇报时，才有机会和其他在越苏联专家交流。当然，公正地说，我们在大使馆里也要向克格勃官员汇报自己掌握的北越军事情报，特别是涉及北越与中国军事交往方面的情报。当时，北越空军还装备有中国生产的歼-6 和歼-5 歼击机，装备这些飞机的北越部队里有中国专家，内排基地也不例外。虽然苏联人有能力负担起歼-6 和歼-5 的运转，但北越国防部更愿意接受中国的帮助。为北越军队工作的中国专家受到比苏联专家高得多的优待。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北越空军中，毕业于中国院校的飞行员和工程师更有威信，军衔升迁方面也快得多。在内排基地里，我甚至发现一些北越军官公开展示自己持有的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①

1975 年 4 月，北越发起旨在彻底推翻南越伪政权的战役。4 月 22 日，库兹涅佐夫与其他 26 名苏联专家赶到六滨河畔的小镇梅堡，他们冒着南越空军轰炸的威胁，直接在野战机场维修受损的米格飞机。在之后的 8 天里，他们连续修复了 13 架次受损的米格-21 和中国的歼-6 飞机。4 月 30 日，南越首府西贡被解放。库兹涅佐夫等人从野战机场的大喇叭里听到河内电台的广播，看到在场的越南人欢声雷动。在场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胜利了！祖国统一了！”库兹涅佐夫与越南人拥抱在一起，庆祝这一难得的胜利。^②

克留奇科夫（Юрий Крючков）也是秘密援助北越的苏联军人中的一员。克留奇科夫曾经秘密参加过朝鲜战争，后来又参加了越南战争，而这两次战争反对的是同一个敌人——美国。克留奇科夫回忆：出发前往越南前，苏联政府多次告诉他们，参加越战是为了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和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特别强调他们此行完完全全是个人行为，与苏联政府和苏联军队无关。其他参加过越战的原苏联老兵也表示：“在派往越南前，事先警

①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http://www.airwar.ru/history/locwar/vietnam/comandir/comandir.html>

② Там же.

告我们，不能带照相机和一张苏联货币。”^①

最初，克留奇科夫在距离河内 45 公里处的简易机场“内排”^②，为越南培训米格-17 歼击机飞行员。克留奇科夫回忆说，那里的条件相当不错，营房设施完善，通风机、冰箱和照明设备、供水设备一应俱全。当时机场还驻有一个米格-21 歼击机分队。但是当美军开始大规模空袭后，上级决定将米格-17 歼击机转移到刚刚修建完成的丛林机场“开普”（Кэп），而这里的生活条件与内排机场有相当大的区别，没有住房，只能住在最为简陋的树皮和蒲草搭成的窝棚里。为了防备美军和南越发现这个新机场，机场的跑道白天都用沙石和草叶遮盖，到晚上才露出机场的真面目。克留奇科夫与越南飞行员的沟通全部靠翻译，有时根本听不懂翻译的解说，只能凭越南飞行员的语气和面部表情判断出了什么问题。训练时，越南人坚决反对苏联专家关掉飞机舷灯，他们认为北越还没有与南越正式开战，因此不必如此谨慎，反而会因视线不清楚，被自己人的防空炮火击落。

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克留奇科夫驾驶的米格-17 歼击机后舱发生爆炸，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克留奇科夫不得不跳伞逃生。克留奇科夫驾驶的战斗机为何爆炸？他始终没有搞清楚真正原因，有一种可能是被美军的空对空导弹击中。^③

克留奇科夫回忆说，在降落过程中，“首先看到树冠，然后是茂密的丛林”。^④在接近地面时，他不得不抱住脸，蜷起腿，以防划伤。克留奇科夫最后落在距地 40 米高的树枝上，他割断降落伞的绳子，终于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几乎与此同时，来自地面的防空炮打响了，美军和南越军队的 100 毫米高射炮射出的炮弹就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在他面前横飞。克留奇科夫说：“在河内，我看到过这种炮弹击落的美制F-4 战斗机，飞行员甚至没有时间跳伞，只能坐以待毙。”^⑤而当时苏联飞行员甚至连头盔也没有配备，克留奇科夫只好从伞包中取出应急氧气瓶罩在头上。当夜幕降临后，新的问题又产

① Дмитрий Литовкин. Медаль за необъявленную войну// Известие. 30 ноября 2004.

② “内排”机场现为越南北部最大的国际机场（Hanoi Noi Bai International Airport），国际代号：IATA: HAN, ICAO: VVNB。

③ Дмитрий Литовкин. Медаль за необъявленную войну// Известие. 30 ноября 2004.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生了。茫茫丛林，没有水源，而且毒蛇遍地。克留奇科夫想起越南人教给他的土办法，迅速把降落伞改装成仅有一个出口的小屋，小心翼翼地钻进去后再把出口死死扎紧，这样，即使是再小的毒蛇也钻不进去了。他在极度紧张和没有食物和饮水的情况下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筋疲力尽的克留奇科夫小心翼翼地走出丛林后，立即被当地的村民包围。克留奇科夫回忆：“越南人仇恨美国人，如果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被越南人抓到，在北越的警察发现他之前，就会被当地农民用棍棒或锄头打死。我们的一个同伴就这样被打死了。因为他从南方飞来，眼睛与欧洲人相似，只是皮肤颜色较深。而当地农民根本分辨不出美国人和苏联人。”^①这些村民有 150 余人，几乎全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手中没有武器，只有木棍和长梭镖。他们显然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更不可能将克留奇科夫与美国人区别开来。克留奇科夫立即拿出北越政府给他的证明文件，上面用越南文字写着“苏联人”是自己人，越南人要帮助他，向他提供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但这些村民显然不识字，大家仍然以敌视的态度对待克留奇科夫。好在人群中有一个上过学的 11 岁左右的小女孩，她看了证明文字后告诉大家，此人不是美国人，而是帮助越南人的苏联飞行员，克留奇科夫这才真正获救。克留奇科夫回忆道：“为什么他们没有立即打死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一定不像美国人。美国飞行员一般随身带着众多设备，如工作服，收音机，两支手枪。而我几乎身无分文，只穿着绿色的衬衣，没有武器，还光着脚穿着凉鞋。”^②后来，克留奇科夫因参加越南战争而获得了苏联政府颁发的“红星勋章”（орден Красного Знамени），越南政府也授予克留奇科夫“战斗奖章”（За войну）。苏联为获得美国配有电子设施、可以规避敌方防空雷达并且最大转场航程可达一万公里的F-111 战斗机的技术资料，在越南战争中采取了特殊的军事行动。1968 年 3 月 17 日，6 架F-111 战斗机抵达位于泰国的美军基地——塔克利机场。当天，北越和苏联谍报人员就知道了这一消息。苏联派出少将飞行员叶甫盖尼·安西菲洛夫、防空部队无线电兵司令格奥尔吉·吉契科将军在内的 43 名苏联军事专家前往越南，准备采取行动。4 月

① Дмитрий Литовкин. Медаль за необъявленную войну// Известие. 30 ноября 2004.

② Там же.

22 日，当F-111A进入北越领空后，苏联专家开通了无线电干扰使其与基地失去了联系，然后派出苏联空军包围美军的F-111 飞机，苏联飞行员安西菲洛夫命令F-111 飞行员在北越的内排机场降落，否则就将其击落。随后，苏联把迫降的F-111 分解，进行严密包装后运到越南的海防港，将其装上苏联轮船“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号。5 月 7 日晚上“阿历克谢·托尔斯泰”号秘密起航，直至苏联，该船一直有苏联战舰在公海上护航。抵达苏联后，F-111A战斗机被秘密停放在西伯利亚的一处机场，两名美国飞行员则被关在一个叫萨里沙干的军事小镇。

苏联军人和苏联专家在越南所做的工作，除了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之外，还直接参加了部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 1967 年 10 月 27 日美军飞行员约翰·西德尼·麦凯恩(John Sidney McCain)驾驶的F-4 轰炸机在河内上空被苏联军事专家特鲁舍奇金中校(Юрий Петрович Трушечкин)^①指挥击落并被俘虏的事件。麦凯恩是 2010 年呼声甚高并与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相抗衡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时任防空指挥官的特鲁舍奇金回忆：当时为了使战略桥梁避开美军的袭击，他和己方的其他军人交换了导弹部署阵地。当军人们离开后，才听到空袭警报声并看到正在靠近的两驾美军F-4 轰炸机。特鲁舍奇金说：“其中一架飞机绕过山包逃跑了，另一架则穿过了大桥。我们就朝它们开火。”^②麦凯恩在座机被击中后弹射出机舱，落入了河内西部的湖中，他立即被包围上来的北越士兵逮捕。指挥这群越南士兵的是在河内执行秘密情报工作的两名苏联军官——列格斯塔耶夫(Евгений Легостаев)和斯波尔特(Иван Шпорт)。麦凯恩与其他 800 余名美国军人一样，被秘密关押在河内的监狱里。1971 年 7 月，为纪念 1954 年越南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北越政府在河内举行盛大的游行，麦凯恩等美军战俘也身穿囚服走在战俘队伍中。1973 年 3 月，根据美国和越南签署的《巴黎和约》，越南政府在河内机场向美方移交了在押的 800 多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其中就包括在河内的监狱里度过了 6 年

① 特鲁舍奇金因在越南战争的英勇表现获得“红星奖章”，2009 年 1 月 16 日，他在彼得堡的养老院去世。

② Оксана Бугаева. Помню слова: «Джон Маккейн»// Взгляд. 16 января 2009.

牢狱生活的麦凯恩。麦凯恩后来因伤病以海军上校的军衔退役，从此开始步入政界。^①

2009年，特鲁舍奇金在接受《观点报》（Взгляд）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至今都不后悔，而且仍然满怀对麦凯恩的憎恨。“麦凯恩幸好没能当上总统。他憎恨俄罗斯人。我知道是我们的导弹击落了他的飞机。”^②

斯波尔特上校是此段历史插曲的另一个见证人，他如今已是俄军退役中将。他在当时被俘的麦凯恩身上获得了两个战利品，一个是美国军人随身带的用五种语言所写的求救信：“我是美国公民，我落难了，请帮助我。”另一个是麦凯恩所驾驶飞机的一块残片。后来，他将这块残片送给了20世纪60年代驻越南的苏联《消息报》记者伊里英斯基。伊里英斯基对此格外珍惜。因为在他看来，这块残片连接了苏联人与越南人，苏联人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它自身的象征意义也是多重和复杂的。他写道：“我手中把玩着一块美军战斗轰炸机的蒙皮残片，虽然已收藏了几十年，但是依然闪烁着光芒，这并非是因为金属本身，而是由于对那段岁月的记忆。如果不是在沉思往事的同时，时常把玩这块碎片，那它恐怕早已被空气腐蚀、被灰尘埋没了。这块碎片如同我信仰的十字架，被我如同圣物一样陈列在我的书架上，紧挨着我最心爱的一本书，这本书中记录着上世纪美国人在越南丛林中的历史。”“如今，当我通过电视看到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站在讲台上讲述他的施政纲领时，不能不让我想起这块我珍藏已久的飞机蒙皮碎片，而这块碎片就是由麦凯恩从遥远的美国带到了越南，机缘巧合之下又被别人送到了我的手中……”“那块麦凯恩的飞机蒙皮碎片正是伊凡上校送给我的礼物，而当年的那名美军飞行员俘虏，在我印象中那个穿着睡衣般囚服的飞行员，在河内的战俘营中度过了漫长的6年时间。多年后，这名飞行员成了美国国会议员，

① 据俄军方公布的资料，在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越南战争中，共有51名美国空军飞行员被引渡到了苏联。美俄负责调查战俘及两国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委员会主席尼古拉·别兹博罗多夫（Николай Безбородов）称，这些美国空军飞行员自从被引渡至前苏联后音信全无，至今下落不明。别兹博罗多夫说：“俄罗斯文件中的内容显示，这51名美国人是在38次不同的冲突中被捕的。”目前仅有7人的身份得到了确认。

② Оксана Бутаева. Помню слова: «Джон Маккейн».

现如今他又成了名满天下的美国总统最主要的竞选人之一。”^①

越南战争初期，北越与南越和美军空中力量的差距是巨大的。1964年8月，在南越和泰国等地的美国空军基地大约有680架作战和支援飞机，同时期北越只有约120架老式战斗机。^②在装备了苏联的新式战斗机以后，培训越南飞行员也是苏联军事专家团的重要使命。

苏联军事专家直接参战的更多的目的是为了临战培训越南飞行员和解决空战出现的突发问题。契卡洛夫空军学院（НИИ ВВС имени В. П. Чкалова）的首席飞行员、苏联英雄、空军上校卡特洛夫（В.С. Котлов）到越南培训越南飞行员使用“空对空”导弹。他与他的越南学生、越军上尉沙都（Шаару）^③驾驶米格-21UC（教练机）升空作战，沙都则作为主战坐第一机舱，卡特洛夫作为助手坐在第二机舱，他们驾驶战斗机混入美国F-4幽灵战斗机（F-4 Phantom）编队之中。两人直接用俄语联系，最终指挥沙都打下架F-4战斗机，这是越南飞行员驾驶米格-21打下的第一架美国F-4战斗机。卡特洛夫因此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河内荣誉公民证书”（Почётный гражданин Ханоя）。但是卡特洛夫本人、苏联政府和苏联军方并不因此而欢欣鼓舞，因为卡特洛夫违反了苏越之间有关苏联军事专家不能直接参战的规定。^④

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首次建立了富有成效的综合空中防御系统，处于战斗位置的依次是高炮团、防空火炮团、战斗机航空团（配备米格-17和米格-21歼击机）和无线电工程兵团。1965年7月，SA-75M防空导弹系统已部署在河内附近。第一次实战发生在1965年7月24日，战斗地点在河内东北50公里处。军事科学副博士、马利金上校（А.С. Мальгин）报告：该日，两个高炮营击退了美国飞机的攻击，用4发导弹同时击中F-4C轰炸机。阿隆上校（В. Арон）报告：这场胜利功劳记在越南人民军大尉阮文汉（Нгуен

① Михаил Ильинский. Пилоты в пижамах в ханойском плен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1 июня 2008.

② Противовоздушная оборона в ходе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1964–1973)//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В.К. Черткова. Смоленск: ВУ ВПВО ВС РФ, 2000.

③ 此人名译自俄文文献，暂未查到越南文原文。

④ Бысенков И. Советский лётчик-испытатель в небе Вьетнама (AVI)// Видео. М.: Ren TV, телепередача «Военная тайна». 26 ноября 2006. Об освоении вьетнамцами МиГ-21 и первых победах на нём. Проверено 31 января 2013.

Ван Хак) 和阮文梁 (Нгуен Ван Нян) ^①名下。但实际上, 应该归功于苏联中尉鲍里斯·马热耶夫(Борис Можаяев)和费多尔·伊里英(Федор Ильин)。因为越南军官最初无法克服按下导弹“发射”钮时的心理恐惧。^②为纪念这一重大胜利, 7月24日这一天被越南政府定为“越南人民军防空导弹部队日”。^③苏联《消息报》驻越南记者伊里英斯基回忆道:“1965年7月25日, 越南防空导弹部队用刚刚装备不久的苏联防空导弹成功地击落了3架美国战斗轰炸机。越来越多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一度悲观的越南防空部队, 同时越南的防空导弹系统也引起了美国的重视。美军立即改变了空袭战术, 采取低空轰炸, 同时以电子干扰相配合。美军机群编队分成5队各自为战, 第一队负责和北越的米格战机进行空中格斗, 以保护其他机群; 第二队负责压制越南防空火炮阵地; 第三队负责打击防空导弹阵地; 第四队负责打击预定重要目标; 第五队负责在整个机群完成任务返航时实施护航。分工明确, 配合得当的美军机群在后续作战中的战损率大大降低, 使得苏联的防空导弹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在美军实施协同战术的情况下, 越南防空导弹部队平均每发射10-14枚导弹才能击落一架美军飞机。”

记者伊里英斯基回忆道:“越南的苏制防空导弹作战受阻的情况立即被驻河内的苏联武官报告给了莫斯科。不久, 莫斯科派出导弹专家对北越装备的S-75M型导弹进行了调试, 此后又特别向北越提供了更加先进的S-125型防空导弹, 才最终提高了越南防空部队的作战效能。当时越南防空部队每发射3-4枚防空导弹就能击落一架美军飞机。在1972年12月的空袭中, 美军的损失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仅仅10天内就在河内上空被北越防空部队击落了80架飞机, 其中30架为B-52型战略轰炸机。就连当时号称不可能被击落的F-111战斗轰炸机, 在1972年前也在北越第17区域被击落了

① 这两人名译自俄文文献, 暂未查到越南文字。

② Арон В. ЗРК: Полвека «на часах»//Армия. 2002. №.1. С.30; Казаков Р.А. В боях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настоящи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своего дела (HTML).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олнечногорск: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2005). Проверено 20 февраля 2012.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из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15 марта 2013.

③ Мальгин А.С. Проверены боем: Почему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енитные ракет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столь популярны на мировом оружейном рынк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8 февраля 2003. № .7. С.5.

几架。当然这些情况都被美国军方严密封锁，就连后来调查失踪美军飞行员下落的中央情报局对此也毫不知情，这一点在我后来和中央情报局特工詹姆斯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在美军没有公布这些情报的情况下，詹姆斯是通过研读苏联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报道才得知一些有关情况的。虽然美国当局隐瞒了飞机被击落的事实，但是越南当局在战争期间会不定期地邀请我们去参观那些被击落的美军飞机。如果俘获了美国飞行员，还会让我们在通讯报道中提及飞行员的姓名以及飞行员的服役编号等重要信息，而更多不便公布的信息则被送交到了苏联情报人员手中。我笔下的报道和新闻俨然成了对抗美军侵略的宣传武器。当时像我一样工作生活在北越的苏联军人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总计达 15,000 人左右，他们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越南同美国进行抗争。”^①

美国从 1972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9 日，发动了越南战争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空中战役“中后卫-2”（Linebacker-2）。美军动用了 200 多架 B-52 战略轰炸机（740 架次）、1200 架空军、海军战术飞机（1800 余架次）、70 架 F-111A 歼击轰炸机、约 150 架 SR-71、147J、RF-4C、RA-5C 侦察机和各种电子战飞机，连续集中空袭越南人民军重点防护的河内、海防、太原等战略要地。越南人民军空军和防空军部队奋起反击，主要使用 CA-75M “德维纳”（Двина）地空导弹（北约称之为“萨姆-2”），对“空中堡垒”进行了毁灭性的反击，击落了 34 架 B-52 轰炸机。在此次反击二战后第一次喷气式战略轰炸机大规模空袭的矛与盾的较量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迫使遭到惨重失败和国际舆论强烈谴责的尼克松总统下令，自 12 月 30 日起停止对北纬 20 度线以北越南北方地区的轰炸。双方最终于 1973 年 1 月 27 日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苏联专家弗拉基米尔·拉古宁（Владимир Лагунин）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3 年 1 月 1 日。周一。昨天，尼克松下令停止轰炸。自 12 月 18 日，第一次脱光衣服在床上睡了个好觉，第一次不用钻防空洞。”^②

① Михаил Ильинский. Пилоты в пижамах в ханойском плен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1 июня 2008.

② Лагутин В. Дневник Владимира Лагутина: Операция «Лейнбакер-2»// Армия. 2002. №.1. С.34-35

俄罗斯学者西罗克拉德（А.Б. Широкоград）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在 12 天内，美军在北越领土上投下了 100 万吨炸弹，而北越防空部队击落美军飞机 80 架，其中包括 B-52 战略轰炸机 23 架。最有效的战绩是两个防空炮团集中火力射击一个目标，8 次射击击中 6 架美国飞机，有效率达到 75%。^①美国战略和战术飞机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遭受到如何惨重的损失。1973 年 1 月 1 日，每个苏联军事专家都收到了胡志明主席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以及越苏友好协会的新年问候。^②

表 2 防空导弹系统“CA-75M 德维纳”击落美军飞机数目和机型表

年代	美军飞机类型									总计 (架)
	F-105	F-4	A-4	A-6	F-8	RB-66	B-52	PQM-34A PQM-147J	其他类型	
1965	38	24	8	2	-	-	-	5	7	94
1966	93	37	14	-	-	2	-	17	58	221
1967	80	101	82	23	9	-	3	20	25	344
总计	221	162	104	25	9	2	3	42	90	659

资料来源：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ЗРВ В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стрельб. С.128

曾担任苏联军事专家教导团领导的修宾涅少将（А.И. Хюпенен）的统计数字表明，在 12 个昼夜里，美国飞机损失 81 架（34 架 B-52 轰炸机，3 架 F-111 轰炸机）。美国空军在每一千架次中，二战中损失飞机 9 架，朝鲜战争中损失飞机 4 架，在越南战争中损失 17 架。而在 1972 年 12 月，每一千架次损失的飞机达到了 34 架。^③越南国防部的公开刊物《人民军队报》（Quân Đội Nhân Dân）高度评价修宾涅的研究，认为他的研究是客观和公开的，并强调，

① Широкоград А.Б. Архив: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ые суда. Боевая служба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Братишка. 2012. №.1. С.44-49.

②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ЗРВ ВН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стрельб//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зенитных ракетных войск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Армии проти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авиации США в декабре 1972 г./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его Войсками ПВО СССР. - М.: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73. С.22.

③ Хюпенен А.И. Кульминация воздушной войны: В конце 1972 года северовьетнамская ПВО отразила мощнейшие удары авиации СШ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3. №.7. С.5.

在这场战役中苏联军事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①

2012年12月28日，越南国防部长冯光青大将（Phùng Quang Thanh）在会俄罗斯邦达列夫中将（В.Н. Бондарев）时表示：越南战争打败美国的胜利必须感谢数千苏联军事专家的贡献，尤其是在1972年12月18日至12月30日的12个日日夜夜的英勇表现。^②冯光青说：“美国在这次行动中的惨败已经成为10年战争的高潮，我们仍然记得当时的喜悦，同时要感谢苏联军事专家，他们使这一胜利变成了现实。这场胜利可以同苏联战胜纳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比”。^③

美国外国军事研究处主任格劳上校和德列科夫斯基（Dana Drenkowski）当年参加了这一行动，他们以自身经历和详细数据高度评价了苏联军事专家援助的北越防空体系。^④1965年4月至1974年12月，苏联向越南提供了95组CA-75M导弹防空体系，其中包括92组3舱（трёхкабинный вариант）方案体系和3组6舱（шестикабинный вариант）方案体系（共计312个舱，其中包括95个收发舱），它变成了美国飞机的囚笼。俄罗斯解密文件证明，在1965-1974年间，苏联帮助北越建立了一个庞大和有效的防空体系，包括11个CA-75M防空导弹综合系统（51 ЗПК CA-75M）；4个战斗机航空团（ИАП）（由2个米格-21歼击队大队、一个米格-19歼击机大队和一个米格-17歼击机大队组成），共有飞机251架（战斗机210架，教练机41架）；米格-21战斗机58架（其中战备机42架）；米格-19战斗机42架；米格-17战斗机107架（其中战备机55架）；4个无线电对抗团（РТВ）（其中РЛР系统36

① Nguyễn Đăng Nguyên. Chiến tranh Việt Nam là như thế đó//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 Cơ quan của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và Bộ Quốc phòng / Tổng Biên tập: Thiếu tướng Lê Phúc Nguyên. Hà Nội: Bộ Quốc phòng Việt Nam, 12.11.2012.

② Đại tướng Phùng Quang Thanh tiếp đoàn Bộ Quốc phòng liên bang Nga và Quân Giải phóng nhân dân Trung Quốc (вьетн.) (HTML). Thời sự. Hà Nội: Trương Tấn Sang Chủ tịch nước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28.12.2012). Проверено 8 февраля 2013.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из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16 февраля 2013.

③ Thủ Thành. Trận Điện Biên Phủ trên không, trong kỷ ức các cựu chuyên gia Liên Xô (Kỳ 1) (вьетн.)// *Quân Đội Nhân Dân* : Cơ quan của Quân ủy Trung ương và Bộ Quốc phòng / Tổng Biên tập: Thiếu tướng Lê Phúc Nguyên. - Hà Nội: Bộ Quốc phòng Việt Nam, 13.12.2012

④ Drenkowski, Dana ; Grau, Lester W, “Patterns and Predictability: The Soviet Evaluation of Operation Linebacker II”,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7, Vol. XX, №.4, pp. 1-3, 33-38.

个，PLC系统 108 个)^①

表 3 被击落美军飞机统计表

兵 种	1965 年	占比例, %	1966-1967 年	占比例, %
防空导弹团	102 架	12 %	592 架	34 %
高射炮团	739 架	86 %	1014 架	56 %
空军歼击机	无	无	无	无

资料来源：Мальгин А.С. Войны-локальные, выводы - глобальные: ПВО как один из реша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успеха в вооруженном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 октября 2001. №.39. С.4.

根据苏联军事专家斯米尔诺夫中尉（Д.С. Смирнов）的研究，仅在 1972 年，在越南，由于苏制防空导弹系统“德维纳”（СВ-75）和“杰斯纳”（С-75М）的作用，击落了美军战略和战术轰炸机B-52 共 51 架。1965-1973 年，仅“德维纳”系统就击落美军飞机和无人机 1300 架。^②俄罗斯学者赫文修克（Н. Хвесюк）认为，防空导弹系统“德维纳”和“杰斯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越南战争的进程。^③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越南战争中苏制防空导弹系统击落美军飞机的数字并不统一。由空军少将加鲁申科（Ю.И. Галушко）、谢尔什涅夫（М.А. Шершнев）和卡尔宾科（В.И. Карпенко）组成的俄罗斯空军大学（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оздушных сил им. Ивана Кожедуба）研究团体的资料和数字证明，在越南战争中，苏制防空导弹系统“德维纳”共击落美军最新型飞机 1400 架^④。布连科教授（В.М. Буренок）统计，在越南战争中，“德维纳”

①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ды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4-1973 гг.)». Москва, 2000. С.23-24.

② Мальгин А.С. Войны-локальные, выводы - глобальные: ПВО как один из решающих факторов успеха в вооруженном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е. С.4.

③ Хвесюк Н. Человек большой судьбы: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маршала артиллерии Пав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а Кулешова// Армей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09. №.1. С.45.

④ Галушко Ю.И. Шершнев М.А., Карпенко В.И. Досвід і вплив Великої Вітчизняної війни та локальних конфліктів на розвиток зенітних ракетних військ (укр.)// Наука і техніка Повітряних Сил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2010. №.1. С.99.

系统共击落美军战斗机 2500 架^①。俄罗斯军事历史研究所出版的《军事百科辞典》(Воен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则表明, 到 1974 年停战, 越南防空导弹系统共击落美军飞机 4 千架。^②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卡罗科夫 (А.В. Огороков) 认为, 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损失飞机 8612 架, 其中 3720 为固定翼飞机, 4892 架为直升机 (另一个统计数字: 消灭美军飞机 3744 架, 直升机 4868 架), 其中在北越上空击落美军飞机 1095 架, 直升机 11 架。^③

在越南战争中大显身手的防空导弹系统“德维纳”(СA-75 «Двина») 是在原防空导弹系统“杰斯纳”(С-75 «Десна) 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随后苏联(俄罗斯)军事专家吸取了越南战争中使用该防空导弹系统的经验和教训, 在“德维纳”基础上开发出了新的防空导弹系统“沃尔霍夫”(С-75М «Волхов»)。

为了限制和打击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战争中的巨大作用, 美国不惜使用“心理战”方式离间苏军专家与越南居民的关系。据特鲁舍奇金回忆, 苏联军事专家经常能够从收音机里收到功率强大的来自美国和南越电台的俄语广播。这种广播对苏联人施加心理战影响, 希望以此来打击反对他们的苏联军人的士气。美军向越南居民发射和发放传单, 告诉越南居民远离“危险的邻居”——苏联人, 因为有苏联人的地方就意味着有苏制导弹和高炮, 而这正是美军集中打击的地方。美军还诱使越南居民监视和密报苏联军事人员和苏联现代军事装备的情况。然而, 在这方面, 美军的努力是失败的。维尔涅斯卡 (М. Варненска) 说: “敌人想在每天走向田野劳作的农民、在夜以继日地守卫在这块田野上的士兵中, 离间与苏联人的关系的企图是失败的和注定要失败的。”^④

① Буренок В. М. Отнюдь не «ниспровергатель военной супермоши»: Эпоха Хрущева стала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ым этапом в перевооружении армии и флот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4 июля 2009. С.10.

②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1959-75// Воен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 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 РФ; Ред. кол. А.П. Горкин, В.А.Золотарёв и др.. М.: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1. С.344.

③ Огороков А. В. Вьетнам. 1945-1975 гг.// Секретные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ервая пол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ЭКСМО, 2008. С.268.

④ <http://ru.wikipedia.org/wiki/>

最初时期，苏联军事专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初到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几乎都经历过同样的困难：高温、潮湿和饮用水严重缺乏，家中来信无法及时收到。沃罗诺夫上校（Б.А. Воронов）回忆：“初到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不轻松的。作为欧洲人，我不得不习惯热带条件下的生活。你周围的空气整日都是从摄氏 35 度到 40 度，湿度为 80%至 100%。他们住在小茅屋、竹子和棕榈叶制成的平房、或者是在莽莽丛林中搭成的帆布帐篷里。我们不得不在深夜里急行车，还要冒着大雨，走在泥泞的乡村道路上，头上顶着美军飞机的轰炸和导弹的攻击。防空导弹系统的舱内空气温度达到了摄氏 70 度，为计算数据要在这个炎热的金属大锅里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还要防备威胁健康的昆虫叮咬，其中许多是有毒的昆虫，我们把这些昆虫叫作‘黑石子’（фосфоритка），它们大量地从树木和灌木上爬下来，在人的身上爬行，留下灼伤，使皮肤溃烂，长久不能愈合。我们还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量爬行动物，如最剧毒的虎蛇和眼镜蛇，被蜥蜴和蛇咬伤是致命的。尽管苏联医生带有抗蛇毒疫苗，但它并不是总能发挥作用的。”^①

亲身参加了越南战争的军医纳扎连科上校（Е.Т. Назаренко），在他的医学论文《气候条件对健康的影响和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战争行动的结果：战争条件下的医学帮助组织》（Влияние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и боев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на здоровье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бо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о Вьетнаме.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омощи в боевых условиях）中特别谈到：“每一个来越南的人，首先遇到的是极不好的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它首先是极高的温度和 100%的湿度。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就是导致各种皮肤疾病，主要是体疮、红癣、脓疱型皮肤疾病，感染长期不愈的轻微擦伤和软组织受伤……显然，排在第二位的警告是各种感染性疾病。很多人都知道，在 1967 年有一个病案——脑炎导致一名士兵残废。”“使用蚊帐是强制性的，尽管闷热缺少空气难以入睡。非常重要的一项是认真监测食物卫生。一方面是因为越南厨师文化水平低，不按卫生规定操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乏制冷设备，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导致中毒性痢疾爆发，

^① Воронов Б.А. Наши во Вьетнаме: Записки начальника штаба группы СВС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Изд-во «Экзамен», 2005. С.259-303.

以及感染其他的胃肠道疾病。”^①“必须要关注苏联军事专家的心理健康问题。特殊的环境、恶劣的气候条件、持续不断的轰炸威胁、与亲人和朋友的长期分离以及年轻军官中缺乏沟通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不利影响并导致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和反应力不足等各种的局面。不幸的是，苏联军事专家的精神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②纳扎连科统计了苏联军事专家的平均寿命，大多数人是在 60 岁左右去世的。他认为，这一数字与战争环境导致的身体的和心理疾病有着密切的关联。^③

为此，苏联和越南政府为苏联军事专家安排了不少的体育运动项目，为比赛获胜者颁发奖杯。在俄历新年到来的时候，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А.А. Гречко）的名义给苏联专家发放贺年卡和礼物，以及从用来自苏联的松枝做的圣诞树。在越南新年春节，则按越南习俗发放礼物。每个专家每半年有在北部湾岸边度假村休假两天的机会，届时让他们参观越南宝塔、博物馆和其他一些文化设施，每天放映尽量新的电影。苏联军事专家每周有一次到苏联大使馆聚会的机会。苏联军事专家业余时间的一大兴趣和注意点，就是接收家书和写信和。每一次外交邮袋到达时，都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因为这是唯一的与家人和家乡触摸的机会。据苏联军事专家领导小组的秘书罗斯梁科娃（Л.И. Рослякова）证明，每个专家的信件都非常多，有时能一次收到几大袋信件。这也说明，因为战争，当时的邮路极其不畅通，信件积压严重。^④

苏联导弹军中尉鲍里先科（В.А. Борисенко）回忆：“能不能谈一谈我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8 个月都是车轮上，与自己战斗。晚上通常是安排在郊区的村庄住宿。我们睡在地板上或干脆睡在地上，周围是爬来爬去的动物，头上是飞来飞去的某种东西。没有冰箱，没有风扇，也没有灵魂。我们梦寐以求的是每周安排洗一次热水澡。全村男女老少在周围观看，他们不理解

①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С. 68, 70.

②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С.71.

③ Там же. С.72.

④ Рослякова Л.И. Страшно было всем//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248-258.

这些苏联人为何用热水烫洗。”^① 苏军专家别洛夫上校 (А.М. Белов) 在回忆录中谈到, 越南同志总是尽一切努力试图给苏联军事专家提供较好的休息地方和改善工作条件。给苏联军事专家提供的食物极为单调, 主要是大米, 基本上没有肉类, 偶尔有肉汤, 更多的是罐头食品。^② 克里夫达少将 (Ф.Ф. Кривда) 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 春节假期 (越南阴历新年) 具有全民的特点。城市里持续响起隆隆的鞭炮声, 一整夜没有停息, 实际上在整整一周内都能听到鞭炮声。与俄国的新年相比, 越南人胜过俄罗斯人, 他们以狂热和过于嘈杂的方式庆祝新年: 爆炸的鞭炮声和用过的火药, 足以比得上小型战争了。苏联军事专家也应邀坐在节日桌前, 按照越南的老传统, 接受给嘉宾的一棵开着花的小鸳鸯树, 上面点缀着小水果。^③

按照传统, 胡志明主席在新年之际要以诗歌的形式向越南人祝贺新年。苏联军事专家当然也收到了一张印有诗歌的明信片。胡志明祝贺苏联武器在消灭美国空军时发挥的巨大作用, 一年内击落美军飞机 773 架。他表示最终将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④ 苏联英雄、苏联功勋飞行员希莫夫上校 (С.А. Сомов)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越南春节的热闹景象: 众多的表演、烟花爆竹、民间节日、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表演, 最后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动着的制作精良的巨龙。越南人要到佛教寺庙和宝塔中去祭拜。这一切对于苏联军人来说是非常有趣和惊奇的。胡志明主席在春节的第一天, 按照传统拜访了与他们一起反对法国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的苏联同志。用希莫夫的话说, 胡伯伯 (越南人就是这样尊敬地称呼他的), 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 和蔼可亲地用俄语与他交谈。然后, 胡志明与他们友好地拍照作为留念。^⑤

① <http://ru.wikipedia.org/wiki>

② Ibid.

③ Кривда Ф.Ф. Часть вторая // На берегах Меконга. 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М.: Воен. изд-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1995.

④ Воронов Б.А. Наши во Вьетнаме: Записки начальника штаба группы СВС во Вьетнаме //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259-303.

⑤ Колесник Н. Н.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МООВВВ(HTML).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2007). Проверено 14 сентября 2012.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из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29 января 2013.

三、塑造“苏联形象”：苏联军事专家的当时作用和历史影响

越南地处中南半岛要冲，北部与陆上大国中国接壤，东部和南部濒临南海，其海岸线（3260 公里）达到其国界周长的一半以上。越南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海洋进入大陆的要道，是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所说的典型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al）意义上的“边缘地区”（marginal zone）^①，更是自古以来典型的兵家必争之地。

越南作为地处战略要地和濒海的国家，来自异国的军事入侵、外交渗透和文化影响不胜枚举，对于欧洲文化和欧洲人更是不陌生。尤其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经历了这个欧洲殖民者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但是，越南对于既相关又区别于欧罗巴种族的俄国（苏联）人，对于它所代表的迥异于欧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却相当陌生。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即成为红色政权的基地和世界革命的中心。1919 年 3 月，共产国际（Коминтерна）建立之后，立即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向外输出革命的主要工具。建于 1921 年 10 月 21 日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②，受命为东方国家培养革命干部。1923 年，胡志明接受共产国际的邀请从巴黎前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短训班学习并毕业，他同时还代表越南参加国际农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极少数越南人之一。随后，胡志明受共产国际委派于 1924 年来到中国广州，担任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М.М. Бородин）的俄文翻译。1925 年，胡志明在广州创建“越南青

^①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家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区学说”。他原则上接受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心脏地区说”（Heartland Theory），也强调欧亚大陆在全球战略中的主宰地位。他认为，以中东欧为代表的“心脏地区”虽然重要，但欧洲沿海地区、阿拉伯半岛和季风沿海地区所组成的大陆边缘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它们拥有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拥有世界占首位的石油资源，以及丰富的其他战略资源，并且呈半月状包围着心脏地区。同时，它窥视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战略要冲，既制约着海洋国家向大陆渗透，又控制着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斯皮克曼的结论是：“谁统治了边缘地区，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② 1923 年该校以斯大林名字命名，更为“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 им. И.В. Сталина），1938 年停办。

年革命同志会”。1930年，胡志明将越南的共产主义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合并，在香港九龙华仁书院创建越南共产党（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值得一提的是，在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有几位在莫斯科军事技术学校留学的越南青年作为志愿兵参加苏军作战。^①还有一些越南人在内务部队中服役。^②

以上情况说明：

第一，由于苏联地理上距离越南遥远，除胡志明等少数政治家和革命者曾短暂到过苏联外，绝大多数越南人对苏联国家、民族和文化，乃至人种等方面均不甚了解。前面谈到的苏联军事专家克留奇科夫因所驾飞机发生爆炸而迫降地面，遇到当地越南人时的窘迫和危险即说明了这一点（越南人无法将他与美国人区别开来，因为在当地人眼中他们都是外国人——欧洲人）。

第二，尽管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于1945年，然而它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直到1957年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如果以此为起点计算，到苏联军事专家大规模援越的1964年，不过仅仅8年。所以，普通越南人对于苏联军事专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甚了解、甚至极其陌生，是正常的。

因此，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的言行举止和工作业绩既代表了“苏联人形象”，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形象”。正如1965年4月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托夫第一次参观越南人民军第238防空导弹团培训中心时对在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所说的：“你们的战斗工作是击落美国飞机的保证，与越南军人的具体关系将是提升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外交、友谊关系的牢固基石。”^③

在越南人眼中，苏联军事专家首先展现了完全不同、甚至是难以理解的生活习俗。越南气候炎热，洗澡冲凉是每个人日常之必需。但是，越南人不理解，在烈日炎炎和酷热难当的条件下苏联人为什么还要洗热水澡，而此举

① Цветов А. П. Далекая, но не чужая им война...// Столетие. 15 ноября 2011.

② Зевелев А. И., Курлаг Ф. Л., Казицкий А. С. Приложение. Люди бригады// Ненависть, спрессованная в тол. М.: Мысль, 1991. С.329-330.

③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С.34.

不过是来自酷寒地区并且已经习惯了芬兰浴的苏联人的日常习俗。苏军专家宾托耶夫上校（Т.Ф. Пяттоев）回忆：“每当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安排洗浴的时候，我们的越南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要洗热水，以及水是如何加热的。我们设法建起小木屋，里面放上石头和清水。我们建造的浴池足够大，可以让整个组的人同时洗热水澡。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在我们洗澡的时候，当地居民会莫名其妙地围上来，其中还有妇女和儿童。”^①

苏联军事专家还将苏联工业品带到了越南，让越南人大开眼界。为了安全和隐蔽，苏联军事专家一般穿当地居民服装。杰莫琴科少将（Ю.А. Демченко）是派到越南的第一批苏联军事专家。他回忆说，军官有权选择穿西装，但大多数人还是穿当地服装，因为他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每名军官，除西装外，还发给两条中国制造的裤子和衬衣、一顶帽子、一双黑皮靴。每当遇上节日，当地政府和军队会向苏联军事专家发出邀请，苏联专家要穿上西装，脖子上系上领带。^②有时苏联军事专家慷慨地将自己的衣服送给越南同事，既促进了同志间的友谊，又显示了苏联日用品的优良。1965年12月31日，为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宾（А.Н. Шелепин）访问越南，给苏联专家们寄来了时尚服装：外套、毛衣、裤子、高跟鞋、鞋子和高踝靴。而苏联专家们二话不说就送给了越南翻译和其他越南同志。^③

苏联军事专家带来了苏联文化和社会主义政治，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教育和影响着越南人。托耶夫上校回忆：“在恶劣的天气里，到了晚上，有时在白天，我们在村庄里放映电影，安装好屏幕，开动汽油发电机，给当地居民放映苏联电影。越南人特别喜欢苏联著名动画片《兔子，走着瞧》（Ну,

① Пяттоев Т. Ф. Мы помним совместную борьбу//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425-447.

② Демченко Ю.А.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82-го ЗРДн. Успехи и просчёт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было столько пережито...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Пос. Лесной городок, Московская обл.: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Январь 2003). Проверено 11 февраля 2013.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из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16 февраля 2013.

③ Демченко Ю.А. Родина не забыла нас// Во Вьетнаме было столько пережит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Пос. Лесной городок, Московская обл.: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Январь 2003). Проверено 11 февраля 2013. Архивировано из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а 16 февраля 2013.

погоди!), 因为不需要翻译”。^①

在越南人民军第 263 团工作的苏联少校尤金 (В.А. Юрин) 回忆: 党的政治工作是切合实际和远离形式主义的, 每个党小组都设有“红角”(красный уголок), 墙上挂着苏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图和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条例和命令, 桌子上放着宣传小册子, 喜剧电影《马林诺夫卡村的婚礼》(Свадьба в Малиновке) 已经放映了无数次。有人过生日时, 将获得一本签名的相册和伏特加酒 (5 人 1 瓶)。^②

曾经担任苏联军事专家领导小组工作的波兹杰耶夫少将 (А.Ф. Поздеев) 回忆: 在苏联军事专家中, 有不少人有着相当的天才, 他们是诗人、音乐家和歌唱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对祖国、对家庭的热爱, 抒发战友情谊和苏越友谊。特卡琴科 (Николай Ткаченко) 曾创作诗歌《斯科金 (焦尔金) 在越南》(Скоркин (Тёркин) во Вьетнаме)。托卡乔夫 (М. Толкачев) 的诗歌被配上乐曲, 变成著名的歌曲《越南之梦》(Вьетнамские грезы)。波尔特亚金 (М. Портнягин) 创作了歌曲《朋友》(Друг)。加金斯基 (Ю. Гагинский) 创作了诗歌《河内之夜》(Ханойский вечер)、《热带漂移》(Тропические сугробы)、《南十字星》(Южный крест)。库普列瓦赫斯基 (В. Куплевахский) 也创作了许多好听的歌曲。这些创作的歌曲和诗歌本子被带回了苏联, 以作为严酷环境中战斗友谊的纪念。^③ 退休的苏联驻越南大使扎依采夫 (А.С. Зайцев) 在整个 1960 年代工作在越南, 他听到了许多来自苏联军事专家的口头创作的作品。据他介绍, 在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的歌曲反映了他们的特殊工作。由于派驻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因此在创作的歌曲中, 战争、家庭和友谊是最重要的主题。这些歌曲被复制在磁带上, 在他们中间广泛传唱。这些年轻和有才华的军事专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蚊子”(Комар), 他们创作的歌曲总是回响在河内每一个青年聚会的场合。”^④ 这些战争年代创作的诗歌, 绝大多数至今仍然没有版权,

① Пяттоев Т.Ф. Мы помним совместную борьбу//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425-447.

② <http://ru.wikipedia.org/wiki/>

③ Поздеев А.Ф. Испытание огнём//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379-396.

④ Зайцев А. С. Охотники за трофеям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3 октября 2008.

大量的诗歌也不知道其真正的作者是谁。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诗歌都是记录在自制的小册子上，尤里·沃罗诺夫（Юрий Воронов）就保留着他的父亲、苏联军事专家团领导小组成员沃罗诺夫（Б.А. Воронов）创作诗歌的小本子。^①正如俄罗斯军事历史研究所出版的《无名作者的诗歌与歌曲·越南战争亲历者》（*Стихи и песни неизвестных авторов-участников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ы*）所言：“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方式表达了那些从战争中回来的人的想法和感受”。^②科学和技术领域列宁奖金获得者阿诺索夫（А.М. Аносов）曾经在苏联军事专家科研组工作。他认为，越南歌曲《汗水一百克！》（*một trăm gam/ мот чам гам*）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时的辛勤工作和遇到的重重困难。^③

据克利斯尼科（Николай Колесник）回忆：“每日的培训工作结束后和火箭加油工作结束后，我们并不寂寞。我们回忆自己参军前和到越南前的故事，或者讲一讲笑话。顺便说一说，越南人非常喜欢听我们的笑话。晚上伴着吉他唱起歌。我们这里有非常优秀的吉他手，会很多首歌曲。萨沙·库拉金（Саша Куракин）经常唱的有《重要的是小伙子，心不老》（*Главное, ребята, сердцем не стареть*）、《同志飞向远方》（*В далёкий край товарищ улетае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小路》（*Дороги*）、《蓝色的海洋》（*У моря, у синего моря*）、《青年警惕之歌》（*Песня о тревожной молодости*）、《在那里，在远处的河对岸》（*Там, вдали, за рекой*）、《白桦树》（*Берёзы*）、《小伙子，放开马》（*Распрягайте хлопцы коней*）、《漫长的旅程之前》（*Перед дальней дорогой*）、《傍晚的道路上》（*Вечер на рейде*）、《塞瓦斯托波尔圆舞曲》（*Севастопольский вальс*）、《敌人打不垮我们的骄傲》（*Врагу не сдаётся наш гордый*）、《瓦良格人》（*Варяг*）、《老乡》（*Землянка*）、

①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1961–1974 гг.)//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1946-1982 / 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Е.М. Чехарин, В.М. Жарков, Д.М. К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М.: Изд-во «Патриот», 1999. Т. 10. С.235-240.

② Ярёмко В.А., Почтарёв А.Н., Усиков А.В. Стихи и песни неизвестных авторов-участников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ы// Россия (СССР) в локальных войнах и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 века / Под ред. В.А. Золотарёва. 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О РФ. М.: Триада-фарм, 2002. С.205-210.

③ Аносов А. Как песня сложилась//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340-354.

《哦，花菱》（红莓花儿开）、《远飞的候鸟》（Летят перелётные птицы）、《妈妈给我写信，我去埃及了》（Напиши мне, мама, в Египет）、《我亲爱的枫》（Клён ты мой опавший）、《地质学家》（Геологи）、《两岸》（Два берега）、《秋叶》（Осенние листья）、《我爱你，生活》（Я люблю тебя, жизнь）、《前线司机之歌》（Песня фронтового шофёра）、《那个海里出生的人》（Тот, кто рождён был у моря）、《睡在黑暗中》（Спят курганы тёмные）、《无名高度》（На безымянной высоте）、《久违了，顿巴斯》（Давно не бывал я в Донбассе）《沿着伏尔加》（Течёт Волга）、《俄罗斯人不要战争》（Хотят ли русские войны）、《朋友之歌》（Песня о друге）等，当然，还得有《喀秋莎》（Катюша）。但给苏联军事专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歌曲《孤独的手风琴》（Одинокая гармонь）。在这样极其闷热的热带夜晚，周围萤火虫在闪烁，蝉鸣声此起彼伏，在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明亮的星星，苏联人与越南人一起或者用俄语或者用越南语唱出‘一切都停止在黎明之前……’。我们也学会了南越民族解放战线的歌曲《解放越南》（Зай фам Вьетнам）。有时在苏联人和越南人之间展开一场排球比赛，在排球场上，刚才的同伴立即变成了‘敌人’。晚上，经常放映电影，越南电影一般是纪录片，内容是越南战争的最新战况与解说，随后是艺术片，当然是苏联的了。”^①在第八培训中心，科楚拉诺夫（В.Н. Кочуланов）和科鲁波诺夫（В.А. Крупнов）建立了一个不大的军队乐团，演奏民族乐曲，如最流行的乌克兰歌曲《切列姆希纳》（Черемшина）。歌中唱到：“夜晚的小花园啊，在一个安静的小角落，等待着姑娘啊，等啊等……”（Вівчара́ в садочку, в тихому куточку, жде дівчина, жде...）^②

苏联军事专家与越南同志一起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日”（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субботники）并举行音乐会。波兹杰夫少将回忆苏联驻河内大使馆安排的音乐会说，他感觉所有越南人完全不用翻译就能理解演奏的俄罗斯音乐。当音乐会结束，越南同志全体起立，用俄语高喊：“友谊！”

① Колесник Н. Н. Секретная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во Вьетнам //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96-136.

② Бондаренко И.В. Засада в горах Тамдао//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223-231.

友谊!”最后，由政治指导员作报告，他讲：“明天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与美国侵略者的殊死战斗，我们将勇敢而坚定地战斗，就象苏联党的好女儿卓娅所做的一样。”很多越南人通过翻译成越南语的书籍，很好地了解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英雄的故事。^①此外，越南政府定期邀请苏联军事专家到河内举办大型演讲，向越南人民宣传与法国人和美国人斗争的英雄事迹。在河内，经常更新的展览，内容是展示被击落的美国飞机的设备。^②

苏联军事专家以其刻苦耐劳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其精湛的技术，让越南人感到钦佩。而且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在数量上和质量远高于中国提供的同类援助，使越南政府和越南军民为之倾慕。在这两点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越关系的快速升温，也促成了中越关系的逐渐疏离，使越南最终完全倒向苏联。

越南战争初期，苏联与中国均有军事专家驻越，越南与二者的军事政治关系极为复杂。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正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紧张并公开化的时期。中苏两国都极力试图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将越南人拉到自己一边，而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政府则从中获益。

此前的1964年1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Lê Duẩn）、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Le Duc Tho）和范文同等北越领导人前往苏联，希望通过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获得苏联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然而，在1月31日越南领导人抵达莫斯科后，苏联并没有立即安排双方的会晤，而是安排他们去参加莫斯科的名胜古迹。2月9日，苏越双方展开会谈。苏联方面指责越南追随中国，“受到北京的强烈影响”，“夸大了自身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扬言如果北越不改变态度，转向苏联一方，“两国间不会出现密切合

① Поздеев А.Ф. Испытание огнём//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Изд-во Экзамен, 2005. С.379-396; Колесник Н.Н. Поколение благородных идеалов и надежд (послесловие)// Дневник Данг Тхюи Чам [Дневник врача на войне]. М.: Изд-во «Глобус», Языковой 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Клуб «Тханглонг», 2012. С.276-277.

② Конаков В.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война в оценке её участника-офицера главного штаба войск ПВО страны (СССР)//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Изд-во «Экзамен», 2005. С.448-476.

作的前景”。^①因此，在1964年8月黎笋来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他公开指责苏联拿越南做交易。同年11月，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②然而，在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以后，苏共和苏联政府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这其中，自然有苏联试图与中国争夺对越南控制权的因素。

1965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А.Н. Косыгин）访问河内，双方签署了全面开展军事和经济合作的协议。从1965年起，越南开始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特别是防空装备，苏联的军事援助达到援助总量的60%。1968年，苏联给予北越的援助达到5.42亿卢布，其中大部分（3.61亿卢布）为免费提供。^③苏联向越南提供了一些新式武器和装备，包括防空导弹“德维纳”（CA-75），米格-17和米格-21歼击机、苏-17轰炸机、安-28运输机、伊尔-14和里-2运输机、中型和小口径火炮、探测雷达等。1971年，北越政府决定越南人民军向南越发起进攻。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投入了越南人民军14个团和一些大队，配备了苏联小型武器（部分根据苏联的许可证在中国工厂生产）、拥有红外夜视功能和100毫米坦克炮的T-34和T-54坦克，以及小型战舰等。^④苏联空军上校库兹涅佐夫（Виктор Кузнецов）在回忆录中谈到北越政权是如何利用中苏竞相争夺越南的好时机的：“北越军方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有求必应’的特点，尽可能多地积攒军事装备。”^⑤库兹涅佐夫发现，当飞机数量超过飞行员的数量时，越南人就把从苏联、中国等国得到的飞机和装备封存在隐秘的山洞里。库兹涅佐夫发现，美国和南越空军地毯式的轰炸基本无损于藏在山洞里的北越空军储备，但由于越南人缺少最基本的飞机维护和保养常识，经常草率地将飞机塞进山洞，飞机没有被绝对密封，结果洞内湿热的环境对飞机零部件造成严重伤害，使飞机蒙皮变得粗糙。许

① Пух V. Gaiduk,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 Chicago: Ivanur Dee, 1996, pp.8-10.

② Ibid, p.17.

③ Глазунов Е.П. Забыть хотя бы часть своей жизн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51-73.

④ Куминов 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омощь Вьетнаму в годы войны //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С.39-45.

⑤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http://www.airwar.ru/history/locwar/vietnam/comandir/comandir.html>

多存放了一两年的设备仅用竹席盖着或草草拧上封口螺丝，最终完全丧失了使用价值。而北越军人对此却满不在乎，只满足于照章办事。因此，库兹涅佐夫嘲笑越南人员：“是的，你们任务完成得太好了，几乎一个歼击机中队都被你们‘保养送终了’”。^①

199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首届“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年代的俄国与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 наш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и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Вьетнамом в годы отражения вьетнам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4-1973гг)）大型学术研讨会上，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吴轩宁（Ву Суан Нинь）^②发表了《战争年代苏越军事和经济合作》的讲话，他说：“我们两国和人民之间的传统关系、兄弟般的友谊和密切的多边合作早已被巩固下来。在我国人民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建立新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我们得到了来自苏联人民的大力支持和伟大的有价值的援助。我们将永远记住在越南困难的战时条件下辛勤工作的苏联专家，我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们帮助我们打击外国侵略者。他们与我国人民并肩作战，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发展，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记得如何从苏联各港口向越南运送物资，尽管我们的敌人封锁了越南的港口。数十万越南人在苏联教育机构学习和接受培训并成为不同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大概战争时期在越南的苏联老兵还记得，当时的越南是什么样子。然而在随后的日子里，越南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③

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的卓越工作和巨额的军事物资的援助^④，促进了越

①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командировка. <http://www.airwar.ru/history/locwar/vietnam/comandir/comandir.html>

② 名字译自俄文文献的音译，暂未查到越南原文。

③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С.44-45

④ 2005年4月4日，越南解密了战争期间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越南提供各种援助的相关文件。文件显示，1955年到1962年间，苏联向北越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约14亿卢布，并帮助北越建设了34个大型工业企业和一系列医疗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重建了50个农业项目。美军上校海涅斯（Haines Dennis G）于198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评价称，越南空军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强大的空中能力。Haines, Dennis G, “The Military Threat, Strategy for Aircraft Maintenance in the Pacific”, Research Report,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88, pp.38,41.

南对苏联人、苏联社会和苏联制度的了解和亲近，也为战后越南全面倒向苏联提供了前提条件。1969年胡志明去世，越南战争也进入了最后的相持阶段。北越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愈来愈依靠苏联的援助，实际执掌越共大权的黎笋等人更是越来越倒向苏联。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黎笋与越共开始实行亲苏政策，并在1976年以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反华。

四、历史回声：越战苏联老兵的心声

在2004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交给越南领导人的绝密材料中，1965-1976年间，有1000余名苏联军人直接参加了抗击美国的越南战争。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另一个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数字表明，从1965年7月到1974年12月31日，苏联共派出6359名军官和4500名士兵和维持治安的军警。^①军事专家团中也有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古巴和保加利亚的军人。^②苏军总共在越南死亡1974人，其中军官13人。^③在战后的1975-2002年，在越南航空灾难中死亡的苏联军事专家又有44名，他们被集体埋葬在越南金兰机场（Cam Ranh），他们的名字和业绩镌刻在花岗岩墓

① Куминов 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помощь Вьетнаму в годы войны //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Материалы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ое во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годы агрессии США против ДРВ (1963-1973 гг.)». С.39-45.

② Лященко А. Буря на Кариба //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29 июля 2003; Иванов С.В. Годы учёбы // Боев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МиГ-17, МиГ-19 во Вьетнаме. М.: ООО «АРС», 2000. С.7.

③ 关于越战中死亡苏军人员亦缺少准确数字。一种说法，越战期间失踪苏军人员7名（参见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погибши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 Книга Памяти: 1946-1982 / Ред. коллегия: Е.М. Чехарин, В.М. Жарков, Д.М. Карабанов и др... М.: «Патриот», 1999. Т.10. С.241-242.）。另一说是16名（参见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Потери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 Г. Ф. Кривошеев.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526.）。克格勃上校莫罗佐夫（И.Н. Морозов）提供数字表明除了数十人伤亡外，更多的是因炸弹轰炸而造成的神经官能症和随之而来的心理障碍者居多，参见 Морозов И.Н. Как мы воевали во Вьетнаме // Москов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Перевал : Российска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М.: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родское военно-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Октябрь 1991。其余资料参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A%E5%8D%97%E6%88%98%E4%BA%89>; Коллектив авторов. 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Потери Вооружённых Сил / Г. Ф. Кривошеев.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1. С.526.

碑上。他们中间有防空导弹团军官、营指导员和高级飞行员。^①

“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是参加越战的苏联老兵最大的团体。它始建于1970年8月5日，成立大会是在刚刚放映完电影《战后晚6点》（В 6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после войны）的莫斯科大剧院。当不同时期在越南作战和援助越南的苏联退伍军人佩戴着各种奖章聚集在大剧院时，周围的莫斯科市民却大为不解，因为苏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仗了，这些军人因何获奖他们是不知晓的。1989年，这个组织被命名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联盟”（Союз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加入到“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国际委员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之中。从1970年到1994年，空军上校阿布拉莫夫（В.Н. Абрамов）担任该组织的领导人，他在1967年10月至1968年12月是赴越南的苏联专家团成员。该组织现任主席是退休上校卡列斯尼克（Н.Н. Колесник）。

1996年6月6日，该组织在俄联邦司法部和莫斯科司法局正式注册，登记号为6206。在取得合法地位后，“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成为“越南友好协会”（Общество дружбы с Вьетнамом）的集体成员，该组织与“俄罗斯战争退伍军人和军事服务人员协会”（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и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ы）、“莫斯科战争退伍军人和军事服务人员协会”（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 и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ы）等组织建立了联系。“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队社会组织”有5个分会，莫斯科市分会会员93人，莫斯科州分会会员71人，特维尔州分会会员14人，乌拉尔分会会员23人，鞑靼斯坦共和国分会会员12人，其他地区4人，共计217人。成员在苏联和俄罗斯的重要报纸《红星报》、《新消息》（Н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独立军事评论》（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真理报》、《莫斯科晚报》（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舞台》（Трибуна）、《论据与事实》

^① Нгуен Куинь Хьонг. Открытие Мемориала в Камрани// Вьетнам. 2009; Колесник Н. Н. Обучая, сражались и побеждали// ПВО Страны: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Сборник. К 70-летию отражения первого налёта фашист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на Москву. М.: Руспринт, 2011. С.1-35.

(Аргумент и Фактор)、《俄罗斯消息》(Российские вести)、《公开性》(Гласность)、《言论》(Слово)、《莫斯科共青团员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莫斯科郊外新闻》(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новости)、《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明天》(Завтра)、《弗拉基米城》(Владимирка)、《事实》(Факт)、《特维尔真理报》(Тверская правда), 重要杂志《今日俄联邦》(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егодня)、《战斗兄弟》(Боевое братство)、《老兵》(Ветеран)、《阅兵式》(Военный парад)、《在战斗岗位上》(На боевом посту)、《今日亚非》(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权力》(Власть), 以及越南的《劳动》杂志(nhân công)、《人民报》(nhân dân)和《人民军队报》上发表回忆文章。这些越战退伍老兵不止一次地参加俄罗斯军事爱国节目“世纪秘密”(Тайны века)的制作, 如“越南战争的俄国秘密”(Русские секреты вьетнамской войны)、“为祖国服务”(Служу Отчизне)、“打击”(Ударная сила), 以及俄罗斯电视一台的“这个怎么办?”(Как это было)、独立电视台(НТВ)的“军事”(Военное дело)、文化电视台(Культура)的“军事电视”(Военный ТВ)、“看到目标”(Вижу цель)、“被忘记的胜利的秘密”(Тайны забытых побед)等节目的制作。参加“斯拉夫人”(Славянка)、“俄罗斯广播”(Радио России)、“人民广播”(Народное радио)、“俄罗斯之声”(Голос России)和“灯塔”(Маяк)广播电台, 以及越南的对外广播机构“越南之声”(Голос Вьетнама)、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新闻机构的节目制作。^①

“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和保护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 保护越战老兵和战死老兵家属的自由权利”。仅1996年, 该组织就与越南驻俄罗斯大使馆和武官处、“越南在俄公民协会”(РОО «Общество вьетнамских граждан»)、“越南在俄企业家协会”(Ассоциация вьетнамски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莫斯科和平基金会”(Московский Фонд мира)等建立日常联系; 加入“越战老兵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ком Ассоциации вьетнамских ветеранов войны)。从1999年开始, 在越南驻俄大使馆和“越南在俄公民协会”的资

① <http://www.nhat-nam.ru/vietnamwar/spravka.html>

助下，每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举行传统的赴越老兵见面会，在每年的越南新年“春节”，组织老兵见面会。组织老兵与军队、大学和中学的青年人见面，如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的防空兵博物馆(Музей Войск ПВО)、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ИССАМГУ)、莫斯科第 1198、1301 中学、在巴拉什希城的“爱国者”(Патриот)军事体育俱乐部、巴基茨基元帅中学(гимназии им. маршала Батицкого)等处，都举行过这样的见面活动。

2005 年出版了由“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现任主席卡列斯尼克主编的文集《越南战争……这是怎么回事(1965-1973)》(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512 с.)。^①编委会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亲爱的读者：你手中这本书，其内容是独一无二的。它描述了我国迄今鲜为人知的事件和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所涉及的众多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记者提到，至今仍然披着神秘面纱。20 世纪下半叶，在世界上的政治力量和公众利益冲突的背景下，我们的国家——苏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本书收集了 60-70 年代在越南工作的苏联军事专家的回忆录，他们直接参加了援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回忆录作者都能活着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本编委会没有设定一个目标，只是试图建立一个时间顺序来呈现，同时保留每位作者的特点。编委会希望广大读者不会因为作者回忆录中出现一些小的错误而影响对同一事件的判断。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帮助读者，尤其是年轻人，找到现代史上许多问题的答案，并客观地评价这个时代和这些事件。”^②

1999 年 10 月 27 日，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Ф)、“跨地区越战退伍军人社会组织”、“跨地区国际军人、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退休军人组织”(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оин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ветеранов локальных войн и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和“对越友好协会”(Общество дружбы с Вьетнамом)联合在莫斯科举办了主题为“首届越南人民抗击美国

① 该书还同时出版了越南文版(Chien tranh Viet Nam la the do (1965-1973))。

②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Как это было (1965-1973). Антология. М.: «Экзамен», 2005. С.1-2.

侵略年代的俄国与越南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大型学术研讨会。

会后出版的论文集前言宣布：“今天，当越南战争已经渐行渐远并走进了历史，但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老兵——苏联军事专家的眼睛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们亲身参与了整个事件，他们是见证人。众所周知，过去的经验就是未来吸取的教训，换句话说，老兵的经验对于年轻人积极和有效地解决目前的任务是极为有益的。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需要我们认真分析过去的几场局部战争的经验。越南战争是一个最为长期、最为暴力和最为复杂的局部冲突，其影响波及整个国际社会。越南人民的斗争，他们争取独立的性格，在地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声势浩大的国际援助是越南人民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越南人民感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和苏联专家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在越南的艰苦工作。举办这次研讨会议，是试图让今天的人们记住那些严酷和艰难的日子。本书编者希望读者从这些老兵简单和真实故事中发现一些对自己来说有趣的和有用的东西。”^①

越战老兵、苏联英雄和“跨地区国际军队组织、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退伍军人组织”主席普希金(А.И. Пушкин)在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也表示：“至于谈到越南战争的经验，它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重要意义。在这场战争中所特别展现的防空经验，以及运作这些经验和多变的战术，用于现代新型设备的研发，采纳新型武器和应用作战经验，防备和与干扰敌人飞机，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经验现在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事科学的宝贵财富。这也是举办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所在。因此，我坚信，本次会议将丰富俄罗斯军队的专业知识，有益于新一代俄罗斯军人。”^②他还说：“并不是所有当年在越南工作的苏联专家都能活到今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为履行自己的军事职责已经在越南牺牲，其他一些人在过去的岁月里也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提议，为了纪念他们默哀5分钟。”^③

“跨地区越南战争退伍军人社会组织”主席卡列斯尼克在为此次会议致闭幕词时表示：“直至1989年4月，很少有人知道或听到我们——越战老兵

①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т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Москва, 2000. С.4.

② Там же. С.5.

③ Там же.

的名字。然而，在越南，我们的越南战友和和平居民，我们与他们一起抗击美国空袭和保卫他们的家园和生活，则感激地记住了苏联军事专家。但在我们的祖国，我们参加越南战争一直是被笼罩在保密状态中的‘秘密’，而在此时，美国的‘勇士’们却在到处炫耀着他们的‘战功’。可是，是我们一直在为反侵略和进行正义战争的越南人民提供国际援助，我们没有丝毫可惭愧的。世界上所有的舆论都站在越南和我们一边。正是由于我们的努力和帮助，越南获得了真正的独立，成为自由的国家，我们为此感到骄傲。”^①

【Abstract】 During the Vietnam War, the Soviet Union provided a lot of assistance in military personnel and military supplies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North Vietnam), offering extremely important material and technical conditions for the victory of North Vietnam.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Soviet government has kept it secre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late 1980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unveiled these secrets and published relevant archiv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ctivities and roles of the Soviet military expert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focusing on "the Soviet image"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reflected and created by those experts.

【Key Words】 the Vietnam War, Soviet Military Experts, Soviet Image, Soviet-Vietnam Relations, China-Vietnam Relations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период войны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большую помощь в форм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и во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Вьетнам (Северному Вьетнам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здав важнейши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е и техн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победы Северного Вьетнама. Однако в связи с особым контексто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тому,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ходил из соображений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эта история долго держалась в секрет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ССР. В конце 1980-х гг.

^① Хюпенен А.И., Варганов В.Н., Глазунов Е.П., Колесник Н.Н.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годы... Москва, 2000. С.73.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рассекретило 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роль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войне во Вьетнаме, а также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отражению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благодаря этим военным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 образа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 «Образ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Войн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енн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обра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вьетнам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苏德战争前苏联政治宣传中的“德国形象”

——以《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陈 余**

【内容提要】在一切以意识形态先行的苏联，政治宣传毫无例外地成为政府向群众表达官方立场的传声筒。纵观 1933-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苏德关系，经历了由坏到好、再到坏的过程，可以说，两国外交上的风云变幻直接影响到苏联官方政治宣传媒体对德国形象的塑造；同时，根据两国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刻意塑造的德国形象，又会对苏联社会大众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试以苏联最主要的政治报刊——《真理报》为主要考察对象，分阶段考察苏德关系变化与苏联媒体所塑造的德国形象转变的关系，并透过《真理报》一窥苏联的政治宣传手段。

【关键词】苏联政治宣传 德国形象 《真理报》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139-(18)

一、魏玛时期的苏德合作与苏德“伙伴”形象的建立 (1919-193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分别被苏维埃俄国和魏玛德国所取代，往日雄风已荡然无存。尽管苏俄在退出一战、粉碎了来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的叛乱之后，成立了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章的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 陈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 2011 级博士生。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苏联仍然处于敌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因此，如何保证苏维埃国家的安全，如何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成为苏联领导人在制定国内外政策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识到，除了要时刻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反苏的企图，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来说，与资本主义国家暂时和平共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为了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恢复本国经济，苏联打算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于是，备受凡尔赛合约压制的魏玛德国就成为苏联首要争取的合作对象。1922年4月21日，德国外长拉特瑙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签订了《拉巴洛条约》，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苏德两国在外交关系上的转变，奠定了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基础。

1926年4月，苏德两国在柏林签订了友好中立条约。柏林条约重申了《拉巴洛条约》的内容，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1932年恰逢《拉巴洛条约》签订10周年，苏联媒体对该条约的意义作出很高评价，称它不仅是苏德外交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了巩固欧洲的和平，粉碎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反苏的企图，苏联坚持维护和发展拉巴洛路线。1932年12月19日，李维诺夫对德国新外长牛赖特说，苏联照例认为保持与德国的良好关系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①在1930年1月下发给红军步兵团政治指导员关于宣传要点的文件中，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唯独对苏德关系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德国是对我们最友好的国家之一。(2) 谁压迫德国？德国反动派企图破坏德国与苏联的关系。(3) 我们与德国联系更为密切（指经济和政治联系）。结论：德国是最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德国的商业关系正在稳步向前发展。^②

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在1933年1月23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

① Иоффе.А.Е. В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28-1932гг. М.: Наука, 1968. С.269.

② Aleksandr M. Nekrich. Pariahs, Partners, Predators: German Soviet Relations. 1922-194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8.

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说道：“在所有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我们同德国的经济联系最为巩固……这符合两国的利益。”^①

纵观魏玛时期苏德两国的政治关系，虽有曲折，但总体上两国的经济和外交关系都遵循着拉巴洛精神在向前发展，两国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在苏联宣传媒体上体现为德国是苏联的“友好国”。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希特勒的上台打断了这一合作进程，并最终使两国彻底走上了敌对道路。

二、纳粹上台与苏联政治宣传中 法西斯德国“敌人”形象的确立（1933-1939.8）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着手镇压德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他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取缔了德国共产党，并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左翼进步人士。希特勒在国内掀起的一浪又一浪反共热潮，使苏联对法西斯德国反共、反苏的意识形态倾向极为担忧。尽管如此，德国内政的变化还没有影响到苏德两国的关系，此时的苏联仍想继续利用德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来维护自身利益。1933年5月6日的《消息报》上刊登文章指出：“德国在欧洲完全被孤立，以至于像过去一样再次转向苏联。苏联的政策一贯是利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天然矛盾、凡尔赛体系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矛盾。”^②

随着纳粹反共的触角深入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在德机构和工作人员，苏联觉察到法西斯德国打算积极奉行反共反苏的对外政策，德国政府宣扬的所谓苏德关系不变的言论已基本丧失了可信度。此外，最令苏联担心的，是法西斯德国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苏统一战线。至此，苏联媒体开始向苏联民众大肆宣传希特勒反苏、反共的企图。1933年6月23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Г.Е.季诺维也夫（Г.Е. Зиновьев）的文章——《论德国法西斯的对外政策》。季诺维也夫在文章中指出，法西斯德

① Тов. Молот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звестия. 1933. 24 января.

② Борьба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ира// Известия. 1933.6 мая.

国的外交政策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已经表露无遗：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应该仅限于争夺殖民地，而应该在欧洲开拓新的土地，这些土地只能在欧洲东部，亦即在俄罗斯才能获得。季诺维耶夫在文章中证明了法西斯德国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苏维埃国家。^①

1933年8月4日的《消息报》转载了一篇英国媒体采访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报道，文章题目直指主题——《德国部长鼓动反对拉巴洛条约》。采访中，戈培尔细数了犹太人在德国“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说了下面这段话：“是谁迫使德国签订了停战协议？犹太人拉特瑙。是谁和布尔什维克签订了拉巴洛条约？犹太人拉特瑙。”据此，《消息报》的评论员写道：“我们对戈培尔在采访中表现出的这样一个事实很感兴趣，一位德国部长、政府官员，居然将签订拉巴洛条约视为对德国的背叛。顺便提一句，签订拉巴洛条约的不仅有犹太人拉特瑙，还有天主教徒维尔特。……这位部长声称，苏德之间的条约是德国的灾难，应当予以废除。”^②第二天，《消息报》刊登了德国官方的声明，对此次采访予以否认，并称《消息报》据此采访报道而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③

面对苏德关系的恶化，两国已经不可能再延续魏玛时期的友好关系。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德国已经从苏联的合作伙伴变成苏联最危险的敌人。1933年底筹备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克利斯廷斯基向斯大林秘书处提交了一份题为《1930—1933年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报告，总结出如下关于德国的结论：

(1) 1月30日，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德国掌权，它的对外政策纲领是明显反苏的；(2) 国家社会主义党上台后，苏德关系直接进入一个新时期；(3) 苏德关系的拉巴洛时期已经结束，苏德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不可能放弃反苏侵略政策。^④

来自法西斯德国方面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引起了苏联的关注。1933年

①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фашизма// Правда.1933. 23 июня.

② Германский министр агитирует против Рапалль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Известия. 1933. 4 августа.

③ Сообщение агентства Вольф// Известия. 1933. 5 августа.

④ АВПРИ. Ф.05. Оп.13. Д.81. Л.179-183.

12月29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В.М. Молотов）和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М.М. Литвинов）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中，给苏德关系作了明确定位。莫洛托夫指出：“迄今为止，苏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追求和平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基础之上的，我们至今仍完全坚持这种原则。而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党所采取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同我们的原则背道而驰，他们的政策充斥着反动的欲望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同加强德苏友好关系相左。同样，我们也认为，这样的政策不会使德国有一个伟大的未来。”^①

李维诺夫在发言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苏德关系。他列举了德国政府的种种反苏劣迹，指出是德国的反苏行为导致了苏德关系的破裂，而德国却经常将破坏两国关系的罪名强加到苏联头上：“当然，我们对德国政权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当然对德国同志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最不能因感情支配政策而受到指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确能够同无论何种政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即使它是法西斯政权。这不是问题的要点所在。我们不干涉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内政，我们与德国的关系不是由它的内政而是其对外政策所决定的。”正是法西斯德国所奉行的这种反苏性质的外交政策迫使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李维诺夫指出，“我们希望同德国保持与别国一样的良好关系，……我们对德意志民族没有任何恶意，对他们的领土和人民的权利也没有丝毫侵犯之心。不仅我们自己不会去侵犯别人，我们也绝不会鼓励其他国家有这样的想法。”然而，苏方也期待德方有相应的回应：“我们希望德国也能有同样的想法……”^②

斯大林在1934年1月26日联共（布）十七大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的相关内容，可以被看做是苏联官方将法西斯德国作为苏联潜在的军事敌人的形象最终确定下来。1月28日的《真理报》全文刊登了斯大林的报告，其中提到：“毫无疑问，肯定会走向一场新的战争。……法西斯主义现在俨然成了好斗的资本主义政治家中最为流行的商品。……这里不仅是指一般

① Тов. В. М. Молот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авда. 1933. 29 декабря.

②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наших задачах// Правда. 1933. 31 декабря.

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首先是特指德国法西斯，他们被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称是不对的，因为任凭你多么细致地去发掘，也找不出一丝社会主义的因素。”^① 鉴于法西斯在德国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强调，欧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法西斯德国作为苏联敌人的形象在苏联的媒体上也最终被确立。

1934年，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去世，希特勒集所有大权于一身。1935年1月28日，莫洛托夫在苏联第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做政府总结报告时谈到：“我们不能对纳粹上台后苏德关系中的变化熟视无睹，苏联仍然想继续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众所周知，苏联急切地希望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其中也包括实行法西斯制度的国家。然而，近期苏德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严重困扰。……我们毫不隐藏自己对德意志民族的深深敬仰之情，它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不仅要向大民族，也要向小民族表达苏维埃政权的崇高敬意。不仅要向苏联人民，也要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达苏维埃政权的崇高敬意。”^②而法西斯德国却没有这样对待苏德关系。

法西斯德国的对外政策日渐嚣张，1935年3月16日起，希特勒重新征收军税，拒绝履行凡尔赛和约。在这样的情况下，1936年，莫洛托夫又谈到了苏德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希望同德国建立比现在更好的双边关系，毫无疑问，这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但是这一愿望的实现不仅有赖于我们，更有赖于德国政府。”^③这表明苏联有试图改善苏德关系的意愿。

1936年3月7日，法西斯德国不顾《洛迦诺公约》的规定，将军队开进了莱茵河左岸，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德国依旧采取了绥靖政策，希特勒再次显示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意。^④

1936年3月14-19日在伦敦举行的国联大会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

① Отчётный доклад т. Сталина XVII-ому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о работе ЦК ВКП(б)// Правда. 1934. 28 января.

② Отчётный доклад тов.Молотова о работ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VII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СССР// Правда. 1935. 29 января.

③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растание угрозы войны и наша политика// Правда. 1936. 11 января.

④ Германия расторгла Локар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Правда. 1936. 8 марта.

维诺夫在以题为《为了在欧洲建立真正的和平》的发言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在威胁德国……”，并以苏维埃国家的名义，希望改善苏德关系。^①

西方国家的一味纵容，使得法西斯德国的气焰更为嚣张。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共同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真理报》这样评价反共产国际协定：“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无非是德日之间达成的军事上的共识。这是个德日侵略者准备好的战争协定。”^②

尽管国际局势日益复杂，莫洛托夫1936年11月29日在第八届全苏非常代表大会（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VIII Всесоюзны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上宣布，苏联的对外政策不会改变，苏联对德国政府和日耳曼人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改变，“我们对于伟大的日耳曼民族除了友谊与敬重之外没有其他的感情，但是法西斯分子的得势就是要将德国归入‘优等’民族之列，实际上，是‘当代的吃人民族’。”^③

面对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苏联政府强调，苏联有义务保障欧洲的安全，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呼吁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然而，西方的“民主国家”却没有支持苏联的这一呼吁。1938年9月29-30日，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法西斯德国成为欧洲的主宰，同时也标志着英法的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慕尼黑协定》使希特勒看透了英法的虚弱，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于欧洲大陆。1938年10月1日，德国开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0月4日，《消息报》上刊登文章，向苏联人民报告了党和政府在苏台德问题上的态度：“苏联的态度和立场非常明确，对于英法在‘团结欧洲和平’的旗号下鼓励侵略者的政策完全不感兴趣。”报纸还引用了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讲话内容：“苏联政府很自豪自己没有参与实施这种政策，并坚定不移地遵守着这两个给所有民族带来和平的条约原则，^④今后也不会偏离于此。苏联政府坚信，在此种局势之下，要保障真正的和平和国际正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苏联的宣传机器极力强调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对待德国态度的分歧和区别：“如果说苏联政府的这几

① За создание подли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Правда. 1936. 19 марта.

② Германо-Япон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Правда. 1936. 26 ноября.

③ Речь тов.Молотова о нов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равда. 1936. 30 ноября.

④ 即国联章程和布莱恩—凯洛格条约。

句话中已经表明苏联的政策、维护和平和对身负国际使命的忠贞，那么肢解和掠夺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使英法袒护法西斯侵略者的政策昭然若揭。”^①

1936-1938年苏联大清洗时期，加在“托洛茨基分子”头上的一条罪名就是“勾结德国法西斯”，可见纳粹德国是被看做是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的仇敌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耶夫之流不仅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同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而且和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法西斯敌特分子和间谍有直接联系。”^②苏联的这种政治宣传让人感觉到，苏联不仅在外部面临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在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危机，这样，苏联宣传机器时刻提醒苏联人民牢记德国法西斯是苏联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德国作为苏联敌人的形象得到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英法和美国的报刊使用挑拨离间的伎俩，故意放大苏联对德国的仇恨，无故挑起苏德之间的事端。”“这些报刊歇斯底里地叫嚣，德国会入侵苏维埃乌克兰，拥有70万人口的所谓的喀尔巴阡山乌克兰已落入德国人手中，而且最迟不会超过今年春天，德国人就要将有着3000万人口的苏维埃乌克兰并入所谓的喀尔巴阡山乌克兰。”^③在此，苏联领导人将苏德之间的矛盾归结为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拨离间。

实际上，到1939年初，在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法西斯德国都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随时可能挑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尽管如此，苏联到此时采取的态度依然是最大限度地避免卷入战争，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包括法西斯德国在内。1939年5月31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国际关系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发言。在发言中，莫洛托夫强调，继续执行苏联一贯坚持的两方面的政策，一方面，要遏制侵略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同所有国家的外交关

① Политика премирования агрессора// Известия. 1938. 4 октября.

② Врагам народа нет пощады// Спутник агитатора. 1936. №.16. С.1-2.

③ Отчётный доклад т. Сталина на XVIII-ом съезде партии о работе ЦК ВКП(б)// Правда. 1939. 11 марта.

系。从苏联自身的利益考虑，法西斯德国极有可能成为被苏联遏制的对象，也有可能成为苏联的潜在合作对象。^①

日丹诺夫在 1939 年 6 月 29 日的《真理报》上表明了自己的“个人观点”，他严厉抨击英法同苏联的消极谈判：“英国和法国政府不愿和苏联签订平等条约，而企图为自己同侵略者达成交易铺平道路。”^②

不难看出，上述这些举动可谓是苏联对德外交政策和宣传路线转变的前奏。

苏联报刊和其他媒体从 1933 年开始便大量报道德国的一系列负面消息，比较常见的关于德国的主题有：政治和经济危机、希特勒分子反对共产党的离间活动、共产党人为反对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平等而举行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各种具体的自杀事件，以及种种社会不良现象，如：同性恋、卖淫、传播淫秽书籍等等。苏联媒体通过这些事件的报道，向苏联人民展示了一个正徘徊于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十字路口的千疮百孔的德国。对于德国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希特勒的上台、国会纵火案、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被法西斯枪杀、德国的军事化进程等等，苏联媒体都予以详细报道。苏联媒体还积极揭露和批判法西斯德国的反苏反共倾向。

1936–1939 年德国法西斯在西班牙的暴行成为这一阶段苏联媒体关注的焦点。报纸的报道还配以西班牙战场上的德国军队的照片和在弗朗哥叛军中服役的德国坦克的照片。除了文字报道之外，苏联媒体还运用形象的漫画方式，通过讽刺的手法揭露法西斯德国的丑恶嘴脸，批判和讽刺纳粹的卑劣行径。

综上所述，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德国形象在苏联传媒中已经完全被视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欧洲战争的策源地、世界和平的最大敌人，毫无疑问，也是苏联的敌人。当然，不容忽视的是，纳粹上台以后，苏联媒体对德国纳粹分子和普通群众进行了区分。面对法西斯的暴政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前者为苏联人民所深恶痛绝，而后者则得到苏联人民的同情，这是苏联媒体关于德国宣传的一大特征。

①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ССР// Правда. 1939. 1 июня.

② Английское и француз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е хотят рав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с СССР// Правда. 1939. 29 июня.

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治宣传中的 “去反法西斯化”特征（1939.8-1941.4）

苏联对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宣传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苏联政府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本国的外交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变又直接影响到苏联传媒中德国形象的塑造。

1939年8月21日，苏联媒体上第一次出现关于苏德关系转变的报道。随后，苏联媒体开始重新定位德国形象。《真理报》8月21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苏德签订经济互助条约的消息，并对此事件作出了评价：“经过长期谈判，8月19日在柏林成功签订了苏德之间的贸易—信贷协议。……在两国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之下产生的这个协议，……可能不仅是苏德之间经济关系进一步改善的重要一步，也是苏德政治关系缓和的重要一步。”^①三天之后，《真理报》公布了苏德之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并刊登了条约的内容，称“苏德之间的敌视已到尽头，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上的差别不应该也不会成为两国间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障碍。苏联和德国人民的友谊曾因苏德两国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而一度陷入绝境，而今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得到发展和深化。”^②

从这时起，上至苏联主要领导人，下至苏联媒体，都一改过去的那种反法西斯的宣传口径，对德国的宣传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向，并把矛头指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承认，在我国曾有一小撮目光短浅的人，沉迷于简单的反法西斯鼓动，却忘记还有我们的敌人——‘西欧政治家们’别有用心的挑拨。”^③

从1939年秋天开始，苏联媒体上的德国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

① К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ому торгово-кредитному соглашению// Правда. 1939. 21 августа.

②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Правда. 1939. 24 августа.

③ О ратифик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й договор о ненападении// Правда. 1939.1 сентября.

“苏联人民的敌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又一跃成为苏联的“友好经济伙伴”。1939年9月29日,《真理报》头版刊登了双方签订《苏德友谊和边界合约》的消息,并刊登了合约全文,第2版上刊登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致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信和苏德边界地图,在信中,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重申了大力发展苏德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的愿望。^①1940年2月11日,两国签订了经济协议,苏联媒体极力向群众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所在:德国为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料生产国提供了巨大而广阔的市场。^②德国再次被证明是苏联较为有利的经济合作伙伴。

为展现苏德再度成为经济合作伙伴后所取得的成就,苏联媒体上出现了关于苏德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大量报道,如1940年1月21日开通莫斯科至柏林的空中航线;科尼斯堡(Кёнигсберг)(加里宁格勒的旧称)和莱比锡(Лейпциг)交易会上苏联展厅所取得的成就;德国教育部长为苏联知名学者举行午宴;俄国音乐之父格林卡的歌剧《伊万·苏萨宁》(Иван Сусанин)在柏林歌剧院首演;作为对此次演出的回访,德国作曲家瓦格纳(Вагнер)的歌剧《瓦里基尔》(Валькирии)也登上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③

自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以来,苏联媒体积极报道战争局势。读者们除了可以通过媒体上专门的军事动态栏目来了解战局进展和德军所取得的胜利之外,还可以通过专业的军事分析,了解战争的性质和特征。如《真理报》在1940年5月至9月间在《读者之友》专栏(В помощь читателю)上刊登了一系列军队指挥官的文章:《现代战争中的空降兵》(Воздушные десант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е)、《西线两周战事》(Две недели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Западе)、《装甲坦克在西欧集结》(Действия бронетанковых соединений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西线的空军行动》(Действия авиации на Западе)、《漂浮的坦克》(Плавающие танки)、《现代战争中的海军舰队》

①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Германно-Совет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о дружбе и границе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ией;Занв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от 28 сентября1939 года// Правда. 1939.29сентября.

② Коммюнике о заключении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и СССР// Правда. 1940. 13 февраля.

③ 参见《真理报》1940年1月22日第6版;1940年8月14日第4版;1940年8月26日第5版、27日第5版;1940年11月23日第4版。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й флот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е》、《现代战争中空军的作用》（Роль ави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е），等等。^①另外，苏联媒体还从德文报纸上转载类似的文章，如《卡多夫海军少将论德国舰队的作用》（Контр-адмирал Гадов о роли германского флота）。^②这些文章都无一例外地高度评价了德国的军事潜力，认为德军是这一时期参战国中较有实力的军队。先前关于德国国内民不聊生、社会不良现象、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法西斯的野兽行径、各种形式的歧视、反苏的挑拨离间等等负面消息，似乎一夜之间都从苏联的各大媒体上销声匿迹，或者把这些社会阴暗面说成与德国毫不相干或者是正常现象。至于德国的资本主义剥削现象，《真理报》也将其解释为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存在的普遍现象。^③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真理报》关于德国的文章和报道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国内状况（党的生活、反动立法、政治生活）；2.德共活动（德国工人运动）；3.与德国有关的反法西斯运动；4.科学文化和体育事业；5.经济问题（工业、农业经济）；6.苏德关系（外交、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7.国际形势与对外政策；8.战争准备和军事行动（国民经济军事化、军队发展、战争准备活动）；9.社会问题（失业、犯罪、自杀、卖淫、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妇女儿童、青年问题）。从各阶段的报道内容来看，1939年7月之前，苏联媒体多报道德国的社会阴暗面、法西斯的残暴行为以及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对德国基本持否定态度。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至1941年4月，苏联媒体上关于德国的报道集中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意避谈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立。换言之，这一时期苏联媒体对德国重打“友谊牌”，在德国形象的塑造上侧重其“合作伙伴”身份，淡化两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即使在谈到国际战争局势时，也往往避重就轻，仅从军事力量上对德国加以评价，且为德国塑造了一个军事强国的形象，媒体对德国的宣传态度也随之转变为中立或肯定。

① 参见《真理报》1940年5月24日第4版；5月26日第5版；5月29日第6版；5月31日第5版；6月4日第6版；7月28日第3版；8月19日第5版。

② Контр-адмирал Гадов о роли германского флота// Правда. 1940. 5 сентября.

③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и условия труд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правда. 1940. 26 июня.

《真理报》对德国的关注集中于纳粹上台的最初两年，以及1939-1940年，且报道的高峰期主要集中于1939年8月至10月，也就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头几个月，《真理报》关于德国的报道数量的增减完全取决于苏德关系的好坏程度。

四、苏德战争前夕苏联宣传中德国“敌人”形象的回归 (1941.5-1941.6)

德国在苏联宣传中的友好形象未能长期保持下去，苏德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再次发生了变化。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向毕业生们发表了演讲。^①斯大林在演讲中指出，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屡屡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德国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组织先进的军队，其次是因为同对手英、法相比，德国为战争作了政治上的充分准备，即在发动战争之前争取到了相当数量的可靠盟友和中立国。同时，斯大林指出，军队实力有强弱之分，但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

① 俄罗斯史学界关于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对红军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演讲有过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对这场演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也有学者怀疑斯大林是否在演说中表达过向德国宣战的意图。俄罗斯历史学家涅维仁（В.А. Небезин）、维什廖夫（О.В. Вишнёв）、别济姆斯基（Л. Безыменский）等围绕斯大林1941年5月5日的演讲作了深入研究。涅维仁认为斯大林的这次演讲，是苏联宣传政策再次转向的标志。参见Вишнёв О.В. Речь И.В. Сталина 5 мая 1941 г.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С. 77-89; он же. Западные версии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И.В. Сталина 5 мая 1941 г. о материалах герман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1. С.93-115; он же. Накануне 22 июня 1941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очерки. М., 2001; Безыменский Л. Что же сказал Сталин 5 мая 1941 года?// Новое время. 1991. №.19. С.40; Мельтюхов М.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редысто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85-1995 гг.).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 ... к.и.н. / Гос. акад. сферы быта и услуг. М., 1995; он же. Споры вокруг 1941 года: опыт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осмысления од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Готовил ли Сталин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ую войну против Гитлера? Не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ная дискуссия.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 М., 1995. С.92-109; он же.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ая - июня 1941 года о событиях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2. С.70-85; Небезин В.А. Речь Сталина 5 мая 1941 года и апология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2. С.70-85; он же.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Сталина 5 мая 1941 г. и поворот в пропаганде. Анализ директив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Готовил ли Сталин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ую войну против Гитлера? Не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ная дискуссия.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 М., 1995. С.147-168.

德国军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纳粹政府在战争初期打着冲破凡尔赛和约束缚的旗号，获得了大量支持，而现在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转变，成为侵略战争，以侵略他国为目的的战争是注定不会取得胜利的；从军事角度来看，纳粹德国的海、陆、空三军并无过人之处，士兵已经丧失了战争初期时的士气。因此，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完全能够被打破的。^①

这次演讲，是自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来，斯大林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价德国的侵略行为，将纳粹德国视为自我膨胀的侵略国，这是苏联官方对德国政治宣传态度转变的开端。

斯大林5月5日演讲之后，1941年5月至6月间，党和军队高层领导人开始筹划关于德国的相应宣传指令。红军政治宣传总局于5月出台了一道指令，即《关于近期红军政治宣传的任务》（О задач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并于6月20日获得讨论通过。该指令指出，目前的宣传内容过于保守，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宣传内容贫乏，过于形式化，不能满足当前局势的需要。宣传人员没有继续揭露和批判法西斯主义及纳粹德国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的反动政策，有时甚至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德国军队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阐释。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适时转变苏联的政治宣传路线，并以实际行动保障本指令得以贯彻实施。^②

1941年6月初，联共（布）中央也出台了《关于当前的宣传任务》（О текущих задачах пропаганды）的指令。该指令重申了斯大林5月5日演讲的内容，并指出德国军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必将走向失败。^③

在对1941年5-6月间苏联各主要政治宣传刊物进行考察后不难发现，苏联报刊上的宣传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保家卫国的宣传鼓动又重现报端。《真理报》在斯大林5月5日演讲后的第二天发表社论，告诫全体苏联公民：“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苏联人民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④ 扎伊采夫（Я. Зайцев）和卡列金（К.Каретин）在他们的文章中谈

① Вишнёв О.В. Речь И.В. Сталина 5 мая 1941 г.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С.77-89.

② 内容参见Две директивы 1941 г. о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ой подготовке СССР к войне//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за 1995 год. М., 1997. С.203-207.

③ Там же.

④ Привет выпускникам военных академий!!! Правда. 1941.6 мая.

到了群众对宣传讲座日益增加的需求，并提出向群众宣传的新任务：“在当今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全面加强党纪，动员群众的创造积极性以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应当更加广泛地开设有关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军事史以及介绍祖国伟大统帅的讲座。”^①尽管作者在文章中并未直接提到法西斯德国，但是谈到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历史。

此外，《真理报》上也间或出现国际工人运动、国际革命战士救援会（МОПР）等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连的组织的相关内容。^②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1941年3月16日的《真理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享誉世界的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С. Эйзенштейн）、苏联作家巴甫连科（П. Павленко）、演员切尔卡索夫（Н. Черкасов）和阿布里科索夫（А.Абрикосов）凭借三年前拍摄的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③（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而获得了斯大林勋章。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因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含义，在苏联1938-1939年的反法西斯宣传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9年8月以后，随着苏德关系的升温而退出苏联人民的视线。此次该电影主创人员获得表彰的事实显示出苏联宣传态度的又一次转变。

这一时期的苏联报刊上也提到了“积极进攻”的思想。1941年5月31日的《真理报》上写道：“我们一直在培养红军的进攻精神。当然，必须学会构筑防线，使再强大的对手也不能逾越它。防御思想也应当包含进攻的思想。”^④5月15日《消息报》的社论也写道：“苏联正站在即将来临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风口浪尖上。国际局势充满变数，但苏联人民不惧怕，因为

① Лекционн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растущие запросы масс// Правда. 1941.12 июня.

② 参见《真理报》1941年3月18日，5月7日和5月8日的报纸。

③ 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由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于1938年拍摄完成，主演是苏联著名演员、人民艺术家切尔卡索夫。影片讲述的是，13世纪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诺夫哥罗德人民，在冰封的楚德湖上击溃了入侵俄罗斯的神圣罗马帝国条顿骑士团。这是一部具有浓厚政治隐喻的影片，它是在斯大林的直接要求下拍摄制作的，目的是使苏联人民时刻警惕德国人的侵略。该片在摄制完成后至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充分发挥了其反法西斯的宣传作用。而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该片就被压制且被禁止在苏联影院上映，直到苏德战争爆发，该片才得以重见天日，又在苏联影院上映，号召苏联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入侵。

④ Моральный облик большевика// Правда. 1941.31 мая.

布尔什维克具备了宝贵的性格特征——积极进攻、英勇善战的精神。”^①

除了党报和其他各种面向大众的宣传媒体之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向军队宣传的喉舌，《红星报》也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评价。5月18日的《红星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系统掌握马克思—列宁的战争与军队学说》（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овладевать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 учением о войне и армии）的社论，社论说：“无论是在精心准备的讲座上，还是在同志式的讨论会上，抑或是在挑选文学作品的时候，政治宣传部门和政治部的副指挥员们要时时刻刻关心指挥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的战争与军队理论的情况。……要坚持不懈地在思想上武装军队的指挥人员。”^②5月20日，《红星报》又刊登了一则关于宣传鼓动的简讯，该简讯出自《红星报》特约记者、高级政治指导员杰伊干（И. Дейген）之手。作者在文章中谈到了宣传机构每天向战士们提供国际问题方面信息的不足之处：面对战士们对各参战国通讯社发布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的质问，很多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宣传人员感到很困惑，这些宣传人员必须自己先弄清当前的国际状况。作者提出，政治宣传部门应当组织他们学习军事和国际局势述评，除了基层宣传人员之外，还要安排经验更加丰富的政治工作者来负责宣传活动。^③6月22日，《红星报》刊登了科诺瓦洛夫（Н. Коновалов）教授的文章《战争心理学》（Психология войны），这是报纸刊登的第一篇讨论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的文。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红星报》积极报道苏军官兵大力学习德语、部队指挥人员和军事院校的学员们用德语作报告、办文艺晚会、出黑板报的情况。^④

尽管上述主要苏联报刊中出现了有关战争和德国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文章并不多，且行文表述十分谨慎，丝毫没有出现直接诋毁苏德关系的语句。苏联在遭到法西斯德国入侵的前几天，即6月14日，仍在其最主要的宣

① Драгоценные черты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Известия. 1941. 15 мая.

②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овладевать марксистско-ленинским учением о войне и арми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941.18 мая.

③ 具体内容参见《红星报》1941年5月20日的报纸。

④ 具体内容参见《红星报》1941年4月4日、9日、10日、16日、17日、18日、24日、29日，5月24日，6月1日、15日、29日的报纸。

传工具《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塔斯社的报道，称苏德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是牢不可破的，并继续宣传和平政策，摆出各种理由为德国即将入侵苏联、苏德开战在即的传闻辟谣：“1、德国没有向苏联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建议签订任何更为密切的协议，因此，没有必要再讨论此事；2、苏联掌握的信息显示，德国会像苏联一样，坚定不移地履行互不侵犯条约的各项条款，鉴于此，苏联各界认为，德国破坏条约入侵苏联的传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而近期德军从巴尔干战役中撤出，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频繁调动是有别的原因，和苏德关系并不相干；3、出于国家的和平政策，苏联一直遵守并打算继续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各项条款，鉴于此，关于苏联已经作好同德国开战的准备的传闻并不属实，是在挑拨苏德关系；4、现在正在进行的红军后备役夏季集训，以及即将展开的军事演习，只是每年例行的对预备部队的培训，检验铁路部门的工作，并无其他目的，因此，将红军近期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视为对德国的敌视，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面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以斯大林5月5日在军事学院的演讲为标志，苏联对德国的宣传态度又开始发生了转变，纳粹德国的“敌人”形象又重新回归，但是这种转变是分阶段逐步实施的，即从军事动员开始，逐步扩大到社会动员。然而，随着法西斯德国的突然入侵，这一转变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被打断。自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起，法西斯德国的“敌人”形象又重新回到了苏联的宣传之中。

【Abstract】 In the Soviet Union, with ideology as its top priority, political propaganda, without exception, became mouthpie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express official positions to the masses. Throughout the Soviet-German relation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Soviet-German war in 1933-1941, it has experienced from bad to good then to bad agai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hange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diplomacy had direct imp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erman image. Besides, the German image, deliberately shaped by the Soviet according to their

^① Сообщение ТАСС// Правда. 1941.14 июня; Известия. 1941. 14 июня.

bilateral relations, also had certain influences on the Soviet masses. This paper, based on *Pravda*, the main political journal, attempts to explore relations between changes of Soviet-German relations and evolution of German image in Soviet media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stages, in addition to having a glimpse of Soviet political propaganda means.

【Key Words】 Soviet Political Propaganda, German Image, *Pravda*

【 Аннотация 】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с главенствующей во всём идеологи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также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стала рупором выражения перед народом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зиц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ерм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33-1941 гг. перед началом войны прошли периоды от плох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 хорошим, а затем к ещё более плохим,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 дипломатии дву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казал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здание образа Германии в официальн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в прессе; между тем, сознатель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ый имидж Германии, зависящий от отдаления и сближ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акже имел определён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соци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м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на основ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глав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газе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газеты «Правда» —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ъект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этапн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вязь между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советско-немец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образа Герман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ессе, и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равды» рассмотреть сред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образ Германии, «Правда»

(责任编辑 阎德学)

战略·政策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 ——从战略三角到后现代三角*

波波·罗**

【内容提要】战略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俄罗斯相对力量的下降,使得旧式的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秩序。但与以往的两极秩序不同,中美两国未来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将更加紧密,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会是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的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以“后现代的三角关系”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非常具有“民主化”的特征,是一个比历史上的各种三角关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关键词】俄罗斯 中国 美国 战略三角关系 后现代三角关系

【中图分类号】D81(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157-(25)

引言

“战略三角”在冷战时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而近些年人们对它又

* 本文载于 Bobo Lo, “Russi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Strategic Triangularism to the Postmodern Triangle”, *Proliferation Papers*, No.32, Wint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ifri.org/downloads/pp32bobolo.pdf>

** 波波·罗 (Bobo Lo), 原欧洲改革中心高级研究人员, 曾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俄罗斯和欧亚项目主任。

开始关注起来。乔治·W·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更多地谈论美国的衰落，以及世界权力的东移。^①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崛起令世人瞩目，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实现了复兴，令人们更加期望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出现。在这种新秩序中，美国的单极，将被一种更为公平和灵活的大国安排所取代，即俄、中、美之间的新三角关系。

俄、中、美这三个国家，似乎天然就是三边伙伴的关系。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即世界第二大核武器国家（俄罗斯），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二者共同制衡着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但这仅仅是表面上的逻辑。莫斯科和北京并不想把自己束缚在狭隘的双边联盟关系之中，二者都想与华盛顿靠近，二者都试图在这个三角中巧妙地周旋，以使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

战略三角关系在历史上是有案例的。自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俄）、中、美三角关系这一观念，就显著地体现在东西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战略计算过程之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标志着这一思想进入了黄金时代。尽管这一观念在当代已经不如1970年代那样流行，但它在有关大国关系的论述中还是经常会被提起。

尽管如此，在笔者看来，战略三角这一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战略三角的价值，在冷战时期曾经被夸大过。如今，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又一个世界强国，因此三角关系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理解大国关系的工具。尽管俄罗斯在过去十年，经济财富不断增长，但同中国相比，它的地位还是显得下降了，更不用提与美国的差距了。除非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强国，否则其在北京和华盛顿的眼中，将逐渐被边缘化，而俄—中—美战略三角关系，将不复存在。

那么，取代战略三角关系这一概念的将是什么？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后，取而代之的很有可能并不是一个“多极世界秩序”，而是中美两极。尽管不像冷战时期那种非常明显的两极格局，但世界事务将主要由这两个超

^① 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8; Parag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级大国主导，而第二梯队的国家和众多的国际机构的角色，则是支持或者反对这两个超级大国。这将会导致一种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的新型三角关系的产生。与战略三角关系不同，新型三角关系中的“第三方”将不是中美之外的另一个大国，而是一个由众多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其形式具有不确定性。

一、战略三角关系的性质

我们有必要阐释一下战略三角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战略”并不仅仅指国家的核能力及其相关特征（如战略态势、战略威慑等等）。首先，“战略”是指国家的整体影响力，而这又具有多维特征。核武库当然是一种战略性财富，但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威，以及经济与科技实力、文化和规范的力量，也同样是重要的战略财富。尽管德国和日本不是核国家，但它们对世界的战略影响力是公认的。实际上，当今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比俄罗斯更有影响力，而俄罗斯在很多国际决策机制中却被边缘化了，最明显的就是 G20。

就目标和优先性来说，战略往往都是结构性的、基础的和长期的。战略与策略（tactical）不同，后者主要描述的是短期的考虑，一般都是机会主义的和工具性的。战略往往指对未来的考虑和规划，而不是临时的和反应性的（reactive）政策，它也会用来强调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例如，俄罗斯常常宣称它与中国、印度和欧盟之间是“战略”伙伴的关系。虽然战略伙伴这个词常被过度使用，其本身的含义已经贬值，但它依然是双边关系发展趋势的晴雨表。“战略”与“战略伙伴”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如在形容美中、美俄、俄中这三组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更恰当的用语是“战略”，而不是“战略伙伴”。^①

同样的，战略三角这一概念，其外延要超出核三角关系的范畴。实际上，俄一中一美的核三角关系相比而言并不重要。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在核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失衡——俄美是核超级大国，中国远远落后于俄美。当尼

^① 真正的战略伙伴的含义是，两国对世界有相似的观点，对双边关系有共同的看法，并且具有一致的目标。但这三组关系都未能符合上述标准。

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构思战略三角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两人有更多的考虑：这个三角主要关注的是大国均势，也关注更大意义上的地缘政治考量。^①几乎所有的三角关系，都是理想性的，而非现实性的，更不会是战略性的。例如，俄罗斯不仅会打所谓的“中国牌”以处理其与西方的关系，也会利用日本、印度和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还会用欧洲来制约美国的权力。但这样的三角关系都是幼稚的和不切实际的，注定要失败。一个有效的三角关系，需要三方拥有同等的，或者至少具有足够匹配的实力，并且三方都能够在互动中彼此施加巨大的影响。但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已经找不出这样的例子来了。

二、俄罗斯—中国—美国：三角关系的演变

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三角关系，源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1949年提出的“一边倒”政策，即倒向苏联，反对美国。^②毛泽东的选择，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历史的考虑，反映的是苏、中两国共产党之间兄弟般的关系。但他的主要动机是实用主义的。当时中国依赖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且找不到其他的援助国，尤其是当时的美国在奉行激烈的反共政策，因此毛泽东几乎没有别的选择。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军事介入支持平壤，使得中美之间的冲突与对立持续了20年之久。然而，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并未导致莫斯科、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形成一种真正能起到作用的三角关系。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冷战时期的政治，极其明显地体现在美苏之间的两极对立。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实力，远远大于第三国。而中国当时只是一个二流国家，还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第三者，因此不具备构成一个战略三角的主要条件。第二，中国在遭受了外国列强“一个世纪的羞辱”^③之后，国力非常

① 参见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p.720-731.

② Mao Zedong,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speech commemorating the 28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30 June 1949. 参见 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4/mswv4_65.htm

③ 中国“一个世纪的羞辱”，指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经受外国入侵和占领，国内面临着内战，以及经济、社会和自然灾害。

虚弱。这使得中国无法奉行独立的、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毛泽东的当务之急，必然是国内问题：巩固共产党的统治；重建经济，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遭受内战和日本的破坏长达数十年；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当时，毛泽东并不想成为协助苏联制衡美国的战略伙伴，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即使是在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中，中国之所以出兵，也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感知（由于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中国对自身安全格外关切），以及与金日成政权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而非代表苏联的利益。^①第三，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的全盛时期，两国关系也是有问题的。中国需要依赖苏联的援助以实现国家重建，而就在此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矛盾，以及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1950年代后期，这些问题明显变得严重起来。1960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1390位苏联顾问，两国间矛盾达到高潮。中国人开始怀疑苏联的动机，而苏联人又瞧不起中国的落后，他们认为中国人忘恩负义，这使得两国完全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战略合作以抗衡美国。^②

两国间的矛盾，使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前20年，三角关系仅仅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一个现实的议题。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三角，也是两两排斥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苏联和美国之间，每一个国家都非常厌恶其他两国。一方利用另一方来向第三方施加压力的想法，几乎是一种空想。

（一）尼克松与三角关系的恢复

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后，三角关系才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这次访问体现的是美国战略思考的一次重大变化。当时的美国面临着越南战争的压力，国内的反战游行此起彼伏，而且苏联的核武器发展迅速。这使得尼克松看到了与毛泽东进行接触的机会。美国的考虑是，联合中国压制苏联，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特别是减少对北越的支持，以及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达成初步协议。^③尼克松和基辛格已经意识到，中国人正准备

① Jonathan Fenby, *The Pengu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The Fall and Rise of a Great Power, 1850-2009*,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pp.366-368.

② 中苏关系之所以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相互反感。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就是苏联对中国核武器项目的援助。参见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6, p.559.

③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op. cit.*, pp.713, 730-731.

改变对美国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苏关系紧张的升级（包括1969年的一系列边境冲突），^①以及中国对西方贸易、技术和投资的需求，使得北京放弃孤立主义，放眼世界，寻求合作。

197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是三角关系的高潮时期。中美的接近，确实影响了苏联的政策。莫斯科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问题上不再拖延，并在此后的全欧安全框架的建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最终在1975年达成了赫尔辛基协议）。一般而言，1970年代的美苏关系，是一个缓和的时期。非正式的“中国牌”的存在，证明了战略三角关系的存在，尽管三国的实力还极端地不平等。

然而，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一时期的三角关系的影响是被夸大了。

首先，中美的接近，充其量也只是部分地改变了苏联的行为。这仅仅表现为，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作了让步，即减少了在西部边境的军力部署。但是在越南战场，并没有遏制住北越的优势，由于美国在越南过早撤军，反而加快了河内的胜利。随着越战的结束，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影响戏剧性地上升了，而中、美在这里的力量则受到削弱。中美之间的互动，也没能阻止苏联介入非洲、拉美和阿富汗等地区。同时，由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临时协定》（SALT I）的签订，苏联正式获得了与美国的战略平等地位。^②

其次，尽管三角关系使得苏联软化了对美政策，但苏联并未软化其对中国的政策。例如，尽管苏联在欧洲的兵力部署减少了，但在中苏边境的兵力反而逐步增加，直至到1980年达到45个师的高水平。无可否认，1969年冲突以后，中苏的敌对关系没有再次升级为军事对峙。但这未必是由三角关系带来的，因为当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中苏之间的战争威胁已经过去了。

再次，其实无论如何，美苏关系的缓和一定是会发生的，只是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缓和的进程在基辛格1971年7月的首次访华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自1969年以后，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一直在进行，并且美苏在

① 苏联甚至考虑，当它遭到中国军队大规模侵犯的时候，可以使用核武器。Igor Sutyagin, “The Soviet-Chinese conflict of 1969”, in Igor Sutyagin, ed., *The Rol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Its Possible Future Missions*. www.otan.nato.int/acad/fellow/94-96/sutyagin/02-03.htm

②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London: Allen Lane, 2006, p.212.

很多实质性领域达成了协议。^①

最后，三角关系对苏联政策的影响其实很短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12月决定入侵阿富汗，不仅标志着缓和的结束，也说明当时“中国牌”对莫斯科地缘政治战略的制约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冷战时期战略三角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部分原因是它的防御性精神所致。莫斯科试图使中美接近对其造成的影响最小化，而华盛顿与北京则彼此希望对方能够抑制苏联的野心。但三角外交的成效并不是那么好，主要原因是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占有巨大的优势，而且二者的国际分量都非常之重。而中国在两极格局中，其直接影响力仅仅是边缘性的。中美之间关系的接近，的确会让莫斯科慎重考虑其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但并不能使苏联的政策发生美中所期望的重大改变。

（二）叶利钦和中国牌

冷战的结束似乎宣告了三角政策的灭亡。甚至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也是现实主义的死亡。^②俄罗斯尽管实现了民主化，但却很虚弱，美国似乎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霸权地位，中国要面临的是国内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未来的国际政治将更多地体现为合作性，而非竞争性。

然而，1990年代是一个奇怪的十年。尽管美国取得了空前的战略优势和规范优势，但地缘政治制衡这种观念依然很流行，这在克里姆林宫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美国拒绝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造成了俄罗斯的失望，并对美国严厉指责。俄罗斯战略财富的丧失，使得其政治精英较为沮丧，在这种情况下，三角观念越来越受到俄罗斯方面的青睐。

在这个十年中，多极世界秩序这一观念越来越突出。这基于三个前提：第一，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不仅对俄罗斯来说是威胁，而且这也不利于俄罗斯有效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第二，俄罗斯非常虚弱，难以单独挑战美国的“霸权”，因此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第三，俄罗斯如果想要在国际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好的方式，就是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与平衡者的角色，

^①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291.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pp.252-253.

特别是在中国与美国之间。

上述思维使得叶利钦政府开始发展与北京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一动机是内在的。当时俄罗斯需要缓解其对中苏争议边界的担忧，也需要控制中国向俄罗斯远东地区移民，还需要增加向中国出售武器，以保存其军工综合体。但俄罗斯改善与中国关系最重要的驱动力，则是它希望中国成为针对美国霸权的战略平衡力量。从本质上讲，俄中所提出的“21世纪的多极世界秩序”^①的口号，复活了三角观念，同时还给人以远离冷战时代地缘政治的感觉。

然而，莫斯科想打“中国牌”以恢复三角思想，完全是失败的。尽管中俄关系发展良好，但北京拒绝成为叶利钦政府大博弈之中的顺从的伙伴。事实正好相反，在这十年里，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中俄经贸关系。^②同时，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尽管在核心议题上，并未能使西方让步，如北约东扩问题。

1990年代三角观念失败的原因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相似：三方之间不均衡的关系。三方之中，总是有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是最弱的，过去是中国，现在是俄罗斯。美国压倒性的优势、俄罗斯战略和经济实力的下降，以及中国的实用主义政策（即主要关注于经济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制衡），这些意味着，到20世纪末的时候，战略三角关系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实用性功能。

三、三角观念的再次出现

近年来，三角观念再次出现，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个理解国际事务的可信的概念，尤其是理解俄、中、美关系。这一概念之所以重新流行起来，

^① Boris Yeltsin and Jiang Zemin, “Russian-Chinese Joint Declaration on a Multipolar Worl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Moscow, 23 April 1997, www.un.org/documents/ga/docs/52/plenary/a52-153.htm

^② 到2003年的时候，美中两国都认为，这是自1972年以后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尽管在1990年代，两国之间曾经有几次危机，如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事件。Susan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07, p.239.

是因为和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到 2008 年秋天的时候，这三个国家的实力更为平等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处理不当，让人感觉到美国衰弱无力又傲慢自大。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飞涨、欧洲反美主义的蔓延、北约的衰弱与分裂，都使得俄罗斯大为获益。俄罗斯得益于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权力东移。自 1991 年以来，这是俄罗斯第一次认为自己能够在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

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加速崛起，^①实力的增强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坚定。在 199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主要采取的是审慎的对外政策，几乎完全集中于内部事务中的重要方面，如经济现代化，以及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1997—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在地区事务中才开始显得积极，并在全球范围内拓展石油和大宗商品的来源渠道，以及寻找新的出口市场。然而，只是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始拓宽外交政策的视野，真正成为在国际共同体中有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的衰弱、俄罗斯的复苏，以及中国的自信，使得战略三角观念的重新出现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三角观念是否正确和有效，还是一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判定，这三个国家各自的外交政策中，有多少是体现了三角观念的特征。

（一）莫斯科的视角

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有很多目标，但最主要的是，重建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俄罗斯想成为所有国际主要事务中不可缺少的一员，成为“地区超级大国”（regional superpower），以及保障其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特殊”利益。^②同时，普京政府也承认，俄罗斯的影响力还非

① 从 2000 年开始，中国的 GDP 以两位数增长，2007 年一度达到 13%，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1/14/content_10658107.htm。到 2009 年，即使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 GDP 增长率依然预期为 8%—9%。

② 列昂·阿伦（Leon Aron）用“地区超级大国”一词形容叶利钦政府对后苏联空间的政策，参见“The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Its Domestic Context”，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8, pp.34-42。梅德韦杰夫在 2009 年 8 月 31 日的电视采访中，曾大谈“特殊利益”，参见 http://eng.kremlin.ru/speeches/2008/08/31/1850_type82912type82916_20_6003.shtml

常有限，俄罗斯现在的投放能力，还不如苏联衰落的时期。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努力寻找战略伙伴，以帮助其制约所谓的美国霸权。因为在当代世界中，美国霸权不再是“无条件的”（no longer a “given”），因此其他大国必然会有更多的机会提出它们的议程。如同 1990 年代一样，建立多极世界的目标，是俄罗斯增强其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多极体系不仅是对两极体系（美国为一方，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的修正^①，而且是形成另外一种战略和国际秩序的共识，其中包括承认俄罗斯是一个领袖国家的共识。

和叶利钦一样，普京也认为，中国最有希望成为俄罗斯成就其大业的合作伙伴。^②理由有很多。

首先，在所有潜在的伙伴中，中国是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在中国完成现代化并成为世界强国之后，这一点将更为明显。

其次，中国是同俄罗斯最为志趣相投的国家。欧盟依然与美国过从甚密，并且需要依赖美国，此外，欧盟还过于分散，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无法帮助俄罗斯实现上述目标。印度也曾经被看做是一个可能的选项，^③但新德里与华盛顿关系的接近，使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法符合俄罗斯的需要。而中国则与俄罗斯一样，都对美国的行为不满，而且二者似乎在很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强大的国家、威权主义、抵制西方的规范和行为。两国之间的志趣相投，这一点对俄罗斯的决策者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再次，有一个防御性的原理，就如格言所说，“接近你的朋友，更要接近你的敌人”（“keep your friends close, and your enemies closer”）。虽然中国不是俄罗斯的敌人，而且中俄对抗也不太可能，但莫斯科对中国的规模及其快速崛起依然感到忧虑。俄罗斯与中国自称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监

① Bobo Lo,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Reality, Illusion and Mythmaking*,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108.

② 尽管梅德韦杰夫目前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有很大影响力，但在主要事务上，普京依然能做决定，这一点无需怀疑。（此文成文时间为 2010 年，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是梅德韦杰夫。——编者注）

③ 1998 年 12 月，时任俄罗斯外长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访问新德里时，提出了“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轴心”这一概念。但由于中国和印度对此缺乏兴趣，这一想法始终没有落实。

督和节制中国。两国对边境地区交通管理的完善，保证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上海合作组织有利于降低两国在中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是，莫斯科之所以对多极世界秩序和三角观念感兴趣，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而非出于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尽管普京时代中俄双边关系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但对莫斯科而言，中国的功能自 1990 年代以来并未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功能是工具性的，即制衡美国，并增强俄罗斯在与美欧交往中的分量。俄罗斯并不想放弃西方，而是重新定义西方，不是欧盟那样的后现代的、法制的和制度化的西方，而是一个更为灵活的、也是传统的“共同的欧洲文明”和大国协调。西方将继续为俄罗斯提供战略、政治、经济、科技和文明上的借鉴。普京的长远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形成中的多极体系中的第三极，或者说建立一种“三极”的世界秩序。在这当中，俄罗斯将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和“独立”的战略利益，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这两个国家的重要的、平等的伙伴。如果普京的这种愿景得以实现，则标志着纯粹的战略三角关系将会达到其最为完美的状态。

然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很多障碍。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充满自信的国家，俄罗斯与中国的差距也在拉大。莫斯科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是，自己沦为为美国或（和）中国的小伙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成功，可能是最坏的结果，这将会导致俄罗斯在安全（对未来远东地区的担忧）、地缘政治（中国对中亚的主导）和心理（一种难以适应的自卑感）上的诸多不利。

莫斯科也对一个恢复自信的美国表示担心。奥巴马政府使美国重新恢复了其国际地位。自 2008 年年底以后，美国的虚弱、俄罗斯的强势，这样的表象已基本不复存在，部分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更替的缘故，部分是由于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干涉所造成的。2008 年 8 月，俄罗斯进攻格鲁吉亚，并承认了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导致了俄罗斯在外交上的孤立。2009 年 1 月，俄罗斯中断向乌克兰输送天然气，这损害了俄罗斯的名誉，欧洲认为它不是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者。全球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其

他任何主要经济体的影响。^①上述情况不仅动摇了莫斯科对自己的信心，也使得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多极世界秩序的理想变得暗淡。

最后要说的是，俄罗斯精英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是三角外交有效运作的一个主要的阻碍。这种偏见已经远远超出了历史、文明和语言的范畴。尽管莫斯科经常大谈东方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但俄罗斯无疑还是相信，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出于一种认识，即认为俄罗斯至关重要的利益都是与西方相联系的。当今莫斯科外交的关注点，几乎全部是继续西方中心主义的，这并非巧合。这些关注点包括，与华盛顿之间达成新的战略裁军协议，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在欧洲安全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阻止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体系，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对西向天然气出口和管道建设的控制，并在伊朗核问题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与美国平起平坐。

（二）北京的视角

就牵制美国这一点来说，北京和莫斯科有共同的利益，但北京并不想积极制衡美国。与其说中国的世界观是温和的，毋宁说中国意识到，如果陷入与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之中，自己将会失去更多。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一直在否认自己存有与美国竞争的意图。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一直在试图提升与美国接触的程度和质量。

北京对三角观念缺乏兴趣，事出有因。最重要的是，北京认为，新的世界秩序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尽管美国声誉不佳，而且其权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美国依然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这一点无可置疑，在未来至少 20 年，它依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中国决策者认为，对抗美国不会有什么好处，因此，不会让中俄伙伴关系影响中美关系。如果对抗美国，只能减少中国的政策选项，束缚自身。在 2002 年 11 月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泽民概括了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并提到了中国的 20 年“战略机遇期”。^②目前，中国还比较落后，面临着国内现代化的挑战，中国还不擅于在全球事

① 有很多原因导致了俄罗斯糟糕的经济，例如国家对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的过度依赖，这使得国民经济对物价波动十分敏感。

② Xinhuanet, “Full text of Jiang Zemin’s report at 16th Party congress (1)”, 17 November 2002,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2-11/17/content_632330.htm

务中发挥突出作用。这些情况意味着北京只是希望一个“和谐的世界”，以便能集中精力于那些实际的利益目标。“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等概念确实展现了中国温和的一面。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认识，即一个积极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影响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也意识到了中俄伙伴关系的限度。就双边关系来说，两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优先考虑。有时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也有很多时候是不一致的。^①例如，中国领导层很清楚，当中美之间出现对立的时候，莫斯科只会提供象征性的政治支持。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莫斯科真正的关注之处在什么地方。“9·11”事件之后，莫斯科赞同美国在中亚部署军队，但普京没有预先通知中国，更不用说向中国征求意见了。2002年美国退出了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而普京却对此表示默许。总体来说，中国的决策者和学者，均清楚地认识到了俄罗斯精英们的西方中心主义。^②当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发展不顺的时候，它就会拿出同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一旦俄罗斯与美国重新接触的时候，中俄关系就会被置诸脑后。例如，“9·11”之后就是如此，莫斯科与奥巴马政府“重启”关系时也是如此。

这并不是一个是否具有善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能力的问题。尽管从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战略和经济财富，但很多人认为它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一个幸运的国家(lucky power)。^③中国人认为，俄罗斯代表的是过去的时代，并且落后于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竞争力，而且也不能算是知识经济。同中国的发展相比，除了能提供某些自然资源(木材、石油和有色金属)，俄罗斯整体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更重要的是，中俄合作在某些重要领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例如军事技术、航天和民用核能

① 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Moscow, Beijing,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Washington: Brookings and Chatham House, 2008, pp.3-4.

② 中国评论家多次提到这一观点。

③ 这是本文作者2008年6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学者之间的谈话。

工业。^①

中国也很清楚，在过去的 10 到 15 年中，中俄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长期以来，俄罗斯帝国和苏联都比中国强大，而到了 1990 年代，两国成了平等的伙伴，之后中国又成为了强大的一方。尽管俄罗斯有几千枚核武器，而中国只有几百枚，但在其他几乎所有领域，北京都要更胜一筹。

中国的定位，可以被概括为“跟随强者”（go with strength）。尽管很多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甚至是在奥巴马时期）的确决心遏制中国，但他们也承认，美国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目前，美国有着最先进的科技，中国的全球金融资产中的最大份额是投资在美国的（估计有 1.5 万亿—1.6 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美国的军舰间接地保证了中国 80% 的海上原油进口的安全。中国也默认，一个强大的美国是国际稳定的重要保证，在东北亚，美国的存在是制约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也可以制约多变的朝鲜。一个自信（但不是过度自信的）的美国，是北京所说的“和谐世界”的关键。^②

从更广义上讲，中国采取的是战略包容政策，而非战略制衡政策。中国“与所有国家为友”的努力，是与“和谐世界”的逻辑完全一致的。中国人意识到，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并且担心中国的野心。^③因此北京努力与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战略三角是相当狭隘的，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束缚，因为中国奉行的是综合的、多方位的外交政策。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变动时期，中国有着相当大的战略灵活性，有很大的愿望参与其中。而战略三角关系将使得北京不

① 俄罗斯的军售情况，已经从 2005 年的 24 亿美元降到了 2006 年的 2 亿美元，并且没有主要的购买国家了。俄罗斯对中国核工业的参与，目前仅有一个地方。而现在北京主要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第三代技术。同时，中国的航天工业几乎全部是国产的。Bobo Lo, *Axis of Convenience*, *op. cit.*, pp.85-86.

②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Washington: RAND, 2009, p.35. 参见http://www.rand.org/pubs/monographs/2009/RAND_MG850.pdf

③ 正因为如此，中国决策者使用“和平发展”一词替代了“和平崛起”一词，前者更为中性。Susan L. Shirk, *China*, *op. cit.*, p.108; Bates Gill, *Rising Star: China's New Security Diplomacy*, Washington: Brookings, 2007, p.8.

得不承担过重且不必要的义务。^①

如果对后冷战时期作一个整体观察，就会发现，中国是三角政治的最大获益者，尤其是在 2003 年以后，俄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而中国与美、俄两国却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但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亚太地区，遍及欧亚大陆，包括此前从未涉足的中亚地区。这其中的悖论是，中国对三角观念缺乏兴趣，中国既不打“俄罗斯牌”，也不打“美国牌”，但却使得中国成为战略三角关系的最大获益方，同时又躲开了风险。

（三）华盛顿的视角

美国人对战略三角的态度很复杂，美国人对此既不关心、厌倦，也感到恐惧，甚至怀有敌意。尽管在 1970 年代，美国曾大力推广这一概念，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那个干涉频仍的时代，美国的战略思维也发生了变化。

而最具戏剧性的，当然是苏联的崩溃，以及俄罗斯重塑世界强国努力的失败。三角观念很快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在当今世界中，权力和影响力的性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尽管俄罗斯依然是核武器强国，但这一点已经不再重要了。^②

华盛顿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俄罗斯不再是一个可怕的战略对手，而是一个功能紊乱的、内部危险日趋严重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虚弱反倒成了美国和国际安全的首要威胁。例如，废弃的核弹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口管制的松散、极端民族主义、帝国复仇主义，以及不稳定的外交政策。^③

近些年来，莫斯科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颇具进攻性的一些行为，使得一些评论家误以为俄罗斯的国际行为“回到了过去”。然而，即使俄罗斯在某

① 例如，中国很谨慎，避免在中亚与美国直接对抗。

② 正如盖迪斯（也译为“加迪斯”）所言，“战争能力已经不能保证一国具有影响力，甚至无法保证其在国际体系中继续存在”。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op. cit., p.263.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 pp.87-98. 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欧亚中心的一个‘黑洞’”（p.87）。

些方面显得很有威胁性，也很少有美国人会将其与苏联类比，因为无论是野心还是能力，俄罗斯都今非昔比。苏联是无可争辩的全球强国，而当今的俄罗斯顶多是一个有着某些全球利益的地区强国。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无足轻重。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决定“重启”美俄关系，就是因为它意识到，莫斯科在很多美国关心的领域，都可以做出建设性的贡献。例如，战略裁军、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以及欧洲安全问题。然而，对于邻国之外的国家，俄罗斯的权力影响却非常有限，更不用提俄罗斯对美国能有多少帮助了。华盛顿认为，三角关系及其他人为的方案，没有什么用处，也是不可能的。

美国对三角观念不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在于中国的崛起。目前中国已经从地区国家成为一个初步的超级强国。尽管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但很多美国人将中国看作国际体系中主要的“他者”(other)。一些人认为未来中美之间将会充满紧张与敌对。^①另一些人较为乐观，相信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将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进行有效的合作，^②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G2”的思想。这两种看法都将未来想象成为一个由两极主导的世界，而非三极世界。二者的潜在假定在于，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足够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国家，有能力平等地与美国接触，无论是作为美国的伙伴还是作为美国的竞争者，或者二者兼具。这将会大大限制俄罗斯的作用，使得战略三角失去意义。^③

第三，在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旧式的战略制衡已经不再适合了。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历史的终结”，认为随着西方民主规范和价值的普及，世界发展已经走向了终

① 这些夸张的描述，有 Richard Bernstein,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8; Constantine C. Menges, *China: The Gathering Threat*, Nashville: Nelson Current, 2005.

② Evan S. Medeiros, *China's International Behavior*, *op. cit.*, pp.213-220.

③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细微的差别，罗伯特·卡根 (Robert Kagan) 曾撰文写道，莫斯科和北京的“独裁者的联合体”，以及新威权主义共识的出现，都正在挑战西方。我们先不说这个理论本身的问题，应该强调，卡根及类似学者设想的是一个两极范式。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区分，即将世界区分为专制的和民主的，双方在规范、价值和利益等问题上进行较量。但卡根没有提及这个理论对应的地缘政治策略。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8, pp.53-80.

结。^①尽管从福山开始的“胜利主义”(triumphalism)引发了持续数年的论战,但大家也有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当今世界已经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不再以强权政治和公开对立为特征。国际体系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和多样,那种过于简单的地缘政治设计,如传统的两极秩序和战略三角观念,都已经不再适合当今时代。从当代的一些术语中,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变化,如,接触(engagement)取代了竞争(competition),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y)取代了地缘政治(geopolitics),正和博弈(positive-sum)取代了零和博弈(zero-sum)。

而美国之所以没有接受三角观念,其最具说服力的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前面所说,有效的三角观念意味着三方力量的大致均衡,至少每一方都能在实际交往中有希望影响另外两方的行为。但苏联解体后,这种条件几乎完全不存在。美国的霸权与自信,令华盛顿对三角外交不感兴趣。当然,有时美国也会拉拢(co-opt)其他国家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但美国考虑的仅仅是在北约或其他国际组织中的盟友和伙伴。^②

直到今天依然是如此,伊拉克和阿富汗使得美国的自信心受到挫折。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强调,美国应该让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分担责任。但是,极少有华盛顿官员会否认美国依然是全球领导者。美国已经不再有不可战胜的光环,它的领导地位面临着过去20年里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负担。但是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承担这个繁重的责任。中国不情愿这样做,俄罗斯战略财富的急剧缩水,使其早已失去了这个能力。

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多边主义,说明华盛顿越来越意识到,世界的确在发生变化,并且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平等”了。但这种认识并不等于说美国想要回归到传统的国际政治安排,如两极、三边或大国协调。相反,真正的问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 Summer 1989, p.4. 类似地,盖迪斯也论述了“民主化的全球化”。他认为,20世纪的后半期,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增长到了之前的五倍。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op. cit., p.264.

^② 即使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乔治·W·布什提出臭名昭著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之前,布热津斯基就已经提出建立由美国领导的跨欧亚安全体系(Trans-Eurasian Security System),并希望这个组织能够得到中国等其他大国的支持。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op. cit., pp.208-209.

题在于，美国如何在当今高度全球化和紧密联系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有效行动。为此需要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其他大国建立更加富有成效的关系，也需要与众多小国、国际机构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良好关系。

四、一个新的三角观念？——多边战略裁军

有一种观点是，从战略裁军这个相对具体的领域，可以提炼出一个新的三角关系。^①这种观点如下：美国与俄罗斯正在大力削减他们的核武库，而同时中国正在继续积极发展其核武项目，因此三国最终将会达到大致平等的状态。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来的裁军谈判将与传统形式不同，不再是双边的，而将是三边甚至多边的（即包括英国、法国和印度等其他主要核国家）。

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几何学逻辑。事实上，短期内，一个基于核武器的战略三角关系出现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中国还需要数十年，才能使自己的核能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与俄美两国接近。尽管正集中于核武建设，但目前中国只有 35 到 40 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s）。^②中国已经部署好的战略核弹头只有 186 枚，远远比不上俄罗斯的 2287 枚和美国的 2202 枚。此外俄美两国还各有 2047 枚和 500 枚非战略核弹头。^③

第二点是政治和心理上的问题：北京坚称不接受任何对其核武发展的束缚。中国人总有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认为西方（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会阴谋“颠覆中国”，并限制中国实现其合法的抱负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努力。在北京看来，裁军的道德义务，完全在于“两个大国”（big two）。鉴于法国、印度等其他二线核国家都极不情愿被多边协议所束缚，中国更加坚定了实现其目标的努力。

北京认为，任何关于核三角的提议，都将会导致中国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① 这是 2009 年 6 月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会议”（Ifri）的主题：2025 年的俄中战略态势（“Russian and Chinese strategic postures in 2025”）。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9, p.24. 参见 www.defense.gov/pubs/pdfs/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_2009.pdf

③ Shannon N. Kile, Vitaly Fedchenko and Hans M. Kristiensen, “Would Nuclear Forces”, in *SIPRI Yearbook 2009*,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9, p.346. 参见 www.sipri.org/yearbook/2009/files/SIPRIYB0908.pdf

而中国对此尚未做好准备。尽管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自信，但中国人的不安全感从未消失过。北京始终强调，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体谅，这也决定了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贸易谈判、市场准入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也决定了它对中美 G2 这种观念的理解。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不愿承担起大国的责任，那么它在核安全这种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也不可能来承担义务和责任。

如果俄美两国在裁减核武器的谈判中取得的进展远远超出当下的谈判水平，中国将如何应对？对于这种假设的情况，中国的对策是做好多种准备，以留有最大的余地。尽管中国外长杨洁篪反复强调中国支持“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中国依然常常设置附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要求俄美“大幅”削减核武库，要求所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就“非核国家的安全保障问题”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禁止导弹防御计划，禁止外太空武器化，并就“彻底禁止核武器”召开国际会议。^①

在实践中，这些条件使得中国可以将核裁军的责任转移给他国。即使俄美真像北京要求的那样“大幅”削减核武库，中国依旧可以以其他条件“没有落实”（failings）为借口，为自己的核发展辩护，如在俄美的战略学说中，没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美国在发展导弹防御计划；国际社会并未签订有约束力的条约以限制有核国家、核门槛国家和具有核野心的国家。

中国方面认为，上述主张能够实现的可能性还非常之小。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的“无核世界”理念——最终消灭所有核武器——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这一理念本身并不新。早在 1980 年代，罗纳德·里根就呼吁“有一天能真正、切实地削减核武器，直至彻底销毁”。^②但是里根在普及战略导弹防御计划和太空武器化方面的努力，超过了任何一个人，主要体现为他的星球大战计划。

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寻求与俄美两国的战略平等地位，甚至这也不是中国的长远目标。实现这一雄伟目标，要耗费巨大成本，造成

① PR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reign Minister Yang Jiechi Expounds on China’s Policy on Nuclear Disarmament at the Geneva Disarmament conference”, 12 August 2009. 参见 www.mfa.gov.cn/eng/wjdt/wshd/t578645.htm

②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op. cit.*, p.227.

严重后果。这样做也会导致重要资源的分散，影响其他更为重要的领域的发展，如经济、卫生、教育，甚至会影响常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这与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完全相悖的，与“和谐世界”的理念也格格不入。

中国想要的，是在万一发生中美军事对抗（如在台湾问题上）的时候，避免遭到美国第一波核武器的打击。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应该扩大其洲际弹道导弹（ICBMs）武库，使其（在理论上）超过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的能力以抵消其作用。简而言之，中国对战略平等（无论是三角式的平等还是其他形式的平等）并不迷信，而是重视战略威慑的实际效力。^①

五、战略三角的终结

全球金融危机，突出反映了战略三角已经不适当今时代的发展。经济危机并没有促成新的多极秩序的形成，而是显示出了世界的相互依赖的特征，以及世界依然需要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美国。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俄经济发展可以不依赖美国。经济危机使得这种观点的问题暴露出来了^②，目前还没有替代性的经济模式，对于俄罗斯，情况尤其如此。在关于新的金融制度的讨论中，俄罗斯只是在名义上发挥着作用。俄罗斯想同北京一道批评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批评美国的过失，但很少有人认为俄罗斯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旧式地缘政治已不能应对当前的一系列挑战，战略三角观念显得格外不合时宜。

随着华盛顿政府的更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屡屡被提及。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依然具有 1990 年代那样的主导能力，但一个复苏的美国，其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莫斯科和北京对美国的重视，要高于二者之间相互重视的程度。尽管两国都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会衰落，但它们的行为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依然是两国各自外交政策的中心。

① 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俄罗斯明显不同，后者在实现战略平等的同时，努力追求其全球大国地位。

② 这种观点假定，由于中俄等新兴行为体的快速发展，它们可以不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的确，每个国家都希望成为华盛顿首选的战略伙伴。例如，莫斯科总是把奥巴马想要解决的问题（战略裁军问题、伊朗和阿富汗问题）作为当务之急，并总是希望自己（而不是中国）能够成为美国主要的“他者”（“other”），并且希望能作出切实的贡献，被美国所承认。在过去 12 个月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体现出以美国中心的特征和地缘政治的特征，这并不奇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中熏陶出来俄罗斯决策者们，又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外交套路上来了。

在中国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行为体的过程中，一方面，试图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形象，强调“全球相互依赖”和“双赢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其外交政策越来越充满活力。现在谈论的话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而是“不可避免的崛起”。当今，美国面临着困难，欧洲处于虚弱和分裂之中，俄罗斯处于半孤立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发展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将在 21 世纪成为美国真正的对手。

简而言之，有两种趋势是与三角观念直接对立的。一种趋势是新的两极格局，尽管这与冷战时期的对抗型模式有很大不同。另一种趋势是多边主义，它反映的是一种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相互依赖和“民主”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仅有美国一个国家的相对权力大大下降。大体上说，传统大国都遭遇了这种情况。那种几个帝国可以合作管理世界的历史（例如“协调”），已经结束了。尽管大国还将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但它们影响其他国家的能力已经明显受到了限制。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战略三角（至少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已经过时了。

六、复杂的两极格局与后现代三角

中国并不愿意承担国际领导的重任，说明短期内新的中美两极格局还不会形成。^①中国否认G2的概念，不想让其他主要行为体对中国产生敌对的反应，这说明，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更加强调多边解决方案和多边机制，更

^① 克林顿·丹斯（Clinton Dines，也称“戴坚定”）这位著名的中国通曾经说过，“中国似乎是坐在汽车的前排，但它却不想开车”。这是丹斯 2009 年 5 月在上海与作者的谈话。

加重视建设性的国际主义以及全球治理。中国在向第二超级强国角色转变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很多问题和障碍，例如老龄化加速、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其他大国和邻国的挑战。中国的发展，不会像是一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顺利和不可阻挡。

即便如此，中国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很有可能成为超级强国。然而，预期是，到 2000 年代中期，2050 年左右，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很多评论者相信，中国将在 2030 年之前赶上美国，甚至会更早。^①如果中国真的成了下一个世界超级强国，那么国际体系将会由两个国家主导，它们的影响力将会远远大于其他主要的二流强国，如俄罗斯、印度、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巴西，等等。

但是，一个更有趣和更重要的问题，不是中美两极格局是否会出现，而是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很多西方学者和一部分中国学者，都假定中美两国注定要成为战略敌手。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信念可以从历史的逻辑中找到。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两个实力大致相等的帝国最后常常不免走向冲突。而中美两国又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传统、价值和文明，这是另外一层原因。^②

这种担心，可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中美两国间有很多现存的和潜在的摩擦，很难想象这些摩擦不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战略对抗，甚至偶尔会升级到危险的程度。然而，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即中美两极体系将以积极的战略共治（strategic condominium）的形式存在。

乐观主义是有其理由的。首先，美中两国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使得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合作成为必需。尽管中国呼吁设立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s）以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中国还是非常清楚，它的经济财富需要依赖于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依赖于美国的市场和科学技术。中国人现在依然投资数百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国债。^③反过

① 作者 2009 年 5 月在上海和北京的谈话。中国学者金灿荣估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这一过程提前了五到七年。金灿荣 2009 年 11 月在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② 参见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09.

③ 2008 年 9 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 6182 亿美元，到 2009 年 9 月这一数字已上升到了 7989 亿美元，参见 <http://www.treas.gov/tic/mfh.txt>

来讲，美国也清楚，自己经济的健康发展（更不用说政治和社会稳定了）也有赖于中国现在的对美经济政策。

第二，美中两国战略紧张态势的升级，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两国领导层对建设性接触政策较为青睐。在这一点上，乔治·W·布什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令人鼓舞的。尽管当时的美国政府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并且奉行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但华盛顿还是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中国，其基础是克林顿—江泽民时代的两国关系。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尼克松政府的做法也与此类似，当时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尼克松恰恰是一位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在中国这一边，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憎恶美国，但这并未阻止毛泽东寻求与华盛顿的接近。中美关系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帝国传统，或大国传统，这是一种本质上内省的和保守的传统。^①这并不是说中国不想扩大权力和影响，但是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谨慎。

而乐观主义最具说服力的理由在于，如果新的两极格局真的出现，其紧张程度会被其他行为体所缓解。支撑中美合作的相互依赖机制，本身也得到了另一种更大范围的相互依赖机制的支持，使得合作胜过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例证。人们从危机中看到的最大的事实，并不是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的衰弱，而是全球经济的多样性与相互联系。

美中两国未来将会主导国际政治，但并非是要通过类似于此前的两极秩序那样来主导世界，而是会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地缘政治依然会很重要，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更为良性的、积极的无政府状态，但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状态。我们将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三角关系的出现，这是一个后现代的三角关系，其中，第三方不是俄罗斯或者其他大国，而是一个网络，构成这个网络的是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实体，包括国家、多边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或许这个体系显得有些混乱，但它非常接近于一个“民主化”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也是莫斯科和北京公开倡导的。该体系的基础是，一个比历史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三角关

^① Ross Terrill, *The New Chinese Empire: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2-3.

系更为平等、更可持续的新型三角关系。

(孟维瞻 译)

【Abstract】 Strategic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relations among great powers.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Russia's power led to disappearance of the old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nd the replacement may not be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but the Sino-US bipolar order.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previous bipolar orders, Sino-U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will be closer in the future, which could result in a formation of a new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with postmodern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ast to strategic triangle, the "third party" in the new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will neither be Russia, nor will it be any of other great powers, but it will be formal or informal networks composed of a large number of countries,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non-state actors. International system led by "post-moder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is characterized by "democratization" and a more equal, more sustainable new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han any other triangular relationships in history.

【 Key Words 】 Russia, China, USA, strategic triangular relations, postmodern triangular relations

【 Аннотация 】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уже не пригодны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Снижени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мощи России привело к прекращению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тарых «треуго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заменой этому скорее будет не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а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иполярный порядок. Однако отличным от прежнего биполярного порядка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в будущ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Китая и США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будет более тесным, что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явлению новых обладающ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тличным от отноше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третьей стороной» в новых треуго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будет ни Россия, и никакая другая великая держава, а состоящие из большого числа стран,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труктур формальные или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се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опирающаяся на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бладает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ч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из себя более равные, более устойчивые новы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любыми другими в истории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СШ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треуго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т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 ——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

黄登学**

【内容提要】2013年2月12日，普京签署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方向；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明确地传达了新时期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与新世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两版《构想》相比，新《构想》既有继承与延续，又有发展和创新。从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有关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阐述，以及普京归位一年多来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普京新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用力方向主要是：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为第一战略优先，全力构建“欧亚联盟”，在重点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关键词】普京新任期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 独联体 俄美关系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4)01-0182-(27)

2012年5月7日，刚刚开始新一届总统任期的普京发布指示，要求俄罗斯外交部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经过俄罗斯外交部与其他相关部门及智库精英大半年的酝酿与讨论，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新《构想》），最终于2013年2月12日经俄罗斯总统普京

* 本文系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IFW121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黄登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签署，成为新时期俄罗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文件。新《构想》系统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和优先方向，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形势以及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与新世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政府分别于 2000 年 6 月 28 日和 2008 年 7 月 12 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下简称旧《构想》）相比，新《构想》既有继承与延续，又有发展和创新。

新《构想》的主要内容

新《构想》的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1）“基本条款”，主要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2）“当今世界与俄罗斯外交政策”，主要论述俄罗斯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与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基本判断和立场；（3）“俄罗斯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优先方向”，主要阐述俄罗斯外交政策在全球层面旨在实现的主要目标；（4）“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地区优先方向”，阐明俄罗斯在地区层面的主要着力方向。

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新《构想》中规定的内容是：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和巩固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提高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将俄罗斯打造成为当代世界一个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力量中心；为国内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实现技术现代化和转向创新发展道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巩固法制与民主制度、落实人权与自由，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全力巩固国际和平、普遍安全与稳定，确立公平民主的国际体系，尊重国际法首先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发挥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并以集体原则解决国际问题；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关系，促进消除临近俄罗斯联邦地区现有的紧张和冲突策源地，并防止出现新的紧张与冲突策源地；在尊重独立与主权、务实、透明、全方位、可预见以及非对抗性地维护国家优先利益等原则的基础上，与外国、国家集团、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发展双边与多边互利、平等的伙伴关系；巩固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贸易经济地位，维护俄罗斯经济主体在国外的利益，不允许对俄罗斯商品、服务及投资采取歧视性政策；全面保护俄罗斯公民和境外侨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推广和加强俄语在世界

上的影响，宣传俄罗斯的文化成就，加强境外俄侨胞的团结；促进发展不同文明间的建设性对话与伙伴关系，巩固不同文化及宗教间的和睦与互补。

在“当今世界与俄罗斯外交政策”部分，新《构想》指出，全球地缘政治生态当前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关系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测，国际关系转型的实质在于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西方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持续下降，世界发展的实力重心向东方首先是亚太地区位移，一些新兴大国正在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前台；国家间军事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进攻性武器的更新与新式武器的出现正在冲击以军控条约为基础的全球安全结构；避免国际局势动荡的唯一可靠“保险阀”，是遵守欧洲—大西洋地区、欧亚地区以及亚太地区的同等安全及其不可分割原则；传统的军事政治联盟不能有效应对当今具有跨界性质的挑战与威胁，在解决国际问题时，结盟的方式正在被以多边灵活机制有效解决共同任务的网络外交所替代；与军事实力一道，作为国家影响国际政治的经济、法律、科技、生态、人口和信息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更加引人注目，西方主要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与持续衰退对全球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协同建立新的更加平衡、并符合全球化现实的世界贸易与货币金融体系的任务，愈发迫切；全球性竞争第一次体现在文明层面的竞争，反映在不同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竞争，当今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更加引人注目；撇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单方面制裁以及其他强制方式，包括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的图谋，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危险；禁止打着保护人权的旗号、公然无视国际法基本准则推翻主权国家的合法政权，这些做法只能加剧冲突和紧张，引发军备竞赛并加重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当今国际政治中具有跨境性质的新挑战与新威胁，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社会民意极端化、非法移民、非法毒品贩卖、气候变化等，日益突出，所有这些挑战与威胁，都需要国际社会在发挥联合国核心作用的条件下协同有效应对；“软实力”正在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有些国家非法利用所谓的‘软实力’及人权保护理念，向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和破坏当地局势稳定、并操纵这些国家民意的风险也在增加；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一系列有影响的国际与地区组织成

员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方针，积极发展与世界主要国家及集团的关系，俄罗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和建设性的一员，坚定不移地实行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的路线，促进形成积极、平衡和统一的国际议事日程，推动解决国际与地区问题，并和所有国家一道解决共同任务。

在全球问题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1) 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俄罗斯致力于在尊重国际法和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在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及世界政治中，联合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发挥核心作用，在完全尊重联合国核心协调作用的条件下，发挥主要大国的集体领导作用；俄罗斯将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诸如“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八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里克”（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国际及地区机制中的协作。

(2) 维护国际法的至上地位。俄罗斯支持国际社会集体致力于巩固国际关系的法律基础，反对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修改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图谋；对于国际和平与法治秩序而言，某些国家以一己私利随意曲解最重要的国际法准则及原则的做法，具有特别的危险性；禁止以所谓的“保护责任”名目所进行的外来军事干涉；继续致力于完善联合国的制裁机制，只有安理会才有权根据集体安全原则并经全面协商后作出制裁决定。

(3) 加强国际安全。俄罗斯自身、同时敦促伙伴国，忠实履行各自在军控领域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增强军事领域的信任，在权利平等和安全不可分割的基础上，参与制定和缔结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并全盘考虑战略稳定所有影响因素的新协定；恪守建立不扩散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机制的多边政治和法律基础的方针，恪守不扩散核武器公约、生物及化学武器公约；支持建立在法律责任协议基础上的防止导弹扩散的全球机制；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应对导弹威胁的集体反应体系，反对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单方面加强反导系统的无节制行为；积极参加联合国以及地区与国际组织合作框架下的国际维和行动，加强在联合国主导下的有各地区组织参加的全球反恐联盟的建设，禁止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在国际社会集体行动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外交而不是武力手段解决地区冲突；坚决打击非法贩运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积极促进不同文化、宗教和文

明间的对话和伙伴关系，反对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反对种族、宗教、语言及文化歧视。

(4) 推进国际经济与生态合作。俄罗斯积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民主的全球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确保俄罗斯在国际经济联系体系中的平等地位，促进俄罗斯企业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促进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和多样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融入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各种风险；加强与能源资源主要生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发展与能源消费国及能源运输过境国的对话，确保能源供应、需求及过境运输的稳定与安全；支持扩大以保障生态安全和防止气候变化为目的的国际合作；努力维护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海洋安全航行、捕鱼作业和在国际海域从事科研活动的制度，保护海洋环境。

(5) 发展国际人文合作与人权。俄罗斯遵循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念，俄罗斯将在考虑每个国家民族、文化及历史特点的基础上，通过建设性的平等的国际对话，尊重全世界的人权与人身自由，维护俄罗斯海外同胞的权利与合法利益；努力扩大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空间，发展斯拉夫民族的国际文化及人文联系；坚决反对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与排外思想；积极塑造俄罗斯与其文化、教育、科学、体育影响力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形象，完善“软实力”运用体系并探寻最优的活动方式。

(6) 在外交活动的信息保障方面，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而准确地了解俄罗斯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外交倡议和行动，以及俄罗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计划、俄罗斯文化及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发展对国外社会舆论能够施加影响的有效信息手段，保障和加强俄罗斯大众传媒在国际信息空间的地位。

在地区层面，俄罗斯的优先方向包括：

(1) 独联体。俄罗斯将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同独联体成员国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强化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将构建欧亚经济联盟作为最优先的外交任务；俄罗斯积极促进与独联体各国在人文领域的合作，扩大在相互安全领域的合作，协同应对所面临的共

同挑战与威胁；在政治外交解决独联体内部冲突方面，俄罗斯将继续发挥作用，敦促独联体各国全面履行在地区一体化机构所承担的义务，进一步发展独联体各国的一体化进程与互利合作。

(2) 欧洲。俄罗斯外交政策在欧洲方向的主要目标是在安全不可分割、平等合作与相互信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空间，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统一经济与人文空间；俄罗斯一贯支持将有关安全不可分割的政治宣言变成切实的法律文件，深化与欧盟这一主要经贸及重要外交伙伴的合作关系，最终与欧盟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3) 美国。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具有长期性的优先方面，就是通过对话建立俄美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密切两国在所有领域的联系，并在务实和保持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共同确定各种分歧的管控技巧，让两国关系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及可预见性；在美国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俄罗斯将坚定不移地要求美国提供该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核遏制力的法律保证，同时希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能够严格遵循国际法准则、首先是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4) 亚太地区。世界政治与经济重心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①，俄罗斯致力于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并利用其所带来的各种机遇，落实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经济振兴纲要，在亚太地区同其他国家一道建立透明与平等的安全与合作结构，加强上合组织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的地位，继续扩展和中国的全面平等信任伙伴关系与战略协作，积极发展全方位合作和所有领域的外交协作，以共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和解决尖锐的地区及全球性问题。

新《构想》的发展与创新

1.与旧《构想》相比，新《构想》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更加悲观。

^① 关于俄罗斯学者、智库对于亚太地区的认识以及俄罗斯融入亚太问题的分析，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1期，第17-35页。

虽然 2000 年版与 2008 年版《构想》也对美国的单极企图以及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表达了一些担忧：“在美国保持经济和实力优势的情况下，建立单极世界的趋势正在加强，这会使国际局势不稳定”，“地区大国的军事政治竞争及分离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加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获得这种武器的手段问题已达到危险程度……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及毒品和武器走私的加剧，已开始对全球及地区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①，“单边行动的战略只能破坏国际局势的稳定……并对他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新的挑战 and 威胁，首先是国际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制造工艺扩散的危险等，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点，这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关系最根本的变化是停止了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克服了‘冷战’及其相关的偏见与旧习的影响……发生大规模战争包括核战争的危险在降低。”^②但从总体上看，旧《构想》对世界形势发展趋势的判断还是比较平和的，甚至经过普京八年执政、依靠“石油美元”得以大幅度提升综合国力的俄罗斯还第一次在 2008 年版《构想》中，抒发了其对于推动世界发展的雄心与抱负：“在国家利益坚实的土壤上站立起来的新俄罗斯，注定在全球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作为‘八国集团’的参加者，和其他一系列有影响的全球与地区性对话与合作机制中的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在各方面的活动中都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和资源……俄罗斯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体化，对国际关系新框架结构的形成施加影响。”^③而新版《构想》的基调则始终贯穿着一个命题，即“世界充满了威胁”，“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环境从未如此复杂，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隐含着这么多的挑战与威胁”，“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形成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必将伴随着不断加剧的全球及地区经济与政治动荡。”^④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俄罗斯精英对于愈发糟糕的国际环境的深刻焦虑”^⑤。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8 06 2000.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июля 2008 г.

③ Там же.

④ Пряхин В.Ф.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осмысление---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новой редак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3. 8 Февраля.

⑤ Witold Rodkiewicz, “The Russian Federation’s foreign policy concept”, 01.03.2013. www.osw.waw.pl/en/publikacje/eastweek/2013-02-20/russian-federation-s-foreign-policy-concept

俄罗斯对国际环境及威胁的认识与评估的变化，有很多原因。首先，从俄罗斯国内来看，2011年底与2012年初，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及其他许多大城市的街头所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不管其发生的原因如何，都让普京第一次切实感到了执政的压力。^①虽然这些抗议活动的发生，可能是源于俄罗斯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比如公民社会渐趋成熟，反对派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等）这一内生性因素。比如，“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的中小企业主，以及城市青年，都反对普京重归克里姆林宫。”^②但普京显然不这样认为。众所周知，就在俄罗斯各种抗议活动发生后不久，俄罗斯当局随即就把这种抗议浪潮列为西方、首先是美国参与的破坏性活动，将反对派描述成谋求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的所谓西方“第五纵队”。普京还公开指责美国国务院资助俄罗斯的抗议分子。“当普京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布自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之际，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大声疾呼听起来像是在宣布一个对外部敌人及其国内‘走狗’的胜利。”^③其次，2008年肇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俄罗斯以能源为主的资源经济遭受重挫，而且使其发展模式不合理的“内伤”充分暴露。“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原料价格的下降，不仅证明了俄罗斯经济的虚弱，而且动摇了俄罗斯统治制度的基础。”^④同时，几年前俄罗斯高调推出的所谓“现代化战略”至今未取得明显成效。此外，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一度急转直下的世界石油价格，虽然稳定在了“布伦特”北海原油每桶100-115美元的相对高价，但进一步的回升显然缺乏动力；而欧洲经济的萧条、美国经济复苏的乏力，以及中国经济的放缓，都让石油价格再次面临跌落的风险。而对于俄罗斯政府来说，“只有石油至少保持目前的价格水平，其预算才有

① 俄罗斯方面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判断，实际上2011年之前就已经比较明晰了，参见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经由和谐发展走向地区稳定：新世界格局中的俄罗斯与中国：‘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用提纲”，《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14页。

② Алексей Арбагов. Политик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Оборон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3.19 Апреля.

③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Четвертый ве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3.

④ Адриан Пабст. “Третий путь”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0. №.5.

可能按计划完成。”^①所有这些都给了普京团队的统治以及俄罗斯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就国际环境来说，俄罗斯的这种悲观评估则主要是基于国际形势发展中四个方面的新因素：（1）国际舞台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西方世界力量弱化，亚洲实力增长。“西方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持续下降，世界发展的实力重心向东方首先是亚太地区位移，一些新兴大国正在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前台。”^②（2）国际体系整体呈现不稳定状态，“世界所面临的经济金融挑战更加引人注目，西方主要国家的结构性问题与持续衰退对全球发展产生消极影响。”^③（3）国际社会的竞争不断加剧，并且这种竞争日益具有文化与文明竞争的性质，“全球性竞争第一次体现在文明层面的竞争，反映为不同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的竞争。”^④（4）国际形势发展的不可预见性愈发明显，“全球地缘政治生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关系的发展愈发难以预测。”而某些国家“撇开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单方面制裁及其他强制方式，包括使用武力来解决危机的图谋，是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危险”，并且“只能是加剧冲突和紧张，引发军备竞赛并加重国家间的矛盾与分歧”。^⑤

2.在对独联体政策上，不论是2000年版还是2008年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都将独联体国家置于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但从普京总统八年任期以及“梅普共治”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俄罗斯实际上是把与西方的外交放到了最优先方向。不论是普京第一个打电话给小布什表达对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的慰问及对反恐的支持，还是梅氏积极响应奥巴马总统“重启”俄美关系的号召，都证明了这一点。从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相关内容来看，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仍然是巩固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势力范围。不过新《构想》的新意在于，它更加强调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迫切性，并指明了具体的任务，即“将构建欧亚经济联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Четвертый ве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3.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③ Там же.

④ Там же.

⑤ Там же.

盟作为最优先的外交任务”。同时，在 2009 年亚努科维奇就任乌克兰新一届总统，以及俄乌关系“重启”的背景下，新《构想》明确把乌克兰称作是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优先发展的伙伴。“在独联体内俄罗斯优先发展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促使其加入独联体日益深化的一体化进程。”^①此外，俄罗斯对于以政治手段解决后苏联空间冲突展示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俄罗斯将继续积极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独联体的内部冲突，包括与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其他国家一道，在俄罗斯、美国及法国总统 2009—2011 年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的原则基础上，促进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②而对于俄格关系以及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两共和国问题的论述，也是旧《构想》所没有的新内容：“推动阿布哈兹及南奥塞梯共和国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巩固两国的国际地位，保障其安全和促进其社会经济重建，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任务，俄罗斯希望与格鲁吉亚在考虑南高加索既有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实现关系正常化。”^③

就俄罗斯在外交最优先方向上（独联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理论与实践背离的原因来说，除了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由于各种原因多年迟迟不见成效，以及独联体各种机制基本处于“空转”状态以外，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以及奥巴马“重启”俄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为俄罗斯提供了再次面向西方的机会，也是重要原因。而在当前“俄美关系‘重启’的潜力已尽”，“‘重启-2’难以再次发生”^④的背景下，俄罗斯重新将关注点聚焦于后苏联空间，实为必然之举。

3.在对欧美政策上，新《构想》虽然与旧《构想》一样，依然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放在了优先位置，但却是第一次从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同根性的层面论述了这样做的根据。“发展与欧洲—大西洋地区国家的关系具有优先性质，将俄罗斯与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地理、经济及历史因素，而且是双方共有的深刻的文明之根。”^⑤同时，新《构想》对俄欧关系发展目标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Переагрузка. Реквием//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013.20 Января.

⑤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的勾勒更加远大，即创建统一市场和安全合作机制（这一点虽然不是一个新思想，但却是第一次在这个规格的正式文件中进行表述）。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与旧版《构想》相比，新版《构想》对与美国关系的表述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00年版《构想》声称，“俄罗斯致力于消除与美国关系中出现的重大困难，维护花了将近1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俄美合作的基础……俄美的相互配合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只有与美国进行积极对话，才能够解决限制和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为了相互利益，要保持各个级别的经常性双边接触，不允许双边关系中出现停顿，不允许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主要问题的谈判中止。”^①2008年版《构想》也明确指出，“必须把俄美关系调整到战略伙伴状态，跳过以往双方战略原则的障碍，集中精力应对现实的威胁，而对于俄美之间有分歧的方面，努力在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进行协调。”^②而在新版《构想》中，旧版《构想》中有关“与美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说明，俄罗斯对今后俄美关系发展的期望值已经大大降低，双边关系的重点从战略与政治事务转向了商业性业务，目的是为俄美关系建立一个所谓“坚实”的经济基础——“俄罗斯对美外交政策的一个具有长期性的优先方面，就是通过对话建立俄美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密切两国在所有领域的联系，稳步地实质性地提升双方平等的非歧视性经贸合作，并在务实和保持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共同确定各种分歧的管控技巧。”^③此外，俄罗斯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共同建立应对导弹威胁的集体反应体系，反对美国单方面加强反导系统的无节制行为，“俄罗斯坚定不移地要求美国提供其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核遏制力的法律保证。”^④

就俄罗斯对美政策转变的原因来说，则主要在于：在“9·11”后俄美从反恐伙伴的“蜜月期”到双方围绕乌（克兰）、格“颜色革命”以及美国抨击俄践踏“民主”等问题而争斗不断；从小布什政府执意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到2007年2月第43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猛烈抨击小布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8.06.2000.

②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2 июля 2008 г.

③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④ Там же.

什单边主义；从俄美关系“重启”，到双方在美国欧洲导弹防御系统新计划立场上的势不两立，再到最近闹得不可开交的“马格尼茨基法案”与“雅科夫列夫法案”；俄美关系在经过这种如“过山车”般的“潮起潮落”之后，俄罗斯已经对俄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了信心。有鉴于此，俄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所阿列克谢·菲尼科所言，“在 2020 年以前的这个时期，从总体上看，俄美关系将持续呈现冲突的性质。”^①

4.新《构想》第一次引入了所谓“软实力”概念，并对其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软实力’正在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俄罗斯要积极塑造与其文化、教育、科学、体育影响力以及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形象，完善‘软实力’运用体系并探寻最优的活动方式。”这里俄罗斯所谓的“软实力”，是指“基于信息、人文与通讯技术基础上的非军事与非经济影响力，它将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俄罗斯应当通过‘软实力’、其中包括利用‘成百上千万’俄罗斯侨胞的潜力，改善自己在其他国家中的形象。”^②普京在 2013 年 2 月 11 日接见俄罗斯外交部荣获国家勋章的工作人员，以及新任命的高级外交官时强调指出，世界在发生变化，保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也在变化，“古典式外交正在过去，需要更加积极地利用‘软实力’和以超前的视野开展外交工作，加强俄罗斯的地位，积极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并善于和谐地融入到全球信息潮流中去。”^③

长期以来，俄罗斯外交一直强调所谓“意识形态说教尽可能少，而具体的实事和利益尽可能多”的实用主义理念。现在，这一立场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实用主义自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缺少某种价值与思想作为基础，外交政策是不可能成熟起来的……。新《构想》引入并突出有关‘软实力’的理念，实际上反映了俄罗斯对于其他国家与世界的认知。它表明，俄罗斯打算

① Алексей Фененк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1529#top

②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я намерена быть “островком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2. 14 Декабря.

③ Латухина К. Впередсмотрящие---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помнил дипломатам о мягкой сил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3. 12 Февраля.

建构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世界‘价值观市场’上的一种替代性选择。”^①实际上，构建强大的软实力也是俄罗斯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大国的必然要求。正如莫斯科卡耐基和平基金会主任特列宁所说，“如果想成为一个地区的领导者，俄罗斯需要发挥软实力的作用，学会‘造福于国际社会’……‘也为其他人生活’的意愿或能力的缺失，与对领导者的追求是不相容的，绝对的利己主义与领导角色也是格格不入的。”^②同时，“‘软实力’——这不是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提高全球竞争力的手段，因为经济、精神以及思想沟通领域的竞争力（而不是战争），才是 21 世纪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③此外，新《构想》在大谈特谈“软实力”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某些国家利用其来干涉他国内政的深刻忧虑，“有些国家非法利用所谓的‘软实力’及人权保护理念向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和破坏当地局势稳定并操纵这些国家民意的风险也在增加。”^④

总之，新《构想》是以旧《构想》为基础，并根据俄罗斯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对俄外交提出的任务和挑战修订而成的，正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言，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反映了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这既包括全球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深刻后果，也包括中东及北非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⑤

普京新时期俄罗斯外交走势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 2013 年 1 月 23 日举行的 2012 年俄罗斯外交工作总结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即将正式推出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不是一个新的《构想》，它只是原《构想》的新版本而已，因为作为俄罗斯外

① Лагухина К. Работа на автор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3. 18 Февраля.

② Тренин Д.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спектива 2020. 08.12.2012. <http://russia-2020.org/ru/2010/10/06/russian-foreign-policy-perspective-2020/>

③ Павел Родькин. Мягкая сила---Готова ли Россия к мировой битве «витрин»?//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2013.29 января.

④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⑤ Пряхин В.Ф. Затянувшееся осмысление--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новой редак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3. 8 Февраля.

交政策基础的关键性原则并没有变化，即俄罗斯将继续奉行实用、公开及可预见性的全方位外交路线，俄罗斯将“敞开心扉”，与所有愿意和俄罗斯合作的国家在平等与互利基础上深化合作关系。^①

作为指导俄罗斯外交的最权威官方文件，2013 年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堪称我们观察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的“透视镜”。虽然在普京时代（包括“梅普共治”时期）的前两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实施的 12 年中，俄罗斯外交在独联体与美国两个方向上的理论宣示与政策实践之间，出现了若干背离，但从总体上看，以及从俄罗斯对欧、对华等其他几个主要方向来看，俄罗斯的外交走向基本是按照《构想》的方针运行的。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此前导致俄罗斯对美及对独联体国家政策发生“漂移”的因素已经大大弱化。“‘9·11’事件发生后，普京提出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反对新的共同的敌人，而且还绝对认真地讨论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想法，对于此种情形，现在已经变得不可想象了。”^②特别是普京构建“欧亚联盟”的宏大构想，不能不使人们对新时期俄罗斯的独联体外交产生较大的联想与期待。而普京的重新“归位”，也让美国方面对俄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不再抱有多大的希望。正如哈佛大学冷战研究专家马克·克拉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2013 年 9 月“奥巴马取消俄美双边会晤，标志着俄美关系已经陷入奥巴马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只要普京在位，在梅德韦杰夫时期曾经一度起作用的‘重启’政策，就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普京太难打交道了。”^③

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因素，笔者以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侧重方向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12 году. 01.02.2013. www.mid.ru/brp_4.nsf/newsline/804D3CB775E6CC4044257AFC003FE53D

② Игорь Окун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2.

③ “Diplomatic Rift With Putin Grows as Obama Cancel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7, 2013.

1.把独联体作为第一战略优先，着力构建欧亚联盟。长期以来，独联体一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战略后方。并且至少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独联体、后苏联空间就一直被定位为俄外交政策的最优先方向。在最近几个版本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以及《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都是这种排序。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力开展对独联体国家外交和实现与这些国家的一体化，“不仅能够为建立容量更大的商品、服务、投资与劳动力市场创造有利条件，而且成功的一体化方案也意味着在俄罗斯周围形成一个‘安全带’，从而减轻俄罗斯国内现代化转型的困难。”^①从俄罗斯的外交实践来说，二十多年来，俄罗斯为了实现其在该区域的“独占地位”也是用尽了心机。俄罗斯主导建立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地区一体化组织，如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关税同盟等，即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遗憾的是，俄罗斯推动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努力，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所建立的各种一体化机制大多沦为“有名无实”、内容空洞甚至“虚拟化”的组织平台，“决而不行”成为这些组织高层会晤的一个显著特征。比如，在独联体框架内签署了无数个协议，“但绝大多数从未真正实施过。”^②结果造成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长期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实际上，大多数独立后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对俄罗斯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怎么感兴趣，它们对俄罗斯帝国历史仍然记忆犹新，对俄罗斯的帝国“意图”依然心存疑惧，而“后苏联空间一体化——这正是俄罗斯加强影响力的工具，它反映了俄罗斯欲支配弱小国家的意图”^③。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的任何邻国，包括前苏联大多数共和国，都不希望俄罗斯重新变成一个大国。这一点道出了其中一些国家之所以坚定奉行亲西方政策并力图加入北约的原因所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都把俄罗斯视为对自己国家主权的主要威胁，因而都力图削弱俄罗斯在其境内的影响，并在国际层

① Тезисы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2012–2018 гг.) / РСМД. — М. : Спец книга, 2012.

②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Ro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11, p.247.

③ Марина Стрежнев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артнерства Россия-ЕС. 09.10.2013.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1546#top

面寻求任何可能的手段达到这一点。”^①于是，后苏联空间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开始主动把眼光投向其他大国或者力量中心，并试图通过发展与后者各种形式的一体化关系以平衡来自俄罗斯的压力，目标就是旨在“实现外部伙伴国力量的适当平衡”^②，从而使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及主导地位大大弱化。

为了改变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这种颓势，摆脱后苏联空间“分散化”、“碎片化”的困境，俄罗斯不得不加大对独联体的外交力度。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则以最权威官方外交文件的形式，再一次确认和强调了独联体外交的重要性。“从外交政策的优先角度来看，新文件对与独联体国家合作重要性的表述更加引人注目和不容置疑……俄罗斯已经意识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其他所有因素都取决于其在邻近空间发挥建设性与主导性作用的能力。”^③而作为加强独联体外交并以此为依托实现大国梦想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普京在其竞选的纲领性文献《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诞生》中提出的所谓“欧亚联盟”设想。普京声称，未来的“欧亚联盟”将是“一个能够成为当代世界一极的强大的超国家集团”与“连接欧洲与亚太地区的有效纽带。”^④同时也是俄罗斯“在西方发生‘短路’和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另外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模式之尝试”^⑤。

应当说，建立关税联盟以至于将来在此基础上构建欧亚联盟，并不是俄罗斯在欧亚空间构建地区一体化结构的第一次尝试。近20多年来，分层搭建的这类机构可谓不少——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统一经济空间、俄白联盟等等。但赖以巩固这些一体化尝试的，主要是一些正确但却没有什么作用的“所谓‘各民族兄弟友谊’、统一的文化语言以及相似的历史道路等

① Ruslan Pukhov, “A look at Russian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efence, foreign policy, and relations with NATO”, 13 August 2013, www.cast.ru/eng/?id=508

② Малащенко 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а что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Россия? 16.12.2012. www.carnegie.ru/publications/?fa=50275

③ Латухина К. Работа на автор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3. 18 Февраля.

④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Стран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79 (4964). 2012.25 Сентября.

⑤ Игорь Окун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2.

言辞说教——这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新俄罗斯殖民化的恐惧”。而俄罗斯新近推出的一体化方案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所论及的几乎全是经济利益。这是其一。其二，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构想，摈弃了原先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国家都聚拢到地区一体化集团大旗之下的想法。就像欧盟那样，此次《构想》中提出的欧亚一体化进程将分成多个层次，并且推进的速度也各不相同。“如果有某个国家只对自由贸易感兴趣——那么它就可以在独联体框架内开展行动；如果某个国家看重的是经济上的融合——那么就欢迎它加入关税联盟及未来的欧亚联盟。”^①

俄罗斯总统普京素怀远大抱负，其所谓“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铮铮誓言，即说明了他的勃勃雄心。通过自己前两届的总统治理，普京不仅带领俄罗斯摆脱了叶利钦时代的“乱象”，而且将俄罗斯推上了复兴与崛起的上升轨道。普京总统的第三任期从 2012 年 5 月起正式开始，其构建“欧亚联盟”的举措也正在稳步推进且取得若干成效：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三国“统一经济空间”一体化方案正式启动，这可以算作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先声；作为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常设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已经于 2012 年 2 月 1 日开始运作；2012 年 12 月 5 日独联体首脑理事会阿什哈巴德会议上顺利签署《关于建立独联体一体化货币市场的协议》；而“2012 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作为应对新挑战与新威胁的多功能机构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②。而普京“欧亚联盟”这一宏大战略构想能否如其所愿成为现实，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未来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而且必将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值得世人持续关注。

2. 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仍将是俄罗斯外交的一个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俄美关系的发展一直起伏不定、波折不断，双方既有冷战结束之初的短暂“蜜月期”，也经历过 2007 年前后的所谓“新冷战”

① Игорь Окун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3. №.2.

②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12 году”. 26.01.2013. www.mid.ru/brp_4.nsf/newsline/804D3CB775E6CC4044257AFC003FE53D

阶段；既有围绕俄罗斯“民主、人权”等问题而展开的“口水战”，也有围绕“俄格冲突”几近形成的“军事对峙”；同时，尽管近几年来俄罗斯围绕自身国家定位，即俄罗斯到底是欧洲国家还是欧洲—太平洋国家，因而俄罗斯应该面向西方还是应该面向亚太的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但在俄罗斯外交文件所确定的外交先后次序里，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依然排在了第二位，仅次于排在首位的独联体国家。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相关内容也再一次表明，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矛盾与争斗接连不断，但俄罗斯希望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的愿望仍然没有改变。俄罗斯希望，在整个西方世界危机重重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够真诚地面对现实，承认俄罗斯价值观的“特殊性”；不再对俄罗斯的“民主与人权”指手画脚，尊重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利益范围，并把俄罗斯视为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不过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的对俄立场，这种极力谋求与西方世界加强和改善关系的美好愿望，很可能再次流于俄罗斯方面的“一厢情愿”。

实际上，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试图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与西方世界大家庭实现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战略，要求俄罗斯进行政治与经济的根本改造，并成为北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俄罗斯领导人曾希望，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将会全力帮助俄罗斯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然而事实上，由于俄罗斯与美国政治领导人对各自国家在世界上的利益理解不同，俄罗斯的这种一体化战略不仅没有实现，反而遭到来自西方的变本加厉的遏制、挤压与削弱。及至普京上台初期，俄罗斯在“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的实用主义外交旗下，毫不犹豫地抓住“9·11”恐怖袭击这一契机，及时主动地向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显然俄罗斯仍然希望，美国能够放弃追求单边优势的做法，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在对等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然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眼里，俄罗斯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一个不稳定的、满脑子是‘魏斯曼主义’的不安全因素”^①。也正是基于对俄罗

^① D.Trenin, “Russia’s Spheres of Interest, not Influen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2, No.4, Oct, 2009, pp.3-22.

斯的这一定位，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通过北约东扩、颜色革命、军事进驻中亚等，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俄罗斯实施了一连串的“压制”措施，目的就是防止俄罗斯复兴成为一个能够挑战美国全球统治地位的国家。美国人宣称，“后苏联空间在俄罗斯领导下建立的集团或组织是非法的、不稳定的‘纸老虎’，加入其中的成员国几乎都是迫于强制”^①。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才出现了美国方面针对俄罗斯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如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力推欧洲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入侵伊拉克、策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颜色革命”等等。对于美国方面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系列动作，俄罗斯也毅然决然地开启了一场从言辞到行动的“绝地反击”。以 2008 年中期俄格冲突为标志，俄美关系陷入了“新冷战”的边缘。

2009 年春，俄罗斯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寻求与美国合作的轨道上。梅德韦杰夫总统声称，俄罗斯国家的最优先任务是实现经济与政治的现代化。由此，俄美两国领导人的更换，为双方建立互利伙伴关系再次打开了“机会之窗”。对于奥巴马总统要“重启”俄美关系的宣示，梅德韦杰夫总统积极回应，并表示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所谓的“现代化联盟”，目的是实现俄罗斯经济的现代化。美国以其巨大的投资与技术实力，自然成为梅德韦杰夫政策的一个首要对象。随着俄美关系的“重启”，此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诸多尖锐问题得到缓和：美国在东欧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上的立场出现变化；北约暂时停止了东扩进程，吸收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计划也暂时“悬置”；签订新的限制核武器框架协议；美国停止了对俄罗斯“反民主”政策的抨击，并与俄罗斯建立了解决具体问题的政府间双边委员会；此外，美国还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对话以及投资与高技术合作。

然而，梅德韦杰夫的现代化方针很快就显示出它的局限性。奥巴马总统不仅推出了其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四阶段计划，而且拒绝向俄罗斯提供有关该计划不针对俄罗斯核力量的书面保证；美国人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立场虽然有所缓和，但看不到实质性的变化。同时，华盛顿坚决反对可以替代以北

^① Joshua Kucera, “U.S. Blocking NATO-CSTO Cooperation”, *Eurasianet*, February 12, 2011.

约为中心的欧洲安全体系的其他可能，对俄罗斯有关签订一个新的全欧安全条约的要求也态度冷淡；美国官员对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的频繁访问与有关宣示，也都明确无误地表明其将继续支持两国加入北约的意愿；俄美在中东问题特别是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继续呈现加深之势。对于普京的重返“克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普京的重新‘驾临’，意味着专制模式及其连带的一系列后果在俄罗斯的最终确立和不可改变——国内政策方面僵化停滞，反对现代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则是反对西方的扩张主义——这样的一个俄罗斯当然是极其危险的。”^①此外，美国对俄罗斯民主问题的批评重新抬头，而新近俄美两国在两个法案上的过招更是让两国关系的发展雪上加霜。

从整体看，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立场和以前相比并没有变化，单边实用主义是这一政策的主要特征。“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②美国的政策目标是促使俄罗斯在伊朗、叙利亚以及削减核武器等问题上作出具体让步，并向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帮助，但美国无意同莫斯科建立战略联盟。西方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俄罗斯，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战略上的“准盟友”。换言之，人们不可能指望俄美会建立什么战略伙伴关系。“鉴于自身独特的历史、思想与世界地位，不论是今天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都不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因此，试图成为美国的‘主要朋友’的做法不仅没有前景，而且也是一种危险的举动。俄罗斯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利益，这种利益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亚洲及穆斯林东方世界。”^③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俄美关系将继续沿着冷淡与缓和这个封闭的圆环循环往复”^④。

①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Русское везение и западная неудача// РИА Новости. 2012.06 Июня.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Демонтаж “перезагрузки”.01.09.2013. www.carnegie.ru/2013/08/07/демонтаж-перезагрузки/ghqg

③ Андрей Цыганков. Россия–США: к новой модели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сти? 21.08.2013.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717#top

④ Макарычев М. Москва словам не верит//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5932 (259). 2012. 9 Ноября.

3. “转身亚太”、“面向亚太”，特别是全面巩固与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在欧盟与欧元区国家问题成堆以及美国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的巨大资源与经济发展活力显得更加引人注目。21 世纪是亚太世纪，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将逐步转向亚太地区，这一点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从俄罗斯的最新定位来看，“俄罗斯与其说是一个欧亚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这种定位不仅突出了俄罗斯的欧洲根基属性，而且也指出了俄罗斯面向太平洋这一最重要的事实。”^②“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俄罗斯社会接受这样一种意识，即：俄罗斯不仅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且也是一个亚太大国。”^③其实早在回归克里姆林宫之前，普京就表示，俄罗斯应当借“太平洋之风”扬“俄罗斯之帆”。在普京总统就职后不久发布的一份名为《有关落实俄罗斯联邦对外政治方针之措施》的文件中，明确提出的任务就是：“扩大参与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促进俄罗斯联邦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④而普京上任伊始即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持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更是表明，“普京总统的第三任期正在大幅度调整俄罗斯外交政策，将亚太地区作为主要的优先方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表明，莫斯科的新‘抱负’，就是要通过加速实现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而成为欧亚中心。”^⑤

① 关于中俄关系以及俄罗斯的亚太战略的研究，可参见刘古昌：“不断迈上新台阶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1 期；熊光楷：“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4-7 页；冯绍雷：“面向亚太地区未来的中俄关系”，《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13-22 页；В·Л·拉林（В.Л. Ларин）：“愿景的方向与可能性的边界——对俄罗斯制定 21 世纪上半叶亚太地区战略的几点意见”，《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第 27-39 页；申韬：“机遇与桎梏：变革时代的俄罗斯亚太战略”，《俄罗斯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② Тезисы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оссии (2012-2018 гг.) . РСМД. -М. : Спец книга, 2012.

③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глобальный прогноз 2030. ИМЭМО РАН/Под ред. А. А. Дынкина. М., Магистр, 2011.

④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20.01.08.2013.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1641#top

⑤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Стран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79 (4964). 2012.25 Сентября.

俄罗斯“转身”亚太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是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在世界上地位与作用上升的因素。其二是美国及欧洲对民主与人权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世界领导地位的野心，这既和克里姆林宫捍卫内政主权的方针背道而驰，也与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独立力量中心的自身定位不相符合。”^①俄罗斯著名学者卡拉加诺夫指出，从今天来看，俄罗斯融入欧洲的一体化方案没有前景，因为首先是欧洲自身没有准备好，它正在经受深刻而漫长的危机。欧洲当前的状况说明，它经受不住当代国际竞争的挑战……不管怎样，欧洲将经历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才能适应新的世界模式，目前它还顾不到我们。因此，俄罗斯必须转向亚太方向。^②其三，是开发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需要。俄罗斯与亚太地区国家邻近的地缘条件，以及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巨大的资源潜力，可以让俄罗斯充分利用亚太国家对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并在对俄罗斯有利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经济的现代化。同时，也“只有俄罗斯联邦远东地区的崛起，连同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一贯的和目标明确的积极外交，才能够为俄罗斯确立一个公认的太平洋大国地位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尽管俄罗斯总是历史性地将自己看做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然而国际现实迫使莫斯科不得不转向亚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内政因素赋予了俄罗斯这次‘转身’以意识形态色彩。”^③

事实上，“考虑到俄罗斯所面临的一系列国际国内因素，俄罗斯要避免衰退，必须艰难地向东方‘漂移’，转向亚太地区……走向作为未来几十年世界发展中心和引擎的东方，总体上将给俄罗斯带来机遇。”^④俄罗斯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友好并且事实上是无冲突的关系，俄罗斯已经成为亚太地区所有多边组织与机构的成员（除了不是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之外）；同时，亚太地区国家也非常希望俄罗斯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希望能和俄罗斯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毒品贩卖、海盗、自

①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Стран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Востока.

② Юрий Соломонов. Идем на Восток//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2.24 Апреля;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20. 01.08.2013.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1641#top

③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Стран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79 (4964). 2012.25 Сентября.

④ Андрей Рябов. Туда, где алеет восток. 26.10.2011. <http://www.gazeta.ru/column/ryabov/3812794.shtml>

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这样一些跨地区威胁。甚至“在不少情况下，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还特别是被该地区中小国家看做是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与地区稳定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①

总而言之，“不断深化的欧洲危机、与布鲁塞尔对话的步履维艰以及与美国关系的难以协调，所有这些都使得‘欧亚联盟’方案与‘融入亚太’战略，成为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的‘干线图’。”^②

而由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其引人注目的发展势头和崛起潜力，俄罗斯转向亚太、融入亚太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要全面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在世界多极化背景下，中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与俄美之间“一波三折、龃龉不断”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演进，借用特列宁的话说就是“只能用奇迹来形容”^③。自从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以来，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总体呈现逐步深化、稳步提升并不断“创出新高”的发展态势，中国在俄罗斯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与分量呈现不断加重之势。不管是梅德韦杰夫还是普京，在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不约而同地都将中国作为独联体国家以外的首访国家，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其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程度。在 2013 年 9 月 6-7 日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普京在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明确指出，作为国际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大国，“俄中关系具有独立价值。”习近平主席则称，“至今中俄双方已经在 16 个大领域的将近 50 个大型项目上，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或者实现了重大突破。”^④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Росс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020.01.08.2013. http://russiancouncil.ru/inner/?id_4=1641#top

② 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Страна восходящего Восток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79 (4964). 2012.25 Сентября.

③ Тренин Д. Верные друзья?----Как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http://samnegie.ru/2012/02/29/верные-друзья-как-россия-и-китай-воспринимают-друг-друга/ex09>

④ Юрий Паниев. Саммит G20: Политика Вместо Экономик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13.09 Июня.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对中俄关系的论述，与旧版《构想》相比内容更加丰富。除了表示将继续扩展和中国的全面平等信任伙伴关系与战略协作外，还增加了要加强在多边组织合作的内容：“在联合国安理会、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东亚峰会、上合组织，以及其他多边组织中开展合作”^①，以共同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解决尖锐的地区及全球性问题。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旧《构想》是把中俄关系与印俄关系放在一起论述的，而新版《构想》对于中俄关系的论述则是单独列为一节，这种行文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涵义值得玩味。不管怎样，随着俄罗斯远东开发开放战略的逐步推进，俄罗斯将把更多的外交精力用于发展对华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俄罗斯联邦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它必须最大程度地发展同中国的得体、友好与互利的关系，不加入任何一个反华联盟。”^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012年2月27日发表的普京的题为《俄罗斯与变化的世界》的文章曾经特别指出，“我坚信，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是威胁……我的基本想法就是——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与稳定的中国，反过来讲，我也相信，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成功的俄罗斯。”^③应当说，普京的这一立场明显体现了俄方对发展对华关系的一种新认知。

而当前中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借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话说就是，“目前双方协作关系内容之丰富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④。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访俄期间，两国元首一致表示，中俄都把对方作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都致力于把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阶段，特别是要把两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总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两国现代化进程“互相对接”，实现“中国梦”与俄罗斯“强国梦”的有机融合，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而且有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02.2013.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ую роль могла бы играть Россия в новом десятилетии. 21.05.2011. www.forbes.ru/forbes/issue/2011-01/62114-vneshnyaya-politika

③ Путина В. Россия и меняющийся мир//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2012. 27 Февраля.

④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и ответ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Министр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КНР Ян Цзечи. 23.02.2013. www.mid.ru/brp_4.nsf/0/3F806838D555A5B444257B1A0042813B

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总之，从新《构想》有关俄罗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的阐述，以及普京“归位”一年多来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除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有条不紊地沿着既定轨道继续稳步推进以外，俄罗斯的对独联体外交以及对西方外交仍然处于调整之中，未来发展仍存在众多变数。实际上，自从新俄罗斯独立以来，虽然俄罗斯一直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列为其外交的一个重点，但双方的关系始终未能理顺，总是在“磕磕绊绊”中摇摆不定。纵观20多年来俄罗斯的对西方外交取向可以看出，虽然屡遭挫折，但俄罗斯的“融入西方”之梦却是“无怨无悔”，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亲西方”，还是新世纪初普京总统对美国反恐联盟的“积极支持”，抑或是梅德韦杰夫总统对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的“投桃报李”，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个中的原因亦颇值得深思。笔者以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实难得到实质性改善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俄美对于俄罗斯国家定位的认知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即：俄罗斯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大国——一个应得到美国认可及平等相待的大国，而美国充其量是把俄罗斯看做是一个“像英国那样的一个小伙伴角色”^①。只要俄美两国不能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就不可能稳定地向前发展。

总之，作为当今世界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与潜在的经济大国，俄罗斯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分量不言而喻。而作为我国的最大邻国，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说，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举手投足”都始终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安全与发展，特别是在当今我国正在崛起，美国“重返”亚太，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格局大分化、大重组的背景下，普京未来任期俄罗斯外交战略何去何从，不仅事关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而且事关整个国际格局的演进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① Лозанский Э. 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Америкой и Китаем. Москва. из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7. С.75.

【Abstract】 On February 12, 2013, the new Concept of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igned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xpounded systematically the objectives,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emonstrating Russia's judgment regard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the world. Meanwhile, Russia's diplomatic priorities during the new era have also been clearly conveyed. Compared with the past two Concepts by Russian government since the new century of Putin's new term, there has been inheritance and continuation, in addition to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Russia's diplomatic priorities in the new Concept, as well as its diplomatic practice in the past one odd year, the new direc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s mainly as follows. First, it is to attach strategic priority to developing relationships with post-Soviet countries. Second, it tries to comprehensively construct "Eurasian Union", attaching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S., devoting to deepen overall Sino-Russ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Key Words】 Putin's New Term,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Russia-U.S. Relations, Sino-Russia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 12 февраля 2013 г.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подписал новую версию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которой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зложены цели, принципы и приорите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отображены су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 о настоя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мире и будущих тенденциях развития, что яс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ую задачу новой эпохи России. Если сравнить две версии «Концепций», изданных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России с момента прихода Путина к власти в новом веке, нов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обладает ка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и, так 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развития и инновац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зложенных в новой верс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оритет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а также практик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России за больше, чем годовой период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Путина,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глав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нов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является: развит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о странам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качестве перв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риоритета, построение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звит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возглавляемыми США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ы,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ние усилий н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 углубл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овый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срок Путина,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НГ,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4 年第 1 期

(总第 185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 公开发行 ·

定价：24.00 元